

## 引 子

“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草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这是明代苏州人朱良写海瑞的诗。这是因为，万历十五年十月（1587年11月），74岁的海瑞以老病之身卒于官舍后，他的同乡苏民怀检点遗物，只有竹笼一只，内有俸金八两，旧衣数件而已。时人王世贞以九字评之：“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

这“三不”的评价对于270年后出生的韩国钧（字紫石）同样合适。嘉靖的举人与光绪的举子虽都在40岁左右入仕，又都能锐意兴革，居官清廉，出污泥而不染，香清溢远。海瑞遭弹劾改官，民众闻之号泣载道；紫石卸职安徽巡按使时，“焚香跪者满途，穷民顶香者不下两千人，至大街，香案盈市，几乎无家不设”。但韩国钧终究不是海瑞。

比较起来，海瑞的目光更远大些。海瑞中举的次年（1550），即向朝廷上《平黎策》，希望开道立县，以安定乡土。韩国钧则在任内，恪尽责守，施以仁政。说来巧的是，一次偶遇，竟萌动了—一个孩童“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的想法。韩国钧少时见左宗棠着黄马褂，端坐舟中，威风凛凛从门前运河经过，遂“以为莫大之荣”，自愧“不能以先王之



义，胜富贵之荣”。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功名思想，是一代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博取人生的直接动因，韩国钧岂能例外？《孝经》曰：“扬名显亲孝莫大焉。”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海瑞的回答是无非出于恻隐和义愤。功名之念，浸入国人的精髓大致有两条路径：一是圣贤之书；二是具体而生动的生活体验。感性的东西往往来得更加直接深刻而使人终身难忘。

韩国钧的“不怕死”与海瑞亦是有别。1909年冬天，满洲里发生大鼠疫。疫区道殣相望，尸骸枕藉。医务人员时有染病身亡的，同僚们都劝深入疫区的韩国钧“勿入为宜”，当心染病。他置生死于不顾，仍频繁来往于疫区，为民操劳。海瑞不畏死，敢批龙身之逆鳞。他骂了嘉靖皇帝后，备好棺木，诀别妻妾，准备慷慨赴死。这种直言抗命的精神，其实也是忠君的表现，为的是江山社稷啊！而韩之忠君近于愚。

韩国钧任永城知县时，入不敷出，要靠向友人借贷，才能勉强维持县衙支出。民国初年，大儿成婚筑屋，也要向亲友借钱。从现存的韩国钧故居的规模，可以想见当年两任江苏最高行政长官的封疆大吏是不敛财的官。抗战爆发，其家眷的生活甚至要靠苏北行政委员会拨公粮来维持。

万历十五年（1587），海瑞死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韩国钧在帝国礼崩乐坏的风雨中，少了海瑞的奇特、“怪僻”和执拗。在体现贤臣爱人以德的君子之风时，韩国钧的择善而从，雍容宽厚的本性显现出来。韩国钧宦海四十春，虽有进退，但无大的起落，就是这种性格使然。有道是：性格决定人生。他奉行的“合则留，不合则走”的生存哲学，极大地减缓了人生旅途的颠簸。当然，作为官场资深的官僚，韩国钧又完全懂得“阴阳之道”的精微深奥。辛亥革命，帝制虽然消亡，但政权的飘忽无定，权力的争斗无休，给智者一个窥测方向，待机而作的“缓手”。贸然行事，最易酿成大

错。袁世凯电令韩国钧赴京，公“不欲于此纷扰之时再赴北京”。并非对权力心灰意冷，而是权居朝野之间，以退为进；退一步，是为将来进两步。他选择在苏省程都督（德全）幕中襄办军事文牍，及时掌握时局动向，决定进退取舍。他阳求不欲，阴为向袁大总统待价而沽：确定军（都督）民（行政）的权限，否则不就。在得到袁的电令“遵照划一官厅组织法办理”后，才赴苏州接任。

当然，从总体说来，韩国钧不是一个十分热衷于政治的人。军阀当政，文人出身的行政长官，又能有什么大作为？陶菊隐一句“省长是督军的媳妇”点破了北洋时期督军与民政长（省长）的主从关系。幸好，韩国钧明白世风如此，不依附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判断与努力，去消解头绪纷繁的争执，只能使自己陷于不能自主之境。

韩国钧接任江苏民政长时，张勋督军已将全省60个县知事，任命了54人，48个税所长，任命了45人。这是明显违背了交接之前袁大总统明确的军民权限的。韩国钧推翻成命，不用说与张勋关系难以摆平，即是已被任命的官员也会不满。此时，韩国钧擎起“中庸之道”的法宝，再次摆脱尴尬。只将年未满20岁的无锡知事更除，余则照旧。当然韩国钧话还是挺硬：“已任知事而贤，余方褒奖之不暇，否则即余所委派亦复不能姑容。若税所则以此额为标准。”张勋对此等类似“下不为例”之语当然没有意见。

韩国钧生命体中的超凡悟性，也使他能进退裕如。在对官场有足够认识之后，在升迁的失意之时，他能坦然。他说：“功名者机会为之也。机会无常。有时人赴机会而来；有时机会亦赴人而来。”50岁以后的韩国钧读老庄，又一心向佛，在混沌的世事中，添了许多的超然与淡泊。

他的智慧与才干在对外交涉中更显卓著。河北矿务局任上，在与英国福公司的较量中，拒绝贿赂：“韩某非图贿者，汝



以贿行，浅之乎视余矣！”在“红黄”界问题上，维护的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合同议定后，允许英国人办的事，他就不再留难。把“大义”与法律精神统一起来，不偏执在抽象的道德轨迹上，同时赢得对手的尊敬。在满洲里大鼠疫与日本人的交涉斗争中，他受命于危难之时，成功地抑制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击破其借口侵吞南满铁路的计划。他兢兢业业的理事作风，沉雄善断的组织才干，既有坚持原则的坚定，又有与对手沟通融洽关系的斗争技巧，同样受到日本人的敬畏，被日皇授于三等旭日勋章，当然奏准后方才接受。

有人评说韩国钧是“中庸集大成者”不是没有道理，但更重要的是他能顺乎潮流，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不迷失方向，这才在40年的宦宦生涯中不被淘汰。他作为前清重臣，被奉赏头品顶戴，对清王朝乃至延绵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应当充满留恋。辛亥革命时，各省光复，中华民国建立，袁世凯窃权，宋教仁为人狙击……在历史变幻的迷离中，为避“变乱”和“纷扰”，他辞去吉林民政使，绝意仕进，以冷眼观世变。但袁世凯要恢复帝制，他又坚决反对。任安徽巡按使和江苏省长时，因“党争剧烈，军阀侵权财政，天下骚然多事”，采取了“洁身计”，辞去本兼各职，退隐居里。

退隐后的韩国钧并没有在诗酒中消磨时光。他关心桑梓，热心水利，开办实业，救灾赈济，修史编著，居乡问政，深得民心。

特别是“七七事变”后，他积极拥护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奔走呼吁国共合作，反对反共摩擦，支持新四军东进抗日。最后身陷日伪包围而坚贞不屈，严词痛斥敌伪的威逼利诱，拒绝出任伪江苏省省长，在忧愤中溘然逝世。

韩国钧一生任事教育、民政、矿务、军事、外交、水利、卫生等方面，而每司一职，均成效可观。为官40年，从慈禧

太后、袁世凯、黎元洪、蒋介石到共产党，异代各方，咸为嘉许。身后又备极哀荣。1943年以紫石命名海安县境。解放后，刘少奇、周恩来对其后人倍加关爱。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不多见的。

宽厚仁爱的家族传承（清道光末年，海安大灾，其祖拆卖主屋三楹，换米麦，粥赈饥；其父好善尚侠，待人和，接物诚，雅好文学），清正廉明安贫乐道的君子特征，择善而从的大局观，成就了这位乱世名臣的清誉。

对于回原籍闲居的海瑞来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这位正直的官员，他毕生精神所寄，就是按照往圣先贤的训示，以全部的心力为国尽忠为民服务。官场的终结无疑是他事业的终点。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足以填补心灵的缺憾了。加之一月内妻妾双亡的家庭疑案给善于以道德评判的国人，特别给他的政敌以可乘之机，杀伐得他无回天之力。

韩国钧一生不二色。退隐后的16年间，在事功方面完善和修练他最后的人生，把丰满和完整呈现出来。这是韩国钧的独特之处，也是黑夜星辰永具光泽的所在。

笔者无意比较海瑞与韩国钧孰优孰“劣”。不妨说海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韩氏却是一个脚踏大地、“收放”自如的智者。

历史是以人的活动为主线的。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人类活动形成的轨迹。在漫漫的长夜里，中国的天空出现过无数闪亮之星，我们忠实地记写他们，是让历史在盛衰荣辱中，昭示我们民族艰难前行中不屈的精神。

昨夜星辰，永远闪烁在历史与现实的天空。



北小城海安，并未感知国家大的变数。小城人依旧做大清的子民，只偶尔从金陵传来“长毛”（太平军）的消息，或有清兵过境，有一丝兵荒马乱的感觉。

咸丰七年三月初四（1857年3月29日），也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子，翻一翻典籍也没有看到有大的事变与此相关连。古通扬运盐河边上“义兴恒”酒店的小老板韩希彭家又添一丁，陡增一只“饭碗”罢了。因韩掌柜已得两子，这“三儿”的降生，并未给韩家增添多少欢乐的气氛。

古运河官名叫上官运盐河，是有些年头了。地方志上说，刘邦封其侄刘濞在江苏一带为吴王，奠都扬州。他见海安沿海是全国闻名的“吴盐”产地，煮盐利润大，便从扬州茱萸湾经泰州到海安城东郊的三十里墩，把夫差开凿的邗沟拓宽浚深，使产区到集散地的运输更加畅通，定名为上官运盐河，并在海安镇东与串场河沟通。

小城的百姓或多或少从运河里得些实惠，舟楫之便，饮水洗濯的自在，都能从他们满足的笑靥中找到答案。

商贾小民，生意好时，日子过得稍微舒心时，信口一句：“皇恩浩荡”；生活困窘时，骂两句娘便了然。倒是运河中的匪患常常滋扰得市民不得安宁。古运河实在是小镇百姓了解时政的晴雨表。愈是灾荒之年，苛政尤猛，兵匪扰民劫财尤甚，而且水患亦由此滋漫开来。这时运河一改平日的温顺，河水汹涌异常地漫天而来。这古运河的命脉又全系于老天爷的股掌之中，说不准何时便龙颜大怒，灾祸连年。

韩国钧幼时就是在母亲王氏的臂弯中，看运河水长大的。古语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不知韩国钧生命中的智慧之光是否与古老运河水有关，但是韩家的生计确系于此。“义兴恒”所酿老陈，自是取自古运河水。水不但是韩家的生计之源，也成全了韩国钧祖父的一次义举。



道光年间，海安一带发大水，四乡八邻，一片泽国，饿殍遍野。海安镇到处是逃难的灾民，每遇店家便跪拜乞讨。韩国钧祖父韩凤翔时虽小康，开酒行营生，乡下有五六亩薄田，日子过得将就。但韩凤翔不忍睹此凄然之状，遂将三间堂屋拆卖筹得银两，购米麦，设粥厂，赈济饥民，一时为乡人传颂。

韩国钧出世时，韩家早已家道式微。个中当然有时运和经营的问题，但祖父拆屋赈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要知道小户人家，日积月累，勉强维持生计尚可，怎堪大的折腾。其时祖父也已辞世，留给韩希彭的是一副烂摊子。但韩希彭有父风，生性乐观，好善尚侠，喜交游，又雅好文学，善吟咏。小日子虽艰难，但酒行内终日充满欢声笑语。韩希彭发蒙之时未得名师教点，成年后又忙于经营，为生计愁，终不能成就更大的诗名。但可以看出韩希彭不只是一个光知道赚钱的小老板，是有一定知识水平和眼光的。

据《海安考古录》记述，元至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起事，派夏思恭、张士俊据泰县、扬州，设泰县衙门。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麾下大将徐达、常遇春分别从泰兴、扬州攻打泰州，与夏思恭形成对峙。常遇春遂率兵至现海安镇老街这片地，屯兵筑城，“表里砖甃，周三十里三十步”，断了张士诚军队来自通州的粮草和援兵，海安就此成镇。海安位于江淮之间，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分明，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通扬运河从镇中缓缓流过，见证了明清时盐业的兴衰，浇灌出颇为殷实柔和的稻米文化，也养育了温和、圆通、坚韧的苏中人的秉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指地域文化。比如说，上海人的精明，山东人的豪爽，陕西人的耿直。对海安人来说，特定的水土养育成海安人的性格特征，那就是“温、圆、韧”。

“温”就是相对温和，中庸守拙，不轻易露出锋芒，不大喜大悲。“圆”，就是圆通，不呆板，善于变通，说话做事讲

究分寸。“韧”，就是意志坚韧，不怕挫折和困难。韩家本是“耕读传家”、“义门世家”，且家风和顺。只是到了韩国钧祖父才经商，但并未弃“耕”。韩国钧性格中的“温、圆、韧”以及诗的秉赋，既得益于地域文化的熏染，同时也是家族性格的传承。韩国钧上三代虽未取得功名，但家族诗学渊源潜隐到韩国钧身上，终于获得喷发，为日后韩国钧两次参加院试诗赋取列扬（州）属第八名、第一名，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 “以记诵为苦”

同治元年（1862），按照中国人的计岁方法，这年韩国钧6岁。六龄小童，应当是入塾发蒙的年纪，而这一年发生的两件事，却使韩家人大为惊异，惊异中充满失望。

话头却要从年初说起。

这年初，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于此同时，大清三杰之一的侍郎彭玉麟统率湘军水师攻陷头关、江心洲、蒲包洲，进泊江宁护城河，应援曾国荃部的湘军陆师。天京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严重起来了。天王洪秀全坐卧不宁，“一日三诏”，严令李秀成回救天京。李秀成于苏州召集诸王会议，商讨援救解天京之围的策略。

清兵更是急速调集：江北的都兴阿拨军数营援天京外围之湘军；左宗棠拨出王文端率军数千增援皖南，然后猛犯严州。

距天京四五百里地的海安就出现了过境的清兵。绿营军士穿红边号衣，肩扛前膛铁枪，手执火绳，穿街而过。其时，就有清兵在“义兴恒”酒行前驻足，索要酒喝的。店内顾客，便有伸长脖子打听金陵战事的。这时的韩国钧刚够桌子



高低，听得似懂非懂，虽不知金陵在何处，只见其神情异常专注而又略带懵懂。

据韩国钧自传《永忆录》载：“每厅事宴客，庭燎辉映，父时呼余从客，拇战辄胜。人目余为神童，又目余为常胜将军。”

拇战，又名“豁拳”、“猜拳”、“划拳”，一种用于酒席助兴的游戏。因简单易行，在平民百姓中十分流行，属于酒令中的“俗令”。韩国钧不怯场，也不喜形于色，从从容容，划起拳来也是十二分的专注。原来韩国钧终日耳濡目染，划拳行酒令，也是懂得一些。六龄童屡战屡胜，人们称他长胜将军。他并不知将军为何物，隐约之中，有一种自豪感。人们在叙述英雄（名人）往事中，只不厌其详地诉说其不同常人的特别之处，对于他们的尴尬和失败，常常忽略。

小儿为大人们饮酒助兴，以今人的眼光看，是不利于孩童的成长的。生当其时，实是韩父的经营之道。由此，韩国钧早早在酒肆这个小社会中，接触到各色人等，增加见闻，锻炼出良好的心理素质与临阵不乱的大将之风，是否与日后的作为有所裨益？

其时官军与太平军正激战金陵。特别是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实力大为削弱，人心混乱，不时有溃败之太平军兵士流落小城海安。一时间海安城内，金陵战事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

“义兴恒”内自是少不了这类话题。酒肆茶楼当是新闻的集散地。人们从小道、半小道，直至官方的消息中，获得对时局的评判。在兴奋、猜测、惋惜、悲愤和争辩中，消解着多余的精力。

韩国钧见酒客们大谈两军战况，听得似懂非懂，甚觉有趣。他不知战争为何物，在他有限的记忆中，战争的残酷从来没有具体生动地展示过。

还有一件事，令韩家人忧心不已。

韩国钧母亲是有些酒量的，《永忆录》中有“余母能酒”的文字。韩国钧的母亲喜欢用麦酒浸枣儿，其红若樱桃，甘芳适口，但酒精含量高，韩国钧于无人处贪食多多，遂大醉。韩母汲井水沐其头，一小时后方醒。后来韩国钧任官河南、东北等地，都曾大醉一两日不醒。醉后至苦，也常悔醉。但遇酒又不能自持，再饮又是大醉。可见韩国钧酒量和酒瘾都是很大的。

幸而不久，韩国钧就入了塾，从本镇陆月舫先生发蒙。韩国钧也就在规矩与野性之间不时地反复着。

韩国钧读了两日，兴味索然，就常迟到。因此多次遭到塾师当众训斥。母亲在其他学童家长前面面子也就很有些挂不住。无奈，总是免不了对儿子劝勉一番，而在无人处，又常暗自落泪。

尽管如此，韩国钧在同塾学童中并不失号召力。因为课堂之外的天地，不是“诗书礼义”管束得了的。儿童好玩的天性，让他过足了“官瘾”。放学后，他常聚集诸学童于自家西侧的大晒场上。只见他挽起长衫之袖，并将下摆往腰间一扎，自任指挥，命众顽童“兵”分两军，互相对阵，以晒场为战场，演练起官军与贼寇的搏杀。韩国钧立于土丘之上，俨然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

此时的韩国钧除了游戏过程中获得的快乐，一任天性放纵到极致外，潜意识中“权力的驱使欲”得到一次很好的膨胀，并充分享受到“权力”（驱使调遣他人）给他带来的无限的欢愉。这是韩国钧继划拳行酒令得人夸赞后，心灵深处获得的又一次极大的满足。客观地说，塾读期间，韩国钧除对背诵略感头痛外（他自己说“以记诵为苦”），习诗作文倒是颇感兴趣。可见韩国钧生性富于创造，对死记硬背不屑于顾。但话又说回头，幼学阶段，背诵熟记一些经典名篇佳句，虽属囫圇吞枣，不求甚解，可对于记忆的训练与知识的积累



还是有帮助的。旧时私塾不过“背”这第一道坎，实难沿此路径博取功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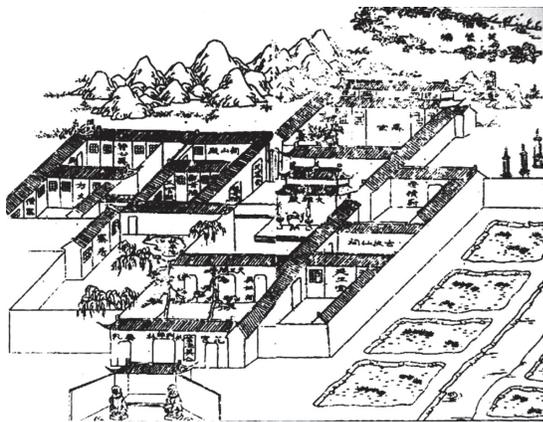
对此，韩母多有斥责和训诫，而紫石稍长后，亦能听从母亲教诲，认真诵读“四书”、“五经”。由此可以看出韩国钧虽怠惰于背书，但并非顽劣不化。识大体，并不违拗已经深入人心的封建传统教育，而且在极具张扬灵性的诗赋写作中，颇得塾师的嘉许。

## 学教西寺

只可惜韩国钧童年的欢乐时光甚为短暂。紫石9岁丧父，12岁时母亲又撒手人寰。其时母亲40多岁。母亲之丧在初春。春草青青，更有送葬人凄清落拓的脚步缓行于海安东郊荒寂的坟场里，紫石哀不尽这断人心肠的伤痛，悲恸欲绝。真是泪流尽，身心俱裂。

坐落在海安镇西后街的“祇树寺”，亦称“祇树禅林”，俗称西寺。该寺建于明代初年，清道光七年(1827)，僧若水募化扩建，占地30余亩，寺房136间，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共四进。殿宇古朴庄严，佛气灵然，是为扬州泰东名刹。从现存藏经楼的大模样可遥想西寺当年的庄严与辉煌。

道光年间，在西寺扩建时，本镇刘子才的父亲刘庆熙慷慨解囊，捐出数量可观的银两，寺庙重开光时，允其用西厢的祖堂、异姓祠设馆课徒，以供本镇学童开蒙。刘子才成年后，继承父业，负责塾馆的管理工作，并延聘海安硕儒何伯溟任教习。何伯溟，堪称“通儒”。除对孔孟之学、程朱理学能精解外，还根据自己的人生积淀对儒家学说进行开解，其



西寺庙

中大有离经叛道的成分。此外，何伯溟在绘画、书法、历算、地学方面也有所涉猎。这在西学尚未大举东进之时，在偏于扬东的小镇可算是一个前卫的人物。何伯溟的塾学课程常常涉及一些农事、天文气象，并以线条图式辅助讲解，多少有点新式学堂的味道。

同治八年（1869），韩国钧13岁。在早春二月的一个清晨，韩国钧在二姑母韩希琴的催促下，早早地起床，整理行装，准备去西寺刘氏塾馆寄读。自父母双亡后，韩国钧就由“在室守贞”（守寡）的二姑母以养以教。

说起韩国钧转寄西寺求读，这要归功于许玉亭先生。许虽与陆月舫交谊甚笃，但他认为陆为“初师”，即开蒙识字，却不能导读导学，因材施教。纹枰论道，亦不过“娱”功，不足为事功。以韩国钧目前的感悟力，继续师从陆月舫等于一个小学毕业生在复读低年级的课程。而何伯溟可为“中师”，能胜任韩国钧现阶段的教育。许玉亭对韩的二姑说：“紫石非从何师不能有所长进。”

韩国钧寄馆西寺以后，如鱼得水。每日食宿都在寺内，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习字，求取学问。何伯溟因爱其才，也免



收了他的学费。韩国钧更是勤奋有加，每日青灯黄卷，与佛为伴，书山攀援，学海弄舟。即便是过大年，其他学生如鸟出樊笼，纷纷回家。他仍寝食于斯，“日试一艺而不辍”，学业果然大进。

其时韩国钧在西寺塾学已入读了三四年，已16年华。除了先生布置的功课外，已广泛涉猎一些杂学：如曾国藩日记、左宗棠的《名利说》等。而魏源19世纪40年代完成的《海国图志》在当时的中国和东方都是划时代的世界史地巨著，成为当时东方各国了解西方和抵御西人的第一宝典。其中“以实事实功，以实功从实事实”，要求人们由书斋走向现实生活，由空谈转入实际，对韩国钧思想的影响极大。他单纯的博取功名、光宗耀祖的思想中注入了经世济民的成分。这为以后从事农业、工矿、交通、水利、教育、卫生、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工作并有建树，很有补益。有了为国为民尽忠效力，“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对韩国钧涉猎旁杂之学，何先生常常大声训斥，看似不近情理，但却是充满善意的劝诫。紫石当然心知肚明。百数十年前的中国，男儿不苦读“圣贤”书，由科举跻身官僚行列，几乎没有出路。因此，士人们如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学究一般，不闻窗外事，什么民之疾苦、国之盛衰，都漠不关心。紫石萌发的一些宏大的理想，以及关注世道人心，旁涉西洋史地的做法，与苦读求取功名的常规人生，产生了最直接的抵触。就连韩国钧自己对前途也表示出茫然：“不世之功，岂在故纸中？”少年紫石充满遐想，渐趋开阔的眼界，有些早熟的心智也许正是漫漫人生路上第一个拦路虎。当然韩国钧决非突发奇想，早熟早慧。其时一大批初步觉醒了旧知识分子已经在探究“经世大政”。闲暇之时，住持宝莲也与紫石言漕政、荒政、盐政、水利等，但宝莲说：“不入世，怎能经天纬地！不出世，不知大道青天。”事实上，任何个

人都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跳跃人生。宝莲对名教纲常的弊端早有深刻认识，他不赞成死读“孔孟”，学八股，走禄蠹之路，但又告诫紫石“程朱理学”虽谬人，但“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通入世大道，实为晋身之阶。“博得功名为清官”也是人生的一大境界，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这是先生的期许，也是其训诫紫石的良苦用心。

这里需要交待的是，寄居西寺的五年中，紫石的诗文大有长进。其制艺文经高人指点，悟出一点门道来。紫石虽厌八股，但想求取功名，这道关不通不行，由不得你喜欢不喜欢。西寺五年，紫石的笔墨功夫也打下了厚实的基础。紫石习字之初，攻“颜柳”，不多时偏张（旭）怀（素）。宝莲批评说：孩童举步之时，不宜疾驰。心气浮躁，欲速则不达。要韩国钧潜心攻楷书，然后转行、草。并说书法一如人生之轨道。见字见人见内涵。没有一定的人生阅历，“书”不能老道；人无雄才大略，胸中无“千军”，书必小家之气。不下苦功，夯实基础，不足以成大器。

20多年后，韩国钧题扬州大明寺碑“山川异域，风月一天”时，曾深有感触地说：“西寺之功，今尤得益。”言谈中，透出对何师的铭记和感怀。其实寄居西寺之时，先生的居所就曾张挂过16岁的韩国钧写的条幅。这对少年紫石来说是一种很高的褒奖了。据紫石嫡孙女忠云回忆说，其草书屏幅“龙翔凤翥，有王孟津之风。只可惜年深日久，条屏内容已不能知其详”。可见，老师虽不主张紫石过早涉及草书，希望他的楷书、行书有相当的功底后，自然过渡到草书阶段，但他从心底对紫石的草书还是喜爱的。不然，一个书法高手怎么会张挂一个少年郎的字幅呢？

韩国钧对海安西寺是有很深感情的。光绪三年（1877），紫石考取秀才。翌年，因何伯溟年老告退，他就到刘氏塾馆接替何师任教读师。韩国钧晚年回忆说：“当时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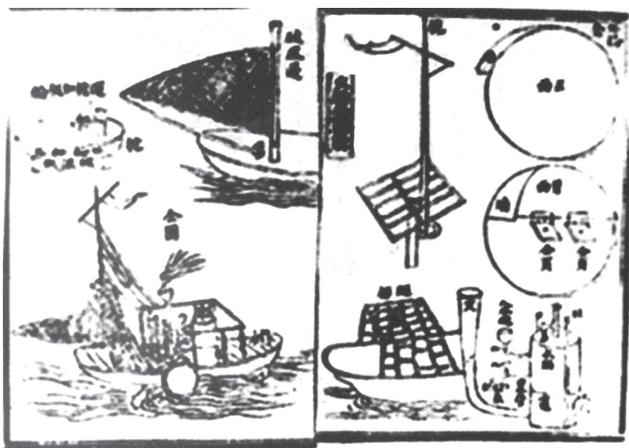


入修脯(工资)七十千,全以贍家用。”这些银两当是紫石书中读得的,是为第一次体现读书的经济价值。

主事塾馆后,韩国钧套用朱熹《小学》之中的8条规定作为塾馆学规。不管其出身、家庭背景,一入塾馆,学规面前,人人平等。日落时分,对学生功课一一检查,未完成或完成不好者,悉心细细解说,对学业优秀者予以褒奖。这些做法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授业,传道,解惑之余,还时时勉励和督促学生铭志苦学,以一个“苦”字为先,“劳”字为本。此外,还有意无意地传播一些新鲜思想和“旁杂”之学。既让学生开阔眼界,又不误前程。“知其圣贤之外,亦有真学”。

韩国钧在西寺完成了人生最初阶段的积累,并在有限的范围内,把自己开始接受到的18世纪封建地主阶级的开明思想家的影响,在课业传道间转而影响自己的学生。这种试验,对紫石来说,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快慰。

特别是“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海国图志》以及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改良派和洋务派的崛起,是近代中国先



《海国图志》书影

进思想家开始关注社会现实、体察民情国势的最早体现，也是自明代以来不绝如缕的“工商皆本”新鲜思想的延续。韩国钧由此开始“探世变”，考究舆地、兵法，图强御侮，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他志行忠介，廉不言贫，勤不言劳，是为日后任官，且政声素著的最为本质的东西。

## 秀才功名

清同治十三年（1874），韩国钧蛰伏西寺五载光阴，自认修炼已到火候，满怀信心地跨出西寺大门，向他的第一个人生目标发起冲击。

第一道关卡，当是童试。

童试又称童生科，每三年举行两次。逢丑、未、辰、戌年为岁考，寅、申、巳、亥年为科考。这年为甲戌年，当为岁考。所谓岁考在清代是由各省学政巡回所属府县举行的考试。

童试，也称小考。是为明清科举初级入学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县试，由各县知县命题，至少考五场以上，逐场筛选，将结果上报知府，通过者有资格参加府试；府试由知府命题，通过者方可参加院试。

韩国钧是有备而来，县试、府试哪里拦得住他，休说五场十场的考试，纵然是百场大考，他又何惧？转眼十二月到了，院试即在眼前。紫石援笔成章的才情鼓荡于胸中，恨不能立马入学，取了秀才，好向家人和师长报个喜讯。院试是由省学政主持的考试，要比县试、府试来得重要。清时以学政称督学院，故称院试。学政于驻在地考试就近的府、县；其余各府，则依次分期案临考试。正场一场，复试一场，揭



晓名为出案。出案者，人称“生员”，又称“庠生”，即俗称的秀才。然后送入学宫，称入学。府学、州学和县学统称儒学。儒学和孔庙一起称为学宫。生员在学宫中接受月课、季考，成绩最优者叫做“廪生”，由公家供给粮食；其次是增生；新入学的称附生。每年都由学政主持考试，按照成绩优劣依次升降。

紫石5年修炼的功夫并不能顺利跨越院试的门槛。他在泰州城的院试中（因海安并不就近于省城，只得由学政亲赴督试）跌了个趔趄。这个趔趄，并未摔掉他的自信，但给他许多清醒，也使他对科举的认识有了更多切身的体会，对别人数说的更是理解得深刻起来。

《紫石年谱》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初应试，十二月院试，诗赋取列扬属第八名。正场被黜。实未就其范中也。”所谓“正场被黜”，即八股文做得不好，按照“六等黜陟法”，黜革者当在四等之下（道光以后稍宽）。看来韩国钧的八股文不论他的自我感觉如何，在考官眼中当在二三等之外，否则不能被黜。幸好紫石的心理承受力尚可，只是未中“范”罢了。也就是说，并非不懂，只是没有按照八股文规矩做，仅此而已。

韩国钧总结当时考试的情形：“题为圣人有忧之使契……，余竟不知如何著笔，后读售者，始憬然悟。”看来韩国钧一是并未解题意；其次才是不熟悉八股文的具体要求。当然笼罩韩国钧心头的不快，并没有持续太久，紫石就研究起“售者”（考中者）的文章，恭敬虔诚地阅读起来。他比照自己的文章，找起“差距”。从另一个侧面也看出，乡村私塾教育与科举考试要求之间的差距。韩国钧6岁入塾，到21岁考上秀才后出塾，前后15年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跟随陆师学习时，仅在最后一年才始习八股文，跟从何师学习时，才始习词章。所谓八股文言其形式，四书则言内容，因为

出题取自四书，而须“依经按传”，代圣人言，可以说八股文是科举取士的基本功。

三年之后。

光绪三年（1877），韩国钧经过三个寒暑的苦读，在圣贤经典之中，寻到了“开山辟径”利器，备足了举步科场的“粮草”，一切的一切，都了然于胸，俨然饱学之士，丹田之气十足，就连“应诺”的声音，也如洪钟大吕。紫石满怀信心地再次参加院试。

此番步入考场的韩国钧已不同往日了。有过一次院试的经历也算老童生。他底气十足，环顾左右后，深吸了一口气，就在自己的位子上落下座来。

这时举牌人高擎写着试题的一块木板过来，于是考场里的喧嚣变成了一片唧唔，考生们边唧唔边琢磨如何写八股文了。

这年岁考的赋题为《君子淡以成》，文题为《殷周继其义》，诗题为《雪中芭蕉》。主考官是福建人林锡三，其貌清癯，正襟危坐，常以咳嗽之声告诫考生：遵守考试纪律。

好容易挨到太阳落山（科举考试天不大亮进考场，傍黑出考场，中途不得出考场），韩国钧终于完成所有试题。缴卷时，韩国钧见林锡三督学提笔在诗句“染成怀素纸，冷煞灞桥人”上圈点起来。韩国钧日后说起这段往事，印象极深，并流露出几分得意与骄傲。

林锡三是资深督学。他的眼光当是不会有错的。他信手一圈，便圈点出扬州所属考区诗赋第一名的韩国钧来。

紫石终于入学，也就是俗称的中秀才了。至此，他跨上了科举入仕的第一个台阶。只有“入学”，才能有参加每三年一次的江南乡试（考举人）的资格。

紫石既已中了秀才，年不过21，正处在科举入仕的最佳年龄。难说三五年后不弄个举人进士什么的，功名远没有到



头。何况紫石才20出头，前途当不可限量。

有道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即便是韩国钧所处的19世纪晚期，中国大地上仍然顽强而愚蠢地以科举制度抵御着商业文明。换句话说，就是读书人还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至少是世俗的看法仍然偏重于读书人。《齐如山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第一章中说得分明：一个人参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级最低的科举考试，甚至连秀才也没考上，在当时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见知县时可以有座，也可以与官员们同桌用餐。与此相反，一个商人，即便是海内巨贾、富甲一方，见知县时却难得有座，也不得与官员同桌用餐。当然这只是场面上的规矩。

韩国钧考取秀才后，即与王氏完婚。时在光绪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公历实际已是1878年的1月12日了。从时间上看是极紧凑的。几乎是一发榜，即举行新婚仪式的。丁丑年是韩国钧的双喜年：中了秀才，又娶老婆。虽说秀才并没有实质性的功名，但不管怎么说也是入仕征程上一个好的开端，加之新婚之禧，此正所谓“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人生两大乐事也。

当时关于王氏姊妹易嫁的故事流传甚广。就连1942年韩国钧逝世后，陈毅在《悼韩紫翁》诗中也说：“深闺易嫁青眸标，相逢地下开颜笑，模范夫妻万古昭。”看来姐妹间确实是易嫁了，但因何而易嫁，在此不作深究。

韩国钧夫人操持内政，温和恭谨，大江南北，极有贤声。民国十二年（1923）紫石在江苏省省长任上，夫人病逝于南京官署，他以10万俸钱，营奠营斋。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名流均有挽词。韩国钧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低吟道“霜雪头上多，投老归谋成自罔；衙斋铃尾罢，退闲温话更何人？”夫人王氏遗像的两侧有紫石的挽联“不因空屋宁淡佛，尚未归田苦忆君”。后来紫石归里，特将此联携回，在海

安韩宅的小洋房起居室内悬挂，可见伉俪情深。

韩国钧宦海40年，纳妾乃至涉足欢场的机会那是太多了，但韩国钧始终坚持操守，平生不二色，深得世人好评。

## 中举前后

光绪三年（1877），韩国钧入“邑庠”。明清两朝称县学为“邑庠”。但韩国钧并未去泰州的县学学宫继续深造。不知是因为经济原因，还是季考成绩不理想。按清制入学的秀才，经季考，成绩最优者称为“廪生”，可由公家供给粮食。而韩国钧回返西寺刘氏学馆任教习，当然有了秀才的“文凭”，可以开“经馆”，讲经授业、传道，是通学问的路子；没有秀才头衔的只能开“蒙馆”，做识字班的老师。经蒙之别，不仅在教课的内容上有区别，先生的待遇也有大的差别。紫石在西寺任教读师，“岁入修脯七十千”，差不多是三五元大洋的样子。钱虽不多，但时价可购大米700斤，一年的吃饭问题大致解决了。同时，他自修研读，以应乡试。这样既可以学以教，又赡家用，实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有一说海安为泰东大镇，“邑庠”设此，西寺塾馆作为“县学”的分设，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入县学，但不住县学宫，这种情况清时非常普遍。但这并不影响“生员”的深造，自修，或请师单独辅导，然后按期去学宫考试，这种学习方式古已有之，不独今日仅有。

事实上，这一时期，韩家彻底败落。二兄为债务所迫，自沉曲塘西桥下。其时“家贫不能自给”，“日午不能举火，勃谿之声时作”。穷到什么程度呢？到了中午连烧火做饭都不能。“勃谿”就是弟兄为此常有口角。紫石读了10多年的



韩公馆前厅

书，抱负虽大，但对经营治家一类的事，实在是生疏得很。大哥名义上挑起了家庭的担子，但体弱多病，每日咳嗽不止，形如干柴，全仗二兄坚甫（韩诚）勉力维持着生产家事。

紫石的新婚妻子王氏倒能通达情理，“质其钗钿，以度日”。就是当去值钱的陪嫁，当然是金银饰品了。

光绪四年（1878）七月初七，紫石早起床，洗漱时正欲与夫人商量些

事，夫人却先说出了想法。于是，店铺开门的辰光，紫石去西寺教课，夫人去了当铺。夫人也是要强的人，原本想回娘家筹两个钱，但怕紫石面子上挂不住。再说，爹娘见此窘况又怎能不心疼。于是，一咬牙，把陪嫁的金银细软，悉数收罗进包裹，换成当票和钱。

早晨，去西寺“经馆”时，紫石的心头舒缓了许多，但隐隐约约对妻子有些愧意。然而，舍此却寻不着更好的办法了。也只能先对付家中眼前的境况，有亏爱妻的，容当后报啊！

西寺“经馆”管先生一餐午饭，天傍黑，紫石回到家中，不见二哥形影，一问才知：今儿大早去了30里外的曲塘镇西乡友人处借钱去了。紫石与家人一直守到三更天，也不见二哥回来，心头笼罩着一丝不祥的阴云。

翌日，曲塘来人报说：韩坚甫投曲塘西河自尽了。

韩国钧十万火急地赶到曲塘，见到二哥时，其尸体已经膨胀，但容颜不改，惨白毫无表情的脸，像睡去一样。紫石不忍卒视。手足同胞，就此天各一方！

上门催债的听到这个消息，有些惶惶然，惟恐韩国钧涉讼。韩国钧说：“家兄自寻短见，此事你们不负任何责任。我不能收你分文。”遂将其礼送而归，以宽厚仁和的胸襟气度处理完此事。随后尽其力，薄葬二兄。

街邻乡里对紫石处理此事的评价甚高，都说三秀才日后终有善报。只是紫石每每忆及二兄入殓之时的简约，恨自己无力厚葬仁兄，心中隐隐酸痛，觉得愧对二哥坚甫。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第二年秋考，韩国钧和同乡陆子才同赴江南应乡试。乡试，就是省考。乡试是相对于京试而言的，也是俗称的考举人。

陆家与韩家为紧邻，是东街名望之家。子才年长紫石五六岁，是癸酉选拔的秀才（同治十二年，1873）。

考完试打道回府，一路上两人都少了许多话语，但其心情大同而略异。陆子才是第二次应乡试，心情自然复杂得多。旧时中举是很风光的人生大事，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那些落榜下第者的悲哀。陆子才已领略过这种人生况味。当得意的马蹄在身边驰过，喧天的鼓乐在耳畔鸣响，新科举人的名字在街市间哄传时，那些轻蔑的目光像利箭把你从上至下穿透。落第者此时此刻不得不低首叹息，恨不能地开裂，钻了进去，永不返回。所以说“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归懒举头。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陆子才就深深体会到，一个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家人，在心理上都是千难万难的。因为科举得失已成为一种牵连着家庭、亲族、故乡、姓氏荣辱的社会命题，远不是个人的事了。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一个姓杜的读书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正想回家，却收到妻子寄来的诗：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时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

这位妻子因丈夫落第而羞愧，希望丈夫趁着夜色偷偷回来的心情，既真实，又无奈。

韩国钧的妻子没有给他写信。他早早地回到海安，期待着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没有想这么多。他当然希望自己能初试及第。可他毕竟才20出头，又是第一次应乡试，心里实是没底，尽量调整好心态，作最坏的打算，这样在面对残酷的现实时，心理有准备，不致失衡，也可及早摆脱失败的阴影。

那日傍晚，一匹快马急驰而来，在陆宅前停下，报捷者高叫：“陆郎中举！”话音未落，韩国钧只听隔壁陆家一片喧嚷与欢声交作。虽说自己初次应乡试，不敢有此奢望，但闻其声，亦怦然心动。适在这时，有人问：“海安还有中举的吗？”报吏笑道：“此区区乡镇，得一足矣，怎可他望！”此话既出，紫石顿时陷入怅然若失的境地，如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紫石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竭力使自己复归到平静之时，突然门前一阵闹猛，报吏入韩家报喜：“韩国钧（紫石）中九十六名举人！”原来是报吏卖了个关子，此前此后，起落之间，一在浪尖，一在谷底。

霎时，韩家满屋生春。

韩门中举，如大旱之甘霖。韩国钧听到中举的消息，更是欣喜若狂，疑梦疑幻。真是“喜过还疑梦，狂来不似儒”。

韩国钧悄悄溜出门，立于运河岸边。他长吁一口气，伸了伸身子，舒缓放松着18年来苦读受累的身心。他仰望天空，喜极而泣：苍天不负有心人啊。满天星斗，我是其中的哪一颗呢？我能发出更大更长久光华吗？面对这个盼望已久而又迅捷获得的人生转机，紫石细细地品味着昨天和今天。

哗哗作响的运河水，以千年不变的姿势缓缓东流。从隋炀帝开邗沟始，这条运河作为它的支流就已存在，这恰恰暗



韩国钧故居走廊

合了从隋至清整个科举制度延续的时间。紫石并不能预知30年后它的衰亡。但此时，三闾大夫屈原的“其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最能表达韩国钧的欣喜之情。

等待他的将是更严峻而艰难的科场搏杀：京城会试。

韩国钧光绪五年（1879）中举。次年开始，至光绪十五年（1889），其间10年，四赴京城参加会试，另两次时在光绪九年

（1883）和光绪十二年（1886），都无功而返。在科场最高阶段的艰难搏杀中，韩国钧成为一名品尝最后苦涩的失败者。

韩国钧6岁发蒙，由秀才而举人，又四次参加会试，27年苦心孤诣，走到这一步，真可谓毕其功于一役。从贡院到金銮殿，说远就是万山阻隔；说近也就是一步之遥。难，如上青天；易，又恰在反掌之间。

韩国钧此次进京赶考，本来就是文人与朝廷之间的一次秋波对接，也是与政治初订情缘的一种努力。紫石至今不能确知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最终落第。要说这次进京的最大收获莫过于以缪荃孙的推荐信能结识一些官场显要，搭建与上流社会沟通的桥梁。此举虽说不能立竿见影，但在其



后的“大挑”试时，就显现出来。大挑是清代对举人的任用办法。六年一次，于会试后举行。凡经三科以上会试不第之举人，及因故未应会试者，遇挑之年取具同乡京官之印结，呈请礼部造册，注明年岁，咨送吏部，由大臣从中挑选。按人文并选，身言兼试的原则，选一等者任以知县，并可补州府官；二等者任以教职。大挑意在使举人出身的人得以有较宽的出路。

韩国钧大挑居末排，而其所居之排仅17人。按例每排20人中挑3人为一等（任知县）。初排3人，有郑士敬、徐采先、韩国钧；而主考王大臣认为此排不足20人，只应挑2人，遂黜名列第二的徐采先。此人因此终身潦倒。从光绪五年（1879）以来，十年四赴京城，都铨羽而归。但紫石离开偏僻的乡邑，走出苦读的书斋，涉足京城 的社交圈，以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眼光，捕捉许多新鲜的感观；以年轻的心态，吸纳先进的思想，激活和呈放出生命的光华。

## 幕府历练

韩国钧自光绪五年（1879）中举后入幕，到光绪十五年（1889）依例应大挑，得一等，即以知县分发东河（也称河东道总督或河东总督，管辖河南、山东等地黄河、运河防治工作），前往开封，经河道总督甄别，改分河南归地方候补，前后10多年时间。这是韩国钧的官场见习期。

十年间，紫石先入如皋县幕，后随知县刘梅荪转赴甘泉、六合、金陵等地。在吴学使幕三年，游历豫南北96县，考察山川、道路、风俗民情、地方利病之所在，撰《随轺日记》一卷，绘有《经行道里图》。他是一个有心人，一个认真的见

习生。他勤敏、多思，言少，而笔勤。所见、所思、所悟，皆倾注笔端。

这一时期是韩国钧了解社会，熟悉官场，与中下层官吏相交、相识、相知的过程，从中领悟到许多为官之道，学到了许多书中所没有的东西，从而奠定了他日后行政的基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幕客与整个清代社会的相依相存的关系。

清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清王朝建立时，中国社会已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后期，中原地区的各种政治制度已相当成熟，统治经验也十分丰富。而满族在入关时，它的经济、文化水平都落后于被它统治的广大汉族地区。清承明制便成为上层统治者执政的必然选择。而统御地方的满族官员为了更好地处理与中原各民族的关系和保证地方政权的正常运行，则不得不延聘一些熟谙国家政治体制和各方面典章制度，具有专门行政能力的人员来辅助，这是清代幕客倡兴之不同于别的朝代的原因。

八股取士的选官制度尽管在历史上有过积极意义，但此时已走上穷途末路，严重束缚了士人的思想才智，使清代官员普遍缺乏治国安邦的经世能力，不得不以幕客为补。幕客集团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与清代历史相始终。从督抚署直至州县衙门广泛存在于清代的各级地方政权中。他们无职，却能对地方行政指手划脚；无权，却能享有一定地位。他们保证了地方政权的正常运转，有拾遗补缺、匡正地方官失谬之作用，另外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清代的任官回避制度，对幕客集团的壮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回避制度包括地区回避、亲属回避、职务回避、科举回避等多项具体规定。地区回避是其中较为重要的部分。例如如皋县知事刘梅荪，就是广东人。昭文县（今属常熟）县事徐树钊，就是长沙人。

韩国钧入幕，一方面寄身官府求一温饱，让肚中文墨不



致废弛；同时也是蛰伏待机，以求有朝一日能腾达显身。10年中，紫石恪尽职守，小心翼翼，又要保持尊严、人格，实在也是一种修炼。“幕府佐治以尽心为本”就是一句大实话，不尽心行吗？幕客的影响实在是大而无“形”，对当权者行政起到润滑和辅弼的作用，间接地获得参与当世事务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经世之志。另外，在当时的幕府制度下，宾主之间基本上是一种平等关系，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样，游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护幕宾的尊严。游幕还可以获得一定的条件，发挥自己的特长，从事学术方面的活动。

韩国钧在如皋县幕，设帐教刘梅菽的儿子，这只是作为幕僚的部分工作。他任教读3年，与刘家父子朝夕相处，学会了粤语。其间，刘知县每每判案，因言语阻隔，不能察案情而迅结，就须由紫石转译。若干年后，紫石在广东任劝业道兼兵备处总办，审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时，以粤语相诘，审讯进行得很顺手，同僚大为惊奇：“江苏蛮子，粤语如何这般地道？”这就是幕府中积累的功夫。

作为幕客，紫石在“刑名”（律令、律例、案件裁决和案犯的处置）、“钱谷”（赋税的征收、经费的出纳）方面学到了不少知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行家里手”。他缺的只是一个名分——头衔。

如皋县衙为韩国钧提供了衣食饭碗，他可以暂栖在温饱的巢穴中。这个舞台虽小，龙套人韩国钧跑得有劲，并能耳濡目染，看到和悟到“角儿”们的演技功力。县衙还是一扇窗，能洞明世事，比起书斋来开阔得天广地宽。如城三载，紫石结识了顾延卿、陈子寿、谢杏农等有识之士。顾延卿的父亲当时在上海开书局。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为西学东进的登陆之处。顾自是见闻广博。顾常邀紫石在水绘园聚首，纵论国是，大谈“西方实用之学”，思“借夷人之长技，求富国强兵之道”。当然这些宏论只是浅表地涉及一些时新话题。但

即便如此，亦如死水潭中投石，激起的是思想的涟漪。

水绘园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是冒一贯的别业。历四世，到冒辟疆时方臻于完整。绘者，会也。南北东西皆水绘其中。水绘园是一座饶有书卷气的“文人园”。

明末，国事淆于上，清议激于下。冒辟疆与侯朝宗、方密之、陈贞慧四大公子都是文人政治组织“复社”的骨干，他们欲担负天下兴亡之重任，聚集留都南京，由吴次尾起草了《留都防乱揭》，历数阉党阮大铖诸般罪状，义正词严，吓得佞臣不敢出门。后来阮大铖死灰复燃，复社受挫，冒辟疆险遭迫害。清兵南下，南明王朝顷刻消亡。大浪淘沙，吴次尾抗清殉国，方密之隐匿乡间，侯朝宗则降清应试去了，而饱经风霜的一介书生冒辟疆，空怀报国之心，只得仿效生于乱世的阮藉、陶渊明归隐皋邑，更园为庵，寄情于山水，啸傲园林了。

水绘园的山水间所寄寓的人文精神对青年紫石无疑是有影响的。20世纪的东方巨人毛泽东曾评价说：“所谓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冒辟疆是比较重实际的，清兵入关后，他就隐居山林，不事清朝，全节而终。”

县衙的沉闷与水绘园自由的天空形成很大的反差。每隔一些时日，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都要聚首水绘园。他们除谈论冒辟疆的骨气外，也谈董小婉的惊艳。但谈得最多的当是民生的艰难、政治的黑暗。他们把水绘园相聚时的高谈阔论称为“精神会餐”。这中间常有唇枪舌战，争论的最后结果：紫石坚决主张清明政治，救民于水火，而以顾延卿为代表的幕客和其他友人更主张购军火、炮舰、轮船，办兵工厂、船厂，开矿、造铁路。国强民富，一切好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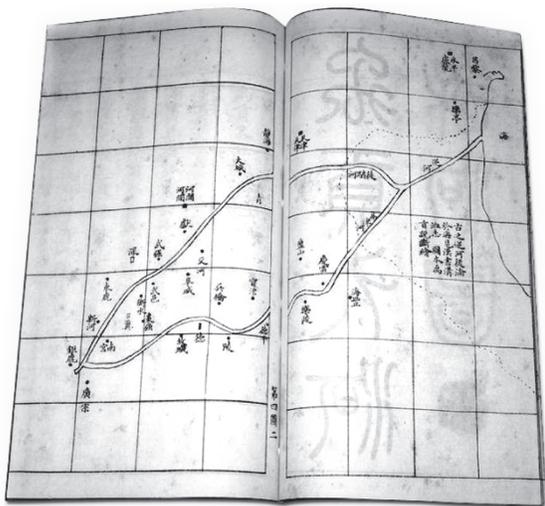
这些实业救国的理想紫石虽然赞同，但他始终认为：政纲举，百业兴。只有为政清正廉明，百姓才能安居乐业。舍此先决条件，别无所能。紫石的矛盾与困惑也在这里。

十年幕府，韩国钧在六合县幕时间最长。幕友凤阳人



胡渊如绘燕子叭形势图，紫石由此知有测绘之学，并悉心研究，拜胡渊如为师。

光绪十三年（1887）秋，黄河郑州段决口，韩国钧阅《禹贡锥指》，开始研究黄河变迁。恰在此时，扬州梅花书院以“黄河之变迁”作为月考题。紫石虽然入幕，身为幕僚，但他当时仍是入学的生员，而此间四处京师参加会试亦在幕府之中。所以他时要入学宫受月课，相当于今日的在职短训。紫石把悉心研究所得的《历代黄河变迁图》绘于试卷之上，旁有精辟论述。老师阅后大加赞赏。随之，各地有《变迁图》流传，后列入《扬人传记》卷首。



历代黄河变迁图

这期间，韩国钧开始接触英文。当然这种学习并没有坚持下去。一是其后不久他应大挑一等，分发东河，紧接着就有实职而司，那就要以全副的精力去对付实际性的工作。二是他当时认为“此奚必劳吾脑力，他日有需此者，一译生足矣”。及至后来任交涉使时，始悔此前之不学。作为一个受

过很好传统教育的封建官僚，或者说是准官僚，这些想法都正常不过。更何况百年之前，上流社会对英文的认识大抵还停留在“异域之语，闻之甚奇”的阶段。有学识的官僚与治中西之学的博学之士终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把学问当作行政的工具，当然不否认学识对人的思想的影响；后者呢，则是把学问作为生命的一部分。英文不精，岂能“打通”西学，学贯中西。

十年的岁月，不能算短。寂寞10年的准备，既是必然，也是无奈。但是通过漫长的官场见习，韩国钧已完全进入为官的角色，并为以后漫长的宦宦生涯打牢了基础。他在与众多县官的直接接触与辅弼中，能够兼采众长，并开始看到官人的“短处”，这是他迅速成长的标志。他的底气渐渐足了。他坚信，凭自己的德行与才干一定能有所作为。

这一时期，国事日非，国家的麻烦多了起来。韩国钧深感旧学无补世艰，“学等于不学”。

与四方贤士大夫游，对经世之学的理解更深了一层：所有的道路只在权力的护卫之下才能通达。结论：吏治为先。

韩国钧自己对10年人生的总结更能说明问题：“县幕先后十年……与当世贤大夫游，蓄道能文，助我不少。余后来稍有知识赖此十年。”



## 知县起家

### 棘手的开局

光绪十八年（1892），韩国钧归河南地方候补，即候补知县，官阶从七品。这时的紫石是半个屁股坐在县太爷的太师椅上，半个屁股悬着，等候挨实了，就算“转正”。但人事的变动，一是要有机会；二是要有人用你。弄得好，是一时半刻的事；弄不好，也许就得无限期的闲着。因为首要的一条是候补官员的人数众多。清朝开国伊始，进入官场的渠道主要有荫袭、保举、科举等途径，也存在着一定的捐纳现象，不是常态。但从道光朝起，为了增加朝廷收入，减轻财政负担，捐纳一途成为常态，卖官买官，蔚然成风。由此，候补官员的队伍骤然变得庞大起来。晚清官员的编制大概在4万左右，候补官员数约为在编的6倍多。这就导致在如过江之鲫的候补者中，从候补到实缺，既要看机会，又要凭运气。

恰在此时，开封太守濮青士举荐韩任发审局职，随后豫省按察使（主管省司法的官员）将其招至门下，任按察使署

督审局臬员（审判员）。

当时震动朝野的“桐柏京控案”和“藩司长远帆禄参案”，牵涉众多朝廷命官。前一案，紫石参与审理，因现存资料所限，已不能深考，细节与详情不得而知。而“藩司长远帆禄参案”则由紫石与李直刺同审。此时巡抚大人虽有手谕：“此案讯诘非认真不可”。但这大抵是很堂皇对各方都好交待的台词，其深意则视具体的人与事，不同的关系与背景，而有所不同。具体到直接办案的人，就如履薄冰，弄不好一脚踩进冰窟窿，也未可知。

韩国钧的难度在于以从七品的官阶，审藩司（布政使）门人，宽严两难。此正所谓初入官道，即遇大难。这里面还有个背景，即督抚不睦。晚清官场中，督抚不睦是官场中常见现象。这些为韩国钧审理此案带来更多的难处。

韩国钧已无退路。这个准七品县官头一回正式进入官场操练，就走在钢索上，不用说马虎，就是小心翼翼未必就有好的结果。偏袒权贵，草率结案嘛，不用说良知不允，即便如此，对上也未必能交得了差。须知权贵之间，政敌咬斗，必欲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弄不好，你韩国钧就是一只替罪羊。对下呢，亦不能服膺公众社会，平人心舆论。执法不公，徇私枉法，得千古骂名，那是跑不了的。

清代，尽管社会分工日趋细化，行政的名目也渐渐多起来，但地方官仍以刑名（司法）、钱谷（赋税）为主要职能。而刑名关系所辖地面的稳定，乃当务之急。官员的所作所为就是社会政治的一面镜子。廉与贪，正与邪，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孰重孰轻，一戥定论。

韩国钧此时已骑在虎背上，下也不能，不下也不能。既然如此，那老虎屁股还不如摸一摸，那冒出的脓疮还不如挤一挤，兴许能在凹凸中踩踏出平坦，能让患处长出新肉。

紫石决心已定，就在心中谋划下手破脓、去烂敷药的



韩国钧生前把玩的黄扬

方法。但一个月过去了，迟迟未升堂审理。一时间，祥符地面传闻颇多，无非是审与不审，上下都不好交待。审吧，这藩司（布政使）岂是好惹的主儿。

韩国钧对此案丝毫不敢懈怠。事实上也没有折衷回旋的余地。他明查暗访，搜集证据，推敲琢磨着审讯之法，来个“一堂过”，让藩司大人无话可说，嫌犯知罪伏法，百姓叫好。

为了慎重起见，韩国钧与同审官李直刺商量后，决定再登济宁河督许仙屏府，请示此案的审理。韩国钧以大挑一等分发河南东河，就是由许仙屏“甄别”后改分河南归地方候补的。所谓“东河”，清代设江南河道总督一人，称南河，驻清江浦。山东、河南河道总督一人，称东河，驻济宁。紫石与许河督有过一面之交。《永忆录》中有“许仙屏河督奉旨查办藩司长远帆禄参案，委桂臬司香屿霖提审，桂委李直刺子铮与余同审是案”的记载，但许多史料都证实许仙屏并未真正介入此案。按清制，河运总督，为二品大员；藩司、藩台是

布政使别称，为管理一省民政、财政的官员，与明代的布政使为一省之长不同，从二品官员，位于督抚之下。掌一省司法的按察使是正三品的官员，又称臬司或臬台。布政使与按察使，并称两使。可见桂臬司也是一个“夹缝人物”。但桂臬司毕竟专门吃司法饭的，而且是个老资格的司法官。“桂非俗吏，能文章书记。”韩国钧怎能不小心谨慎呢？处理不好，可能仕途就此为止，或者连自己也赔进去。十几年的科场之路，10余年的幕府修练，大挑的万幸，这一切都积聚到对此案的审理上了。韩国钧没有贸然立即审讯，而是请教了有丰富司法经验的桂臬司：“此案究竟拟如何终结？”桂无以答，只说：“必请示河督大人。”河道总督的态度对审理此案尤为重要。河道总督许仙屏当然也是大原则：“讯鞠非认真不可。”既然上上下下皆云认真，我韩某岂能不认真？韩国钧就分别“研讯”，各个击破。桂臬司有韩李两人冲锋陷阵，也算为这个案子留下回旋的空间，但桂为韩国钧出了不少主意，并没有玩“江湖”。所好的是同审官李直刺虽然话不多，不言其虚，但工作实在，在提审、取证上颇费了心力。整个案件的“死结”就是藩台大人的门丁袁某（这里说的门丁，是指藩台署中有些名位的人。否则，他不可能招权纳贿），初提审时袁某死硬，哪里把桂臬司、韩国钧、李直刺放在眼中。紫石虽说出道不久，但在县衙中多年，也算见多识广。啃不下这袁“骨头”，后面哪有戏呢！韩国钧依《大清律例》之《刑律》《吏律》判结，并“拟具呈覆稿”上奏。

总督大人此时的犹豫也消失了。许大人负责此案也是御旨所批，不得不为。但是官道深厚的许大人的“距离感”起到意外之效。韩国钧若久拖不决，审不出什么名堂，那是你无能，藩台对我没有什么说的。若一讯而结，不拖泥带水留尾巴，也算我脸有光彩。毕竟本大人负责抓案子嘛。你藩台大人该记恨哪一个呢？你奈何得了韩国钧，且奈何；奈何不



了，也不算你藩台大人无能，毕竟铁证在此，无话可说。

案后，藩台大人见到韩国钧说：“汝才具好，但聪明不可过于外露！”有责备、不快之意，也有警示之意，而告诫韩国钧“聪明不可外露”也可看作是藩司自己官场经验的总结，从反面也隐含着对韩国钧才能的肯定成分。毕竟，门丁招权纳贿，铁证如山，主人有失察之责。

韩国钧办“桐柏京控案”和“藩司参案”两大案后，又经“吏馆”（见习官员例行培训的）的考试，成绩屡列前茅，遂奉调赴南阳府的镇平县任知事，算是“转正”，由从七品晋升为大清朝正七品官员。

## 县任作为

光绪二十年（1894）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韩国钧先后在河南南阳府的镇平县、开封府的祥符县、怀庆府的武陟县、归德府的永城县、卫辉府的浚县任知县。其间，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至二十五年（1899）三月间曾担任过河南铸钱局总办兼官钱局帮办等职。

应该说，韩国钧初任县职时，是按传统为官的道德操守来要求自己的，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官尽一份心，民少一份屈，地方少生一份事。

韩国钧刚入镇平县境，尚未见县衙的影子，就收红呈（讼状）500余纸。镇平素来“健讼”，这无非是县官治理无方，弄得所辖地面纷乱异常，争讼日多。韩国钧中年为官，机会来之不易，因此倍加珍惜它。韩国钧的勤政那是出了名的。刚到镇平就任之初，一日判26案，一切就绪已至午夜，还要“乘马周巡三四十里，翌日视事如故”。

韩国钧在镇平任上做了一件基础性的工作，使地丁的征收有了依据。

明万历年间曾普遍推行“一条鞭法”。主要内容为简化税制，先将赋和役分别归并，再将扰民最重的役逐步并入赋内，但丁银和田赋仍为两个税目。这是中国历史上田赋制度最重大的改革之一。清时“摊丁入地”，田赋与丁银合一，简称“地丁”。这样做一是便于征收，避免多名目下的混乱和人丁增减带来的差错；二是进一步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死无徙乡”，流民日少，对巩固封建统治是大有益处的。而地丁的征收，各地都是按图索“骥”。

韩国钧不久就发现镇平并无地舆之图。地丁是由地保负责催征的。地保说多说少，全凭他一张嘴。这样做的结果，一是不能保证地丁及时征收到位；二是地保弄权，欺上瞒下，敲诈乡民，强收多收，从中中饱私囊。韩国钧在六合县幕中，有幕友胡渊如在其扇面上绘“燕子叽形势图”，由此他向胡悉心讨教过测绘舆图之学，对地图的知识是知道一些的，后来也亲绘过“黄河历代变迁图”。

其时县衙职能并无太细的分工，除幕僚们拾缀一些文牒外，身为一县之行政长官事无巨细都要亲躬。虽说县太爷懂得测绘之学，但一县之大，纵横逾数百里，全县地舆之图总不能知县亲自测绘。

韩国钧想出一法：绘一图例，以一华里开方，责成各地保按方绘其所管之村庄、田地、河渠、桥梁和路道，并注明里程、人口等。如地保不能绘制，则请地方士绅代行，并限令在规定时日内交图卷。地保久闻韩的严明之威，不敢懈怠，都按期交了图卷。可是，韩国钧见所交的图卷，五花八门，有的把河渠画成蚯蚓、巨蟒；有的把村庄绘成宫殿、市镇……紫石问何故致此？答曰：河弯曲如是，村里确有庙堂，何错之有？其实都是比例失当之故。再大的庙堂在县图上可



能就是一个小点或一个标记，都不可能详绘出翘檐和砖隙。如此糟糕的图卷，怎能整合一体，构全县地舆之图？

众图卷之中，只有一卷清晰能详，比例适当，经实地考察，确实准确反映出属地的村镇之貌，山河之状，田地之实。韩国钧询问后，知是一落魄秀才戴某所绘。于是韩国钧传戴秀才来县署见官。紫石询问生平境况后，就命其绘全县地图，戴秀才遵命。从春至夏，戴秀才于县衙后院，天明即起，先洒扫庭院，然后伏案精绘，四乡八镇之图，重新整合。遇有疑惑疏漏之处，定要实地勘查，矫正纰缪。夏收之后，遂使用此图开征。

邻近的上蔡县知事徐受之，郾城县知事周世臣闻说后，先后至镇平详察其情，并延聘戴秀才去上蔡、郾城绘图。上蔡、郾城县图绘就，戴秀才制图之名大噪。从戴某“自后各县争相罗致”的情况看，绘制县境地图在当时当地实为创新之举。主要还是绘制县境地图为社会治安管理、地丁征收带来极大的方便。另外一点，就是发现人才，以韩国钧的眼力，相中了一匹困顿乡野已久的好马。

镇平的区划地界算是了然，但户籍管理混乱不堪，户口与人丁多有不符。韩国钧悉心清查。每村造一册，册封首页绘本村全图。每册户分为三等。甲等：富户良民；乙等：穷困本分之民；丙等：无业，不务正业者皆列其中。韩国钧认为，刁民奸宄尽出丙等之列。当然韩国钧造册分等，囿于他对社会的认识，时代的局限，不能用今人的眼光衡量，但这样做客观上起到一些积极作用。一是规范了地保催征赋税的行为，收多收少皆有凭据，减少了随意性；二是为审案判案，提供了方便。造册之后，韩国钧每次升堂断案皆携此图册到庭，遇有田产水源之争，按图以索，烛照分明。一堂判决，被告原告，都无他议。

另外在清查造册过程中，一些游民奸宄遁去他乡。如果

这些丙等之户确系坏人，虽然不能说从根本上减轻社会治安的压力，但镇平县境一时确实平安不少，民事刑事纠纷骤减。

韩国钧在镇平任上时间不长，差不多一年时间。光绪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1月）韩卸署镇平县事，调往开封府祥符县任知县。

韩国钧卸任起行之日，据说镇平百姓无分老幼，相送者不绝于道，舁舆以送，就是说大家争相抬韩国钧的轿送一程。人愈多，争拥尤甚，差点将轿子倾覆。韩国钧回望远去的乡亲，心中感念万千：中国百姓之善良世所罕见。我任上之所为，不过是应为之，百姓却爱戴感念至此，实在令人为之动容。这更坚定了他“察民之疾苦，解民之所忧”的为官信条。镇平任上韩初试“牛刀”，竟游刃有余，政声鹊起。想到此，韩国钧竟多少有些踌躇满志。

韩国钧离开镇平还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镇平北接伏牛山南麓。伏牛山亦称嵩少山，为秦岭东段。西北—东南走向，长约400公里，是淮河和汉江的分水岭。

韩国钧素爱兰花。伏牛山多建、墨二兰。它淡而清香幽远，回味隽永。韩国钧来镇平后一直想去山中观兰。这是他的积习，每到一地，山川景物，人情地理，总要熟悉一下，以丰富感观。看山野之花，赏风露之赐，纳山林之息，吐胸中之浊，是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也是官员排遣的最佳方式。但“终因事累而未果”。这是紫石的遗憾，也是伏牛山的遗憾。

光绪二十一年（1895），对韩国钧来说，是得失分明的一年。韩国钧此时在河南地面官声渐起。原河南省藩台大人，因“藩司参案”丢官，新任藩司玉如大人，曾驻防四川，为额勒精额（驻防将军）。清代的将军一般不能指挥作战，但在战争中可起监军的作用。由于将军是皇室在地方上的



代表，他可以暗中监视包括总督、巡抚在内的地方文武官员。玉如，旗人，其貌清矫拔俗，英气逼人，为官清廉自守，严正不阿。玉如与韩国钧从未谋过面，但贤长官用人，惟才是举。韩国钧在回忆录中写道：“余之调祥符也，由藩司采余虚声。”玉如闻紫石治事勤恪，善治民生，是个可用之才，就点将调祥符任知县。祥符县治所与开封府治、河南省会同城。玉如藩台可直接考察韩国钧的身言与才干，此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若是真正贤能不俗，也可向吏部“引见”。引见是清代制度。四品以下外官(相对于京官而言)均须由皇帝接见一次。文官由吏部带领朝见。这既表示君权的威仪，也是下官晋升的良机。祥符的官司也是繁剧，紫石只得“延同官为助”。这些来帮助审案的同僚叫发审员，共有七八人，费用当然由县衙支出。尽管如此，紫石不时还要亲审。

中军厅署失窃案，就弄得韩国钧焦头烂额。此中军为抚标中军，就是由河南巡抚直接管辖的绿营兵的头儿，为参将衙。

韩国钧每日察民情，审积案，辛劳自不待言。但至年关岁底，县衙经费必亏贴数万。前不久紫石向许州(今许昌)吕芝崖刺史借8000金，不到一月即告罄。

春节将至，各院司大署索要年货者甚多。仅巡抚衙门所索，计值就逾万。紫石一愁莫展。

清时上级机关向下级机关索要礼货，无电话传真，这种函称为“札”，是清代具有公文性质的书信转变而成的下行文书。札的使用比较简便，不编字号，不盖文印，也少用公文套语。“札”，派信差送达，即为凭据。韩国钧将“札”排列于案，年债如山，自己此前借贴得不少，今思来想去，实在无法，就带着巡抚衙门的折子去谒见巡抚大人。

刘巡抚打开折子，阅毕大诧：“本署膳房需铜壶铜盆各两只，锡酒器大小二十盏，内室需瓷器数十，合计不足千金，

怎会有万数之巨？”随即从笔架上取出笔来，于“札”之空白处批道：“如有额外索需者，治以应得之罪。”紫石见此，欣然告退。

隔了两三日，刘大人派亲信来县衙催办“供应”，数量与前“札”不减。至此，韩国钧明白巡抚大人的作派为人。事已至此，只好咬牙筹办。无钱，就再行借贷。仅此支应，又亏万余，并“陈明于某处某人肆贷的若干”数目。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刘巡抚觐见两宫时，慈禧问：豫省有何良吏？刘大人力举韩国钧、徐受之及蒯沈诸人。不久，朱批下来：送吏部引见。这对出道不久的七品下官韩国钧来说，确实是一次好的运道。引见虽说是一种制度，但时至清末，已名存实亡。小官吏只有特别作为和特殊机遇的，才能受到太后皇上的召见。

韩国钧以自己对朝廷的忠诚，对民生的负责，把勤于政事与圆通上下关系，作为官场生存的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打通了自己通往未来的路。虽说为清积案，延聘七八人作为发审员，为完成上司交办的“供应”，四处筹借，穷于应付，呈一时之窘。但吃亏，对于长远来说是一种投入，回报当远大。经济的亏空，就铺垫出好的前程来。在县太爷的位子，你可以弄几个小钱，滋润滋润，实惠实惠，但决不可能有后来作为封疆大吏的韩国钧了。尽管清末，世风日下，官场腐败，买官鬻爵的，大有人在，但清官还是有的。反过来说，如果韩流俗于庸人之列，各方嘉许的一代贤臣就止（死）于知县任上。这大概是没有疑义的。

光绪二十二年（1896）秋天，韩国钧一行三人从祥符县去武陟县赴任。武陟县位于河南省北部，沁河下游，南屏黄河。秦始皇时始置怀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县份。自古怀县盛产山药、地黄、牛膝、菊花，号称“四大怀药”。一入武陟县境，只见遍地“石田”。所谓石田，即因沁河和黄河挟带



大量泥沙，“每一溃决，沙压平地数十里，弥望皆成石田”。秋风起时，漫天遍野，沙尘蔽日，一片昏暗，而天地间寸草不生，满目龟裂。当韩国钧一行到了县治所在的木城镇时，几个人早已灰头土脸。按照中国人的计年方法，这一年紫石刚好40岁。

韩国钧上任伊始，就深入乡间地头，拜访有耕作经验的农夫，了解“石田”的成因，研究救治之法。他创造出一种治沙妙法：“令民间翻沙试种。每距三尺，掘一沟。后掘之沙，填入先掘之沟。由前而后，随掘随填，更番叠进。”这种方法，成本小，见效快，不到三个月的功夫，武陟县境的“石田”大都得到改良。“民人自顾其私，乐此不疲也。”老百姓见休养生息的土地能得到改造，他们看到生的希望，当然每日治沙不止。这一年武陟县治沙增加良田40 000余亩。

在处理公案方面，韩国钧积十年幕府之功，加上秉赋神明，直把原告、被告断得心服口服，所审之案迅及而无疏漏。

韩国钧在武陟任上，用行政手段（非入读者课以丁银）于蛮武之地设塾办学，“以诗书化其不驯之气”，也算是中国教育史上一处独特景观。

武陟县内有个叫木栾店的地方，为回民居集地。民性刚，骠勇好斗，尚武之风沿袭千年。这里西近温县，南接嵩山少林寺。温县陈家沟是名声很大的陈氏太极拳的发源地，起于明代，臻于清初。这个更适合现代人习练的拳种的完善，最初完全是出于进击的需要，其中有木栾店人的智慧和贡献。由此可见，木栾店人习武的地域环境与传统。木栾店人的脾气和他们的武功一样了得。他们祖先千年前就尚武风盛。就说起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的少林寺。其少林外功拳刚勇劲疾，内功拳则寓刚于柔。少林寺鼎盛时期的武僧和俗家弟子中，出身于木栾店的不下二三百人。

尚武，对民性的熏染是显而易见的。但韩国钧的看法，却另有说道。习武健民之体魄，强民之不驯，一是一非也。他认为木栾店乡民滋事日多，多与习武有关。他说：“人心不可无所附丽，中国之儒，天竺之佛，泰西之耶稣，教人之法，皆欲使人有所附丽，不致泛滥无归。”韩国钧想使木栾店的乡民“人心有所附丽”，就是精神要有依归，要有信仰，做到体能与精神的健全统一。但回民心中的“安拉”，天使默罕默德，都算不得什么。他是以儒家经典去驯服这帮桀骜不驯的乡民。乡民的“附丽”与韩国钧的“附丽”是两码事。封建正统思想使韩国钧本能地排斥着乡民的习俗与文化。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把尚武与野蛮联系起来。这是韩国钧的偏颇。

韩对木栾人的微词以及心中的不快，皆来自木栾店社会治安状况的糟糕。作为治理一方的县太爷，有此等想法，很正常。我们不可以今日之尺，去度量19世纪末的一个封建官吏。

韩国钧设义塾，“以诗书化其不驯”，虽说传授的不外乎明人程登吉的《幼学琼林》、宋人王应麟的《三字经》，以及《五字鉴》《龙文鞭影》等，皆蒙学丛书，但客观上起到了传播文化、开蒙启智的作用，而且学童免费入读，这实在是一大义举。木栾店的乡民初始不愿将孩童入塾，韩国钧强令5岁以上、未满18者，一律入塾开蒙，否则，按漏读的人数加征丁银。

这种行政手段看似武断而不近情理，但效果很好。办义塾说起来易，做起来倒也有不少具体困难，如塾馆、塾师、经费等。虽说一县之长可以喝令属下操办，但总是要付出精力。幸而韩国钧物色的人选十分得力，不出一月，师资、学舍都筹办妥当。

韩国钧在武陟县任上，还禀请河道总督大人转奏朝廷，开沁河之禁。禁渡一开，沁河两岸商品交流日盛。木栾店由



此而成为豫西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旋即商贾云集，兴一时之繁华。斯时，百工之匠，贩夫走卒，官商大贾，皆趋之若鹜。这在“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封闭的农耕社会是难得一见的现象。尽管明代中国已萌发商品经济的叶芽，沿海城市也已开埠通商，但在地处内陆的中州大地，特别是武陟小城边的木栾店，可谓开了风气之先。

人尽其事，物尽其用。木栾店的乡民在奔生计的匆忙中，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由此，民间滋事纷扰的现象也日见减少。但韩国钧仍旧“每夜必策马出城巡查”。木栾店距武陟5里地，中间有沁河横卧，韩国钧往来必渡沁河。虽然寒霜铺地，残月挂林，北风瑟瑟，凄冷冷然，但责任在肩，韩国钧奉公一如既往。

武陟一年，韩国钧治事勤恪，治理有方，虽说任官时间太短，难有大的起色，但心里终是宽慰而坦然。

武陟之后，韩国钧知县永城。说永城不能不说永城的匪患。

永城县与萧砀接壤，历史上多患匪盗。位于县北的薛湖，更是强盗出没之地。韩国钧接任永城县事不久，就着手制订了《团练巡缉之法》。该法令规定全县各村每户出一丁，自备枪械，白天操练步伐，演习枪械，午夜前则集中于薛湖边，周巡至天明。

薛湖旷荡而芦草丛生，有湖荡数百亩，山上林木丛生，沟壑纵横，易藏易撤，匪盗据此占山为王，夜间袭击村庄。

韩国钧让当地绅董备足夜餐，团练餐毕，即分班周巡，至拂晓而归。遇有匪盗，团练及时出击，力求生擒。如斯者半年，匪患渐绝。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团练巡缉之法》虽为韩国钧自订，但团练这种介于府兵与雇佣兵性质间的民兵，在唐代就很盛行，非为紫石首创。早在唐代就有选点殷实、强壮的男丁，

免除赋役，定期训练征集，不完全脱离生产，也称“团兵”，或“团结兵”。代宗时明令：“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团聚，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唐代之前，团结实际上已经存在，只是叫法不同。清代，团练已形成一种制度。曾国藩、左宗棠都组织训练过团练。

韩国钧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卸任。卸任之后，并未按例休假，而是在就新职之前，闭门谢客，躲在永城县衙的寓所里写了一本名叫《永城土产表》的小册子。书中记述了永城农产以小麦、大豆、高粱、棉花、芝麻为主，并产黄花菜、辣椒、枣干、“苗桥大白菜”、白芍等。同时详述了作物的产量、种植面积及其特性、栽种收获时节等。为研究当地的农事气象、作物栽培留下了宝贵而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韩国钧每日早起后，稍事活动筋骨之后，就伏案写作，每日里且写且停，有时还阅读一些其他书籍。来永城虽说时间不长，但对永城的基本情况已了然，加之平时积攒的资料也不少，写起来就十分顺手。

韩国钧自述，刚卸永城县任，就有被通缉的巨盗侯某求见，“侯入门，即叩头乞恩，愿改行。但请于公赦除其名，否则为役隶所持，欲为良不得。其言诚恳，继之欲泣。余允其请，鼓舞而去”。原来，韩国钧初到永城之时，遍访乡集，知侯家集为匪盗之窝。侯姓一宗以盗为生，皆在邻境之砀山、亳州、萧县、符离集等打家劫舍，抢劫钱财。归里后散其财物于贫困之户。里中无人告发，日久渐成风气。

韩国钧侦悉后，立即调集马步队兵，于三更之时，往侯家集捕盗。

天色未明，韩国钧所率兵马已到达侯家集。紫石令马队于集外围待命，自己亲率步兵入市。先在侯家集主要道口分扎，然后逐巷逐户搜索，拒捕者就地击毙。至日落时分，捕获盗匪30余人。只是盗首侯宗飞逃逸。



韩国钧携30余盗匪归县讯办。

审讯结束后，韩国钧宣布：

- 一、初犯者贷（从宽）之；
- 二、屡犯者赐杖入牢；
- 三、漏网之盗匪，一一列名通缉。

韩国钧认为，长效之策，非在一日之获。教化使心归于善良，方能根绝此患。一日皮肉之苦，三日牢狱之难，强人安能悔过自新而改恶从善？若日久攻心，系其于悬索之上，倒能使之反省。惊弓之鸟，煎熬备至；思亲之苦，大于杖击。侯匪归案，道理就在于此。

## 跨府称道

光绪二十六年一月（1900年2月），紫石刚卸永城县事，因有豫省刘巡抚保荐，就有了受朱批送都引见的机会。从这里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王朝正在内外夹击中走向没落，而韩国钧个人正处于上升期。庚子这年，韩国钧才四十有三，正是干事的时候。

“引见”需要排序，需要行手续，这是规矩。所以直到6月中旬，韩国钧才起行。进京的路上，紫石的心情很好，不时吟诗作对。虽闻朝廷与西人交战，义和团起事，但并没有引起他太大警觉。

待韩国钧一行抵山东德州时，方始见到6月21日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一个诏书，它形式上像个宣战书：

“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僉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民，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

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这里所说的“义民”就是指义和团。

韩国钧读到宣战诏书时才担忧起来，知道事态的发展已相当严重。此番晋京路途凶险。船由德州经东光、吴桥之时，只见沿岸头扎红帕的义和团民纷然如蚁，焚杀之声，不绝于耳。

韩国钧一行刚踏入天津西南的静海，就领教到了这种麋集蜂萃的威势。

这时枪炮声震耳欲聋，不时有飞弹呼啸而过，同行的官僚徐受之劝韩国钧，入津不能，至津必又不能进京，我等还是折返罢了。

韩国钧此番进京，在不到一昼夜中两次遇险，可谓迭遭险情，虎口余生。虽从容涉险，但晋见不成，终是有些遗憾。

韩国钧据此著《北行日记》一卷，字里行间多少流露出种种憾缺和对义和团运动的责难与忿然。义和团运动使韩国钧失去了一次引进的机会，却使他有了直接接触两宫的机会。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城，两宫西逃。

是年九月，韩国钧署河南卫辉府的浚县本任。

紫石的内心充满着矛盾：一方面是仕途的欲罢不能，虽说升迁之不易，亦不是了无希望，所以在应酬、平衡、协调人际关系上就颇费心力；另一方面又嗟叹光阴如梭，为官一方，终不能卓然有成。事实上，韩国钧的政绩口碑都不错。这是他对自已的高标准的要求，是一种自谦，也是对现有官阶不满足的表现。他的一生从方刚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就在紫石感叹世事无常，官场升迁不定之时，转眼到了光绪二十七年



(1901)，他卸任浚县知县，以直隶州班候补，旋又以道员在河南候补。韩国钧这一步跨了一个大台阶。这就是民间所说的“跨府称道”。擢升之因虽未见诸可靠史料，但依紫石的背景而论，大抵是政绩政声显著、疆吏推荐使然。

道员称谓始于明代。清时定为正四品大员，成为省以下府、州以上的高级行政长官。

这一年是农历辛丑年，对紫石来说是个官运亨通的好年头。但对于国家来说，灾难深重，国难当头。9月7日，经西太后批准，由清政府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等11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协议书》，即《辛丑条约》。

10月6日，两宫太后挟光绪帝由西安返京，路经河南，驻开封月余，紫石以一个刚刚升就的地方候补道员的身份，奉委在行宫门外听差。

其间，韩国钧会同河南臬司清宗室钟筱舫查勘行经河北（指豫省黄河以北）各县的回宫路线。一路上，紫石细心周到，所经之处都对当地官员一一交待诸多事项：加强通口的巡查与防范；鲜新果蔬、地方特产的采备；依大清礼制，如“乡饮酒礼”、“服制”、“士庶相见礼”等都要求规范到位，惟恐有半点疏漏。

11月3日，西太后寿辰。虽在流离颠沛之中，西太后宫中礼制不稍疏。日食起居皆依宫中规矩。

韩国钧办四幅由大红绸缎包裹的铁画，贺慈禧寿辰。选题可谓别具一格。铁画有沉雄不俗的风骨，铁的光泽具有生命的力度，加之松鹤寓寿，江山若铁的画面，此正遂合了老佛爷的心意。西太后见后大悦：“此吏甚会办事。”对见惯了金山银山、稀世珍宝的慈禧来说，多一件少一件宝物已无所谓了，只在逃难之时，江山社稷岌岌乎可危之际，有臣属善解人意：既祷祝太后康寿，又保佑江山永固，这种美意怎

能不叫人一时忘却烦忧，欣喜于形？于是亲赐大小红绸各一段，以奖掖韩国钧的忠良。

两宫离开封回京日程既定，紫石奉命解行宫陈设（贡物）至北京宁寿宫交纳。回銮渡黄河而北，先有懿旨：传命地方供应瓷锡器十数事。各县无不遵办。

北京宁寿宫。

西太后一一临视押送回宫的陈设贡物，对韩国钧说：“汝做官甚好，疆臣多保奏者。汝回去后仍要为国家多出力。”并转对光绪帝说：“汝需何物即留之，余可置库中。”

韩国钧等在宫中用饭后稍息，不日返豫。及至暮年紫石在《永忆录》中还有这样的记述：“嘉勉之辞，今犹在耳，愧无以副所期耳”，一副诚惶诚恐谦谦君子的样子。

## 清化镇的四品官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1902年3月21日），韩国钧奉旨赴京引见，并以道员归河南补用。4月，到开封充任河北矿务局总办、交涉局会办。

这里的“河北”不是今天河北省的概念。唐贞观年间，河北为道名。辖境相当今北京市、河北省、辽宁省大部，河南、山东古黄河以北地区。宋代“河北”作为十五路之一，辖境相当今河北省易水、雄县、霸县和海河以南，及山东、河南黄河以北的大部。清时指豫省黄河以北广大地区。

其时，在河南的英国福公司订立了怀庆左右办矿的合同，因此，特设河北矿务局，以监督处理开办的相关事宜。由此可见，这里的“河北”乃豫省黄河以北地区。

委韩国钧为矿务局总办，交涉局会办，还因紫石在豫北



数县屡任知县，民情地理皆悉，且政声甚著，百姓拥戴，此信誉乃无形资产。开矿必运矿，运矿需修由道口至清化的铁路，这就必然要碰到征地迁坟之事，以韩国钧在豫北大地的声望，此等琐屑繁难之事，当会迎刃而解。

当时河北矿务局设署清化镇（今河南博爱县治所），其时隶属河内县，而河内现属沁阳市。韩国钧因此寓居清化镇三年。

韩国钧办交涉、办矿务之余，对河内县的农桑之事亦多有关注。

偶有闲暇，紫石即率随从数人沿乡间土路，时而放马狂奔，让马蹄之后的尘土扬出长长的带状；时而悠哉游哉，尽览豫北乡野风情。

五次三番的“闲逛”，紫石见河内县境皆膏腴之地，唯独有一个叫李家凹的地方，有六七百亩地荒芜不耕。

经询查，光绪三年（1877）大旱，李家凹虽卑湿之地，但亦不经旱，一早则颗粒无收。当年农家所收粮谷还不够做种子的，而地主催租，县官催赋尤急。乡民不堪重负，纷纷将地契缴官，远逃他乡。李家凹至今不见流亡异地求生的村民回返。举目四顾，田地荒芜，一片凄清。

韩国钧立于李家凹村头的小土包上，面西遥望，发出一声长叹。西距清化不远的陕县，唐代大诗人杜甫经过其境内一个叫石壕村的地方，感慨酷吏的所为，百姓的悲惨，写下流传千年的名篇《石壕吏》。

一千年过去了，然而民生依旧。同在豫北大地，其情其景，何其相似乃耳？身为朝廷四品大员，韩国钧不觉悲从中来。如何救民于水火，兴福利于庶民？紫石苦苦思索着。他甚至把兴办河内的农桑之事纳入了自己“实业兴邦”的计划之中。当然，韩国钧所处的时代，无论怎样并不能从根本上拯救民众，使百姓安居乐业，尽享太平。但作为有良知的封

建官僚能为当地老百姓办一点实事，做一点好事，何尝不是善举？与其哀之不幸，莫如从小善而积大德。韩国钧又一次来到李家凹。他亲自勘测、规划、指挥，将筹集到的资金用于“辟包填洼”，就是先取出洼地之表皮土地，然后将李家凹周边的黄土包填入洼地，并“浚沟洫以泄横潦”，开挖排水系统。说是复耕，实为造地，工程量还是相当大的。整地造田后，又从江南购湖桑五万株，按固定的株行距植之……（见《永忆录》）。不到三年，李家凹绿荫遍野，复耕面积几近一半。韩国钧还鼓励清化左近的乡民迁居于此。一时间，李家凹人气渐旺。

河内县志记载：“李家凹自古卑湿之地，居民向多患疟。”自韩总办“疏通积潦，广辟桑田”后，生态环境大为改善，乡民遂不复患此病。种树可以吸炭气吐养（氧——著者）气于此益信。”韩国钧由此愈加笃信广植树木的好处。春上，甚至在回开封的当儿，还在慈禧行宫中添植不少白皮松，并崇尚西人的“卫生”之道。当时西人的所谓“卫生”，不外乎不生食动物肉，人畜分居，粪便的集中处理。

在韩国钧的呼吁倡导之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3年12月），豫省抚署上奏朝廷于清化镇设立蚕桑专门中学堂，并委派韩国钧总办。

紫石东奔西走，历时年余，终于创办了一所新式的职业学校：河北蚕桑实业中学堂。学生全部由豫省各县选派。这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事，也算开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先河。

于此同时，韩国钧还创办了“志学会”，“课士以新学”：国文、数学、格致（物理）、化学等课程。从“许诸生条举以问，公为之一一批答”来看，紫石不仅允许学生“条举以问”（分项逐条提问），还亲自“批答”——书面解答学生的提问，参与新式教学法的尝试。这种新式教育，成果是显著的。



韩国钧后来回忆说：“第一二次河南省议员出身于此者不少。”以至在政坛、教育界和实业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洵然”。作为河南省新式教育的首创者，紫石以孔孟为宗旨，深谙天通盈缩、洪荒变换的道理，惟教育乃万世根本。用一个师长和战略家的眼光，抱定“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看后辈精英皆出门下，那是怎样的自得与欣喜？真是“不言桃李满天下，且看栋材承重荷”。豫北闭塞之地，能出“识微见远”之才，不能不归功于韩国钧的远见卓识。

## 路矿交涉

说罢韩国钧办新式教育，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他在清化镇所操的主业上来。

福公司是英国资本掠夺中国矿产的机构。1896年在伦敦设董事会。办公地址在英国首都伦敦勤农街110号，并在北京设有办事处。它的英文名称为：Peking Syndicate，是一个重点在中国以开办煤矿为主，兼营铁路、铁矿、桐油等业的辛迪加（股份有限公司）。

1898年福公司侵占山西煤矿未成，旋又侵占河南焦作煤矿，并获得晋陕省界之黄河以东，山西、河南交界处，北至长城的广大地带的采矿权。这一时期，福公司的股金达152万英镑（肯德：《中国铁路发展史》第118页）。福公司取得在山西、河南的采矿修路权后，立即着手勘测，准备修道口（今滑县治所）至清化的铁路。1901年，福公司在义和团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后，卷土重来，于北京重设办事处。时经英国驻华公使推举，驻上海总领事约翰·哲美森担任福公司总董事长，重申前请，要求在山西、河南开矿、筑路。

说起英人在豫省采矿修路，不得不交待一下刘景韩其人。

光绪二十四年（1898），河南巡抚刘景韩，时人称之为刘中丞（因清代巡抚兼右副都御史，即相当于明以前的御史中丞，故长期以来非正式场合都用中丞来称呼抚巡），由其侄刘铁云牵搭，与英人有频繁接触，收受贿赂，同意英人在豫省有采矿权。紫石在日记中所说的“事由刘铁云所招致”就是指这件事。

尽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甲午战争后，更是国将不国，割地赔款，枢垣朽塌，但当时清廷还是明令禁止外人办矿的。只可惜朝廷自身难保，秋风残叶，哪有雄起之心？再加上英国政府施压，王公大臣与英人的勾结，主权和法令也就如同儿戏一般，这就成全了福公司。福公司与晋省签晋丰公司约，与豫省签豫丰公司约，规定：由晋丰公司贷款与英人会同开采。当时任命韩国钧为豫丰公司总董事长，是河南巡抚锡良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他一方面先委托豫丰公司帮办董方镜与福公司周旋；另一方面力荐“才长心细，通达时务”的韩国钧接任豫丰公司总董事长，专与福公司办理交涉。锡良的本意是使福公司披一件在华采矿合法化的外衣。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一句话，要对福公司好交待。委紫石为总董事长的另一层意思也是不让福公司横行无忌，惹大祸。你韩国钧有本事，你就控制它；没能耐，你就由着它。这样我锡良对国人乡人好交待，少了骂名。这是明摆着的一摊子邋遢事，是巡抚大人拉的屎，要韩国钧去揩屁股。

豫丰公司本来就是一个欺世盗名、以损害国家利益助英人为虐的假公司。韩国钧卷进去有可能坏了自己的清誉，沾惹上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纠葛。豫丰公司与福公司还有名义上的债务关系。这笔账，理清了中国人收益；理不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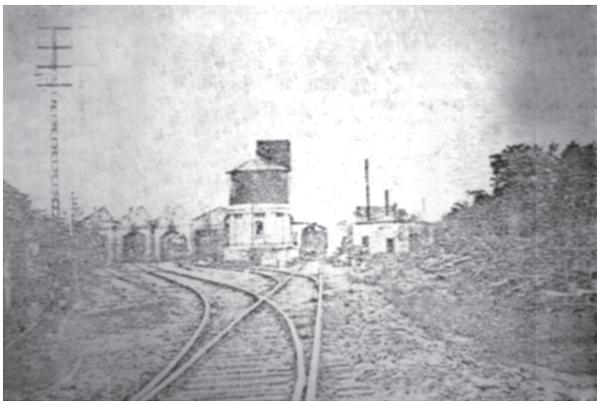


国人吃亏。糊涂账里不糊涂的是英人和贪官。

官海20年，韩国钧早已练达得诸事洞明，进退有策。接到任命，紫石明确指出：“豫丰为假托之名，实与外人狼狽，非所能任。”并建议：既是总董事长，理应由董事会推举。为避免误解，他再三表明态度：身为朝廷命官，在国家民族危难中，决不以苟全“名节”而偷生，民族利益及豫省权益余当竭力争取。于是巡抚锡良改委韩国钧为河北矿务局总办兼交涉局会办，与福公司打起长达三年的交道。

从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月）至三十一年四月（1905年5月），韩国钧在与福公司交涉中，充满艰辛，“其中经历可惊可骇之波澜，无可计数”，而最重要的交涉当修筑道清铁路和划定矿界。这中间充满了正义、智慧、胆识、尊严与邪恶、狡诈、贪婪、卑劣的较量。尤其是划定矿界，不仅限制了福公司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保障了民族利益，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在中国近代实业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根据1898年5、6月间福公司先后在山西、河南签订的《矿务章程》第17条规定：“各矿遇有修路造桥、开浚河港、或须造分支铁道，接至干线或河口，以为转运该省煤铁与各种矿产出境者，均准福公司禀明河南巡抚自备款项修，不请公款”（《焦作煤矿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第2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是踢开豫丰公司的一条致命条款，只要禀明巡抚即可自备款项，自行开工，没有豫丰的份额，也就没有中国人说话的份儿。有了这个章程，福公司放胆也放手。福公司勘测队通过广泛调查和实际勘测，发现河南省彰德府道口镇有卫河直通天津，沿途没有屏障少风险，工程造价低。于是，勘测队向公司提出勘查报告。福公司董事们看了勘测队的报告后，决定修筑泽州至道口间的铁路，后又决定泽道铁路分两段建设，先修筑道（口）清（化）铁路。修



当时英国人修建的道清铁路

筑铁路首先需要购买土地。福公司负责修筑铁路的工程师柯瑞为了达到低价购买土地的目的，企图贿赂韩国钧，许愿以购买1亩地给他5角钱回扣，总数可达4万元。此举立即遭到韩国钧的严辞痛斥：“韩某非图贿者，汝以贿行，浅之乎视余矣！”

柯瑞大惭。但旋又电告英驻华公使，示意对豫省巡抚锡良施加压力，由锡良来调动韩国钧，迫使他让步。紫石既不为金钱所动，也不畏权势，保国益民利，义不容辞。你就是天皇老子来，地价问题没商量。由于紫石的强硬，不肯让步，锡良后电复外务部称：“地价之争正是为平诸多纷争，非无端阻挠也。”反过头来做外务部的工作，想平息此事。

其时，京汉铁路尚未通车，豫省百姓不知铁路为何物，听说要修道清铁路，都惊为创举。当收买地亩时，谣言四起：路成后不准华人行走。一传十，十传百。于是，民众相约不售土地。韩国钧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强之且酿巨案”。尽管福公司修筑铁路是为了外运煤炭，掠我资源，但客观上道清铁路建成后将对河南的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变化并产生积极的影响；况且“铁路修成即不准华人行走”之说



纯属无稽之谈。为此，韩国钧亲临道口，“竭诚劝谕，父老来见者户限为穿，余一一譬谕”，直至做通每户的思想工作为止。为了解除民众的顾虑与猜疑，紫石应其要求，将面谕之语(承诺)刻在石碑上，以供监督和验证，直到20世纪40年代卫辉以东的铁路沿线还有三五个这样的石碑岿然尚存。这样的“勒石约定”在中外铁路史上实在鲜见。

1902年8月，韩国钧、柯瑞代表双方签订了《议建运矿支路章程》20条。《章程》的主要内容：这条铁路的性质为“商与民交涉之事”，由福公司筹款自建；福公司在焦作开矿60年后，即将这条铁路连同矿地其他财产无偿交与中国政府。《章程》经河南省巡抚锡良批准，并在外务部立案。

道清铁路历时一年建成。通车之日，当地百姓不肯发车，横卧于铁轨之上，要求“以人血祭之而轮始行”。因此，通车被迫推迟。韩国钧在豫省威望甚高，他举无线电、留声机、飞艇在我国使用之初，未行血祭之礼，均无灾难，而行之甚便。他亲临通车典礼的现场，疏导民众，终使道清铁路通车。

接任柯瑞的工程师甘寔勒握着韩国钧的手说：“韩总办不愧为大清干才，阁下所定地价，与京汉线比照，高出百分之五六啊！佩服。佩服。”

紫石也不示弱：“京汉价省，但屡有民人阻挠停工，而道清路期年即成，无一刻停者，以此计之，虽昂而实贱也。”甘寔勒一时语塞。当初豫省巡抚点将韩国钧任河北矿务局总办兼交涉局会办，可谓慧眼识才，好钢用在刀刃上。

道清铁路通车一年后，福公司在焦作开凿的一、二、三号矿井已耗费巨资，但因技术原因，迟迟没有正式投产。此时，福公司在国际上信誉大跌，股票下挫，亟欲将泽道铁路以建筑费抵押借款，并商请英驻华公使要求清政府外务部将此路归并给中国铁路总公司经营。为此，英公使哲美森提出道清铁路每英里平均造价为6 000英镑，全路共长90.5

英里，共计54万多英镑，要求清政府“先发75万英镑借款小票，再行派员估工查账，多少再算。”英国人不做亏损买卖。这叫“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但走的损失要由中国人补偿，全道清54多万英镑的造价，你得先付75万英镑，剩多余少，按实再算。这就是英国人的逻辑。

1904年底，中国铁路大臣盛宣怀派工程师詹天佑等前往清化会同韩国钧估验、查看账目，以确定道清铁路的总费用。

韩国钧此时此刻所能做的只是减少国家的损失。“弱国无外交”这句话一般人是很难体会到它的沉重的，此刻着实狠狠地刺痛着韩国钧流血的心。

在韩国钧的鼎力配合下，于1905年2月核定出道清铁路的建筑费及其他费用共为61.4万英镑，比福公司原来提出的数目要少十几万英镑。

早在1898年6月，福公司就攫取了在河南“专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的权益。1902年4月，福公司总工程师利德等人遍历怀庆府属地，在距老牛河三四华里的下白作村购买20亩民田，并于此运置机器，建立矿厂。此时，当地民众在焦作附近开采土窑，而利德则竭力反对，并依据《章程》中“专办”的字样，提出“凡民之开采土窑者，必须通过福公司”，还要求韩国钧为之出示禁令。韩国钧通过仔细辨析《章程》条款，认为“专办”二字实含有不得牵混其他商业的意思，并非指定一项事业的专利（这里的专利指专营权），拒绝出示禁令。

福公司禁止怀庆府民众开挖土窑（矿）的计划受挫后，又向韩国钧提出依据《章程》第1条“专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的内容，要求开办卫辉（今河南新乡市汲县一带）、彰德（今河南安阳等）两府的矿务，企图兼包并举尽吞河北诸矿。韩国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依据《章



程》第1条中“应先由矿师勘定何山何乡，何种矿产，绘图贴说，禀请河南巡抚查明，果于地方情形无碍”，再行定夺。现在矿师既未勘定，矿种又未查明，亦未绘图说明，报请巡抚，于地方情形有碍，当然不可“专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以缓兵之计封杀对手。

1903年8、9月间，福公司在焦作开凿煤矿的同时绘制了一张以焦作煤矿为中心，东西约30多华里，南北宽约5、6华里，跨越修武河内（今沁阳、博爱）两县，总面积达120多平方公里的矿区图，并要求河南巡抚发给开采凭单。由于这张图用红线标明矿界，故称为“红界”。当时一些民族资本家和地主开办的煤矿或在“红界”之内，或处“红界”边缘。如果福公司取得红界开采凭单，必然置这些以采煤为业的民族资本家和地主于死地。

身为河北矿务局总办的韩国钧为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据理力争，依照光绪二十五年（1899）新订矿务章程中“指定某一县”的规定，提出“红界”横跨两县，非“一县”也，地域过宽，并在时任河南巡抚陈夔龙的支持下，与利德多次谈判，使利德同意在“红界”中间划出稍小的矿区范围，由中国人开采。该矿图用黄线标明，故称为“黄界”。

“黄界”内矿区面积约57平方公里，使“红界”矿区范围几乎缩小了一半。

1904年底，河南巡抚正式颁发了《黄界开采凭单》。由于韩国钧以民族利益为重，并经过艰苦努力，大大缩小了福公司的矿区范围，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生存空间。

民族资本企业“凭心公司”就是在这样的气候下诞生的。紫石与福公司的交涉，很注意策略，又能耐心、审慎地应对各种棘手复杂的事情。他认为对的就坚持到底。合同议定后，允许英国人办的事情，他也不留难。韩国钧在对外交涉

中所体现出的理性色彩和法律精神，在混沌初开的20世纪之初，确实具有非常的意义。所以他能够很好地协调处理与福公司的各种关系和矛盾。这在当时中国已无独立主权的历史条件下，已属难能可贵。韩国钧与福公司交涉过程中表现出的深明大义和非凡才智，也深得他的对手——福公司的敬佩，以至他1905年调离河南后，“每至岁首，福公司西人皆来电道贺，十年如一日，非我族类其心亦何尝异哉”。

在河北矿务局任上，韩国钧利用政务之暇，对中国海军舰况以及新学的领衔人物进行了大量研究，著有《中国师船表》《中国新学学人姓名表》和《十九省筹还赔款表》。“每司一职，均有著述”，这是韩国钧漫漫宦海生涯中颇具特色的一个侧面。

## 访问日本

光绪三十一年（1905）韩国钧的日本之行历时90天，行程逾万公里，遍访军、政、农、工、商、矿、教、卫各界，以及参观诸多社会事业。

韩国钧此次赴日考察实业并不是偶然的。

与大清王朝一衣带水的日本，一直受华夏文明的影响，又同为黄种人，同处东亚，同样是闭关锁国的封建落后国家，为何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国力逐渐强大，其向外扩张的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由于地缘因素，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成为日本侵略的首要目标。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使当时诸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他们一方面要求清政府维新变法，另一方面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由于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慈禧的颞顽昏聩，以及绝大



多数封疆大吏的固步自封，由光绪皇帝主持的一场变法自强运动，昙花一现。国人在《辛丑条约》的强烈刺激下，一些比较开明的官绅纷纷到日本参观，希望学习它的富强之道。同时，在教育新政“奖游学”的鼓励下，到日本的留学生也大为增加。之所以选择日本为学习对象，封疆大吏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观点可作为一种诠释。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称，“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而且“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

这一时期到日本考察成为一种风气。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秋间，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四月余，并据此写成《东游丛录》一书，该书后来成为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的重要依据。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南通状元实业家张謇到日本考察，回国后把自己在日本访问期间的日记整理付印，题名《东游日记》，并将此书分送友人，目的是推动实业、教育的发展和宣传自己的政治见解。

当然，韩国钧此次赴日本考察除受当时大环境影响外，还与他个人的思想变化和经历有关。韩国钧对西学的接触首先是在六合县幕开始的，不过只是短暂地学习一些英文，后来就放弃了。在候补知县期间，“始研究泰西政治”。在办矿务、交涉期间，韩国钧产生了实业兴邦的思想，到日本考察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此时，韩国钧面对这个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蒙受巨大耻辱的东邻，其心情是非常复杂而矛盾的。为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宜隐忍图存，卧薪尝胆。因此，他多次奏疏恳请辞差，赴日本考察农工商矿，终于获准成行。

现据韩国钧所著《九十日之实业界》概述其主要行程于下：

10月2日，过长崎，4日抵神户，易车。

10月5日，抵东京。8日会见我驻日公使杨星垣。

10月9日，至日外务省，拜会日外相岩村成允。其后考察了东京电话交换所、东京养育院、美术学校和印刷局等。

10月14日，会见日农商务省局长田茂吉，矿山局长田中隆三。

10月16日，至千叶县，转乘房总铁道车至茂原，后参观农校、缫丝厂、长生郡鹤枝小学校、郡役所（地方兵役局）。

10月19日，返回千叶县。郡役所三桥得三部长介绍说，千叶县往年充兵者千人。近（1904年）有两万千叶籍人充役，开赴满洲战场（即日俄战争）。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

午后4时抵东京，赴古河矿业会社及古河熔铜厂参观。其后，拜德川将军墓，游华岩瀑布、中禅寺、盐原温泉。紫石感叹：盐原红叶不及苏州天平山红叶也。

11月1日，地震。

11月2日，赴小石川区实科学学校，参观无线电、X线室等，后游植物园。

11月5日，赴河南旅日同乡会演讲。

11月7日至11日，参观朝海小学校、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农事试验场、月岛小学生运动会，后赴北丰岛郡西原蚕业所讲学。

……

11月中旬至12月15日，分别参观考察了东京动物园、水族馆、盲哑学校、地方裁判所、高等工业学校、法政大学、巢鸭监狱、炮兵工厂、中央幼年学校、帝国大学、度量衡检查



所、卫生试验所、王子造纸厂、农科大学、三菱公司等。

12月16日，由东京乘火车至神户，在生野矿山，韩国钧深入到井下1 000米处。19日，返回神户。24日，乘德国公司轮船回国。

韩国钧到日本考察之际，西方国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迅速，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尽管日本的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但总的来说，整个社会也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态势。对韩国钧来说，能走出国门亲眼目睹日本先进的物质文明，要远比在国内从书本上看到的西方世界，更加真实生动，更具有说服力。

韩国钧并没有一味地崇拜日本先进的文明，而是深入思考如何使自己的国家迅速富强起来。他急切希望国家复兴，并认识到教育和实业对于国家的重要以及彼此间的依存关系。他在日本茂源农校演讲和北丰岛郡西原蚕业所讲学时多次提及“日之兴在教育，教育以实业为先，若不广兴实业以裕利源，则何所取资以为挹注（取盈补不足——著者），盖亦庶而后教之义”。由此，可以看出韩国钧在当时已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的兴盛在于教育，而教育的普遍（及），则得益于实业的广兴（以裕利源），人才的培养又可促进实业的发展，如此良性循环，国家必强盛无疑。他深刻而简明地阐述了实业与教育的依存和促进关系。这种思想虽然不是此次日本之行的直接收获，可重要的是90天的参观考察完善和坚定了这种想法。当然，教育与实业之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并非韩国钧的新发现，其时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张謇就曾喊出“父教育母实业”的口号，并躬躬践行。

韩国钧从日本回国后不久，转赴奉天任职，专司涉外交道。

## 宦游南北

光绪三十三年（1907）朝廷裁镇守奉天的将军，改设奉天省，治所在奉天府（今沈阳市）。辖境相当今辽宁省（旧柳边以西除外）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各一部分、吉林西北部和西南部一带地方。

也就在这一年初，韩国钧由开封起程赴奉天。同行的豫省官员王仲培对韩国钧开玩笑地说：“功名者机会为之也。此次兄之调奉，搏机会来了。”

韩国钧没有接话，沉默着，始终轻松不起来。年过半百，鬓已染霜，官场二十年的搏杀，心已至累。然而潜意识中似乎还有什么未尽之事，等着自己。是名的诱惑，名之累？还是使命感？都难一言以蔽之。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自日本归国，教育、实业之于国家重要性的信念越发坚定。然而认识到这种重要性，并不能如东南名流张謇那样直接从事教育与实业，但传统士人的名教思想，总企图晋身官场，加官进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换言之，一个能有所作为的官员，总想在有生之年，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多为国家做点事情。

韩国钧与盛京将军赵尔巽原本并不相识。赵任晋省巡抚时，就听说韩国钧在豫省与英人福公司办交涉卓然有成。豫巡抚先后多次奏呈朝廷褒奖。其时，晋省亦与英人办矿，赵常专函致韩国钧询及有关事宜。赵尔巽对韩国钧的才识品德赞赏有加，赵尔巽调任奉天，甚至还未到位，只是得到任



职的消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韩国钧：奉天交涉局、开埠局局长非韩国钧莫属。

赵尔巽（1844—1927），字公镶，号次珊，清末汉军正蓝旗人，进士出身，翰林编修。历任安徽、山西各省按察使，甘肃、新疆、山西布政使，湖南巡抚，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四川总督等职。赵尔巽可算晚清重臣，其在盛京将军任上，整理地方财政，政绩颇丰，受到清政府赏识。其主持编纂的《清史稿》更是青史留名。

总的来看，韩国钧受到朝廷器重，但在官阶（品）上并没有进一步擢升。他在豫省也是干的这差事。韩国钧看中这个位置皆因能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是操办（管理）涉外实业的行当，或者说是通过办理实业来完成外交使命，来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和利益。

当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赵尔巽一反前任将军之所为，以强硬著称，尤其在主权问题上，没商量。清王朝这艘百孔千疮行将沉没的破船之上，有这样的水手也实在难得。韩国钧与赵尔巽甚是投机，决心尽己之责，外争主权，内清其政，辅佐赵治理奉天。

韩国钧除任交涉局局长兼开埠局局长、农工商副局长外，还是中央政府农工商部特派奉天的商务议员。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韩国钧处理了一系列棘手之事，主要有盖平渔业公司杀高进贤案。抚顺一矿日本人从俄国人手中抢夺矿权等引发的纠纷。韩国钧处事果断、公正，当事者都能服膺。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韩国钧只能以维持现状，平息纷争，不让外人扩大侵占之地为主要策略，也算难能可贵了。

当西关外新辟商埠后，英美等国纷纷插手，企图再叨一块肥肉，划得属地，遭到韩国钧的断然拒绝。韩国钧与英美等国领事交涉时，义正词严地指出，主权所涉无商讨之余地。但

允其在此进行正常贸易。英美领事见韩国钧如此“犟”直，都知趣地退而求其次，为本国商人谋取起优厚条件。

正在韩国钧大展“拳脚”之时，赵尔巽奉调四川，加之因申请我国股本2 000万元介入南满铁路未获清政府批准，又与新督军不睦，于是萌生去意，辞差仍回豫省候补。6月初，韩国钧仍旧充任豫省参谋处总办，交涉局会办等职。

## 粤省练兵

这年秋，河南巡抚张人骏擢升两广总督时，奏保韩国钧赴粤协理政务：此人“究心时务，洞澈本原；处事动协机宜，才气尤为敏锐”。

韩国钧于9月20日由开封起行，10月16日抵广州。奉委督练公所参议、兵备处总办。实际上就是兵备道，俗称道台或道员。它的职能就是政府的兵役局，但多了粮储的职责，从全称“钦命整饬某某府等处地方兵备兼粮储”可以看出这一点。参议，清代已取消此官职。这里只是一种习惯称呼。督练公所相当于训练局或作训参谋处，有些职能则类似今天的地方武装部。清代的兵制与过去列朝的制度均有所不同。满族兵民一体的八旗制度仍有保留，但实际上以绿营和勇营为主体。中央政府的兵部，掌管武官的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等事。驻于地方的军队，归各省最高军事长官提督统领，而提督又受该省总督或巡抚节制。所以介于省与府、州之间的兵备道，就既是行政官职，也是一个军事官员的职位。韩国钧以极大的热情和熟谙地方行政的优势，操练起征兵、粮储和训练的活计。

上任伊始，韩国钧巡视了粤省各处的军事战略要地。他



首先来到粤省南部、珠江三角洲东侧的虎门要塞，察看了地形和兵力、火器的分布情况。韩国钧观左右之狮子洋和伶仃洋，沉思良久。60多年前的那场硝烟散尽，但笼罩在中国人心头之上的阴霾却愈来愈浓重。

靖远炮台。67年前的今天（1841年2月25日），关天培提督率兵固守横挡、永安、靖远、镇远各炮台，最后在此英勇战死，虎门陷落。随后《虎门条约》签订。韩国钧不可能从历史的高度去理清我们民族灾难的渊藪，但面对靖远炮台，韩国钧感受到历史的悲壮与惨烈的同时，深深地陷入困惑之中。

他善良而执着地认为，每个人只要忠于职守，遵《左传》云：“民生在勤”，《诗经》训：“执事有恪”，家国就有希望。这种很本分的想法大抵也不算错，但清王朝的这条破大船，在秦始皇开通这条航线的2 000多年后，偏偏赶上封建社会的最末班次，加之它的舵手，一个暴虐谬庸（西太后），一个羸弱无能（光绪帝），怎能涉险过关抗拒行将沉没的命运呢？

韩国钧是好官，他多少能感知末世的情绪以及大清的气数。但他“执事”之中没有丝毫讨巧之处，没有改变他对朝廷的忠诚。“朝廷”二字在他心目中就是国家的异称，怎敢有丝毫的懈怠？

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以来，韩国钧积极办理完征兵事务后，在新征兵勇中广泛进行军事教育。四月十八日（公历5月17日）韩国钧再至虎门沙角各炮台，进行射击演习。粤军中学生兵居多，最不易驾驭，但韩国钧以才识服众，受到拥戴。韩国钧不论信仰，大胆提拔有革命倾向的青年。江苏丹徒人赵声“为人慷慨，尚气节”，就深得韩国钧的器重。赵声（1881—1911），字伯先，辛亥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参加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多次组织发动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的武装斗争，尤其在争取、转化、改造新军，变统治者军队为革命军队方面，工作出色，卓有成效。说实在的，韩国

钧看重赵声，不是因为他的革命倾向，主要还是军事上的才干。从辛亥革命前后韩国钧的表现看，忠君思想仍是其思想的主流。纷乱当前，惟有大英雄横空出世，方能挽大厦于既倒，以救危难。平庸之辈纵然千万，还不是秋后场头的一蓬烂草。至于年轻人有些激进的思想，韩国钧皆持宽容之态，但不苟同与介入。可终是有寻端之人，密电安帅，安大帅发话：“赵为革命派不欲再任以军事……”云云。韩国钧力排众议，陈其利害，坚调赵声充任督练处提调。这对韩国钧来说是要冒风险的，但家国维艰，人才为先，韩国钧确实顾不得太多了。

韩国钧署粤督练公所参议兼兵备处总办时，还亲自组建成一个混成旅，离任之际即将升格为师。海军大臣洵贝勒南下巡视海疆，韩国钧曾亲统宪兵至香港翊卫。韩国钧治军“一主严厉”，驭下将士，无不用命。韩国钧曾说：“当时军官自协统以次，无事不秉成于余。”可见其练兵治军之有方。

韩国钧忠君守职，练达勤明，每司一职，均成效可观，都得到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褒奖。细究其因，不外乎尽其心力，勇于负责罢了。

两广总督上奏朝廷的专折云：韩国钧“才识深稳，器局平和。由州县起家于河南，吏治民生，考求有素。且学术精纯，允称练达勤明之选”。

钦派（差）大臣考验后，于复奏中称其：“博通经史，深谙时务；根柢之学，迥非流俗。历办外交，能持正论。才长心细，体用兼赅。堪备远大之任。”奉旨送吏部引见。

1909年6月21日，韩国钧在虎门主持了陆军毕业生的考试后，奉旨署奉天交涉司职。8月14日由粤省起行赴京，中途便道归里。北上途中又迂道开封谒河南巡抚林绍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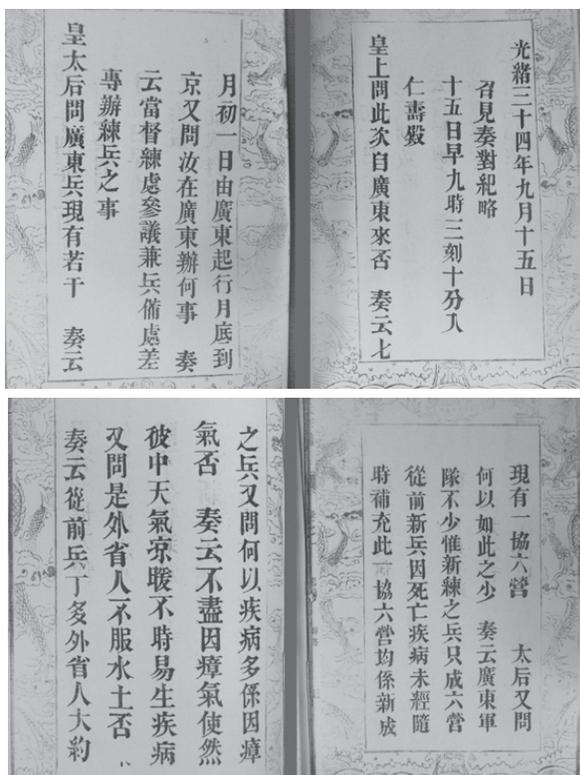


## 二见慈禧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1908年10月9日）颐和园。韩国钧来到这座建于金贞元元年（1153），已有800多年历史的皇家园林。虽说此园1860年被英法联军所毁，但光绪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移用海军经费重建，正式改名为颐和园。1900年又遭八国联军破坏，但于1903年旋又修复。颐和园虽迭遭厄运，但韩国钧见到它时，仍然辉煌壮观。当韩国钧拾级而上万寿山，来到仁寿殿前时，再次感受到它的至高无上。与其说园林建筑的雄奇壮伟感染了韩国钧，毋宁说是皇权的威压，再次使韩国钧顶礼膜拜。这对于一个以科举入仕的封建正统官僚来说，是很正常的。颐和园在清中后期，已不纯粹是皇帝、太后、妃子们消闲的所在，它完全是一处很正式的政治场所。因此，西太后安排在仁寿殿接见韩国钧也是礼制之需，并不如一些资料所说的便当她游玩。仁寿殿原名即叫勤政殿，是皇帝坐朝听政的大殿。这座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园，实在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

此时的清王朝已完全陷于摇摇欲坠、风雨飘摇之中，大清的气数已尽。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共和革命的波澜已成汹涌澎湃之势。韩国钧就是在极度的矛盾与困惑中晋京的。一方面他希望革新吏治，清明政治，融通西法，强盛国家，并具有“民权”、“平等”的思想；另一方面韩国钧又“欲保存国脉”，维护“一统”。

这时的光绪皇帝，其存在价值，只是体现西太后的需



韩氏宗谱载《召见奏对纪略》

要罢了。与此同时，西太后依旧在宫中“极度挥霍”，不断地大摆戏台，终日拉着光绪在成群的宫女、太监陪伴下寻欢作乐。可是，这当中“唯皇帝一人，总无笑容”。韩国钧知道光绪之所以这样，“非帝之懦弱无能，盖彼处于万钧压力之下，固不得不尔，以为自全之计”。光绪帝身上具有明显的懦弱性，这是由于他的特殊成长过程及其所处的具体环境所造成的一个致命弱点。不知韩国钧对这一点是否清楚。在与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的接触中，他深知光绪帝的处境，并能寄予深深的同情。而且他的思想与皇上的维新治国的梦想是一



脉相承的。但韩国钧并不可能与之交流。光绪深陷逆境，终日被禁于高墙之中，“朝夕研求”古籍时书，在其中“于西学书尤留意……”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中，光绪帝还在眷念重新操政，继续走他的维新治国之路。显然，此时变法已失去光泽，只是光绪一个未圆的梦。韩国钧作为下官受觐见，也是想获得一个晋升的机会。朝政大事岂能过问？

光绪帝的无奈与韩国钧的无奈亦是不同。皇帝的夙愿和无法解脱的苦衷，都通过即将离开清宫的德龄（清政府驻日、法、美等国公使裕庚之女）为其作最后的表白：

我没机会把我的意思宣布于外，或有所作为，所以外间都不大知道我。我不过是替人作样子的，后来再有外人问你，只告诉他我现在所处地位实在的情形。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志。

韩国钧的无奈是没有更大的舞台，去为国家出大力，充分展示个人的才干。

光绪帝在政治上的行迹早已消失了。自从德龄离开清宫后，他连在私下流露一点个人情怀的余地也没有了。所以在光绪帝的最后几年间，他除了作为西太后的陪衬参加一些祭祀、接见之外，只在瀛台惟以录书“表明心迹”了。

无论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还是从光绪帝自身的处境来说，他根本无力再扬起政治风帆了，而专横老迈的慈禧太后在清王朝如日西沉的落照中，只不过是一抹返照的回光。

韩国钧把政治命运托付于这样的主子，犹如大海遇险拾得一根破稻草，其结果可想而知。《韩氏宗谱》对光绪、慈禧召见韩国钧作了这样的记述：

十五日早九时三刻十分入仁寿殿。

皇上问：“此次自广东来否？”奏云：“七月初一日由广东起行，月底到京。”又问：“汝在广东办何事？”奏云：“当督练处参议兼兵备处差专办练兵之事。”

年逾古稀的慈禧太后半闭着目，慢吞吞地问：“广东兵现有若干？”奏云：“现有一协六营。”太后又问：“何以如此之少？”奏云：“广东军队不少，惟新练之兵只成六营。从前新兵因死亡疾病未经随时补充，此一协六营均系新练之兵。”又问：“何以疾病多？系因瘴气否？”奏云：“不尽因瘴气使然，彼中天气凉暖不时，易生疾病。”又问：“是外省人不服水土否？”奏云：“从前兵丁多外省人，大约不服水土，故疾病较多。今新成一协，均系本省人。”又问：“何以止成六营？”奏云：“练兵须从弁目养成，有好弁目方有好兵，是以未敢求速，然今年可成混成一协，计马炮工辎十营，明年可期成镇。”又问：“汝此外曾当何差？”奏云：“皇太后，皇上回銮时曾在宫门听差。”又问：“系在西安否？”奏云：“皇太后，皇上驾幸河南，臣在宫门听差，嗣圣驾入都，臣奉命解御用陈设至宁寿宫，曾蒙皇太后亲自赏收。”又问：“是松寿所派否？”奏云：“是。”又云：“汝办事甚好，有许多人保奏你，你回去办事仍应勤奋。”奏云：“当谨遵。”慈禧忽然打了个哈欠，于是皇上云：“汝下去罢。”韩国钧遂退下。时在十时十分。随后韩国钧仍以道员发往广东，并交军机处记存。

这时的韩国钧才算头撞南墙，好梦方醒。做一个好官要靠为官者的素养和努力，但要想把官做大，并不是自己奋斗所能做到的，机遇使然罢了。

韩国钧在南归途中，托梦林抚军，道出这样的感慨：“是夜在姜堰舟中梦林抚军语余曰：功名者机会为之也。机会无常。有时人赴机会而来，有时机会亦赴人而来。”（《止叟年谱》第11页）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饮恨逝于瀛台涵元殿。时隔20小时，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当权者、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的“女皇”西太后，亦相继



病死。

清王朝的末日也即将到来。

直到宣统元年二月五日（1909年2月24日），韩国钧才在海安听到光绪、慈禧太后殡天的消息，并与地方官绅共行哭临礼。这几年韩国钧南北驱驰，可谓竭尽心力。1909年夏，韩国钧又奉派任奉天劝业道。宣统二年初，又任奉天交涉司并兼葫芦岛商埠督办等职。

## 东北大鼠疫

这里值得补记的是他在处理休艾鼠疫一案时与日本人的交涉斗争中，为维护民族利益表现出的胆识与谋略。

1910年（宣统二年）冬天，东北发现了烈性传染病，患者短时间内就吐血身亡。这次鼠疫流行源于中国东北边境城市满洲里，亦称满洲里大鼠疫，被称作20世纪世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由于当时人们不洁的生活习惯和落后的卫生条件，加之以铁路为主的现代交通使人口快速流动，进而加大了鼠疫流行规模和速度。很快，鼠疫就由满洲里流行到哈尔滨、长春、奉天等地，前后染病死去6万余人，占当时东三省实际人数的5‰稍弱。随后，又蔓延至山海关，并祸及山东烟台等地。就连没有疫情的帝都北京也人心惶惶。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团区域，限制华人入内。德国皇太子，本定来华访问，也以闹疫而中止。据现有资料看，其时，政府在疫情初期的消极作为也是促使鼠疫大规模流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猖獗。即便在没有瘟疫流行的情况下，也常常无端指称正常死亡的中国人是“害了

疫病”，借口将其所在村庄付之一炬，以达到强占的目的。现在瘟疫真的流行了，他们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韩国钧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日无所惧于我，故交涉以强权为主。稍不经意，彼即自由行动。是惟度其可允者立即施行；其不可允者，苟不牵动国际，则亦有时以强硬出之”。他依据这一基本策略，苦心孤诣地与日本人周旋开来。

果然，日本驻奉天领事小池章造首先发难，他以“保护日本侨民生命”为由，向奉天地方政府提出，要派日本警察封锁从旅大往东北方向的铁路和车站。他们“视之如其国境。我国人民过其境者，皆受严格之检查，乘客更无论矣……”次年，日本关东政府联合警察署和南满铁路成立了“联合防疫局”，并借口关东州外有日本人居住，强行将总部设在东北当局所在地奉天。同时，向东北地方当局，允许日本专家自由地向中国当局建议，以及中日警察合作到中国居民家搜查病例等非分要求。日本显然是借鼠疫之机，意图达到侵占中国东北全南部的目的，在整个疫情发展过程中，日本一直不断对中国施压，并不时施以军事恫吓。

韩国钧看到问题的关键，那就是要求日方不能滥用警察权，“声明警察权仍以国境为限，不得侵越”。一计不成，小池领事又生一计，提出设立“中日防疫委员会”的主张，且“持之甚坚”。如果日方仅就防疫目的而提出共同防疫，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建议。但是，作为东三省总督的锡良对此还是顾虑重重，日本殖民者先前的种种表现实在让人不得不有所防范：借防疫之名，除了在大连实行歧视中国工人的政策外，日本关东政府还派警察封锁车站，对过境中国人进行苛刻的检查，简直就把以大连为中心的南满区域看成一个独立王国。

“弱国无外交”看似无奈的选择，但韩国钧为维护民



族利益所运用的斗争技巧，争取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尊严所作努力还是值得称道的。在原则面前，韩国钧丝毫没有让步，断然拒绝了日本领事的无理要求。个中所费烦难，不是一句两句所能说清楚的，即韩国钧所说的“事属创举，烦难百端”。

今日方颇感意外的是，韩国钧竭力向锡良陈说利害，也算做通了锡良的工作，终使锡良同意了自己的主张。韩国钧还进一步对“联合防疫机构”提出了具体设想：在防疫委员会中，“中日委员不妨公派，若执行则必由两国行政官员各负其责，盖意见可以交换，权限不可混淆”。“警察权仍以国境为限，不相侵越。惟彼此查有漏略之处，不妨互相指明。”韩国钧提出的方案切实可行，所言入情入理。大岛和小池章造等人实在无隙可钻，加之当地中国民众的斗争，终使防疫委员会以锡良、大岛两人为首，韩国钧和司使张珍午，日方领事小池章造、南满铁路理事久保田等都在委员之列。这个委员会每星期开两次会，共召集了八次会议。日方开始利用会议非难中方，提出许多无理要求；而中方则据理力争，力保主权，可见斗争之激烈。不久，各国医疗人员云集奉天，组成了“万国防疫委员会”，遂取代了“中日防疫委员会”。

总的来说，在“中日防疫委员会”中，双方虽然存在一定的斗争，但委员会对防疫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该说，韩国钧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体现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按清政府官制，防疫属于民政司主管，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奉天的民政司和交涉司合署办公。这意味着，作为奉天交涉司使的韩国钧既要和日本强权者展开外交，又要参与防疫。韩国钧还积极察访灾情，组织医务人员救死扶伤。当时，有的病区道殣相望，尸骸枕藉；不少医务人员也染病身亡，如英国医生嘉克森等。疫盛之时，哈埠日死800余人；奉天日死300余人。一时间，东三省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同

僚们都劝深入疫区的韩国钧当心染病，可坐镇指挥。他却举例说：“奉天一妇人，其舅、姑及夫与子同时染疫死，皆此妇为之殓埋。妇人至某家，其母与弟又染疫死，而此妇终是无恙。外医邀此妇验其血，又以疫虫种其肢体，始终不为所染。此御疫之轮血也。”最后他风趣地补充道：“吾亦有御疫之血。”这里说的“虫”即病毒，“御疫之轮血”即抗体，免疫力。他置生死于不顾，仍泰然来往于疫区，苦苦撑持两月余，疫情才得到控制。

在此次防疫行动中，韩国钧所表现的卓越才能，以及巨大的奉献精神，深为日方所敬佩。韩国钧兢兢业业的理事作风，为解除民之疾苦的忘我精神，以及既坚持原则，尽可能地维护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尊严，又与对手保持正常关系的斗争技巧，都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熏陶培育出的。近代中国社会的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交织冲击，铸就了他独具魅力的个性与杰出的才能。这些品格与才能不但获得了同僚的嘉许，同时也为对手所折服。为此，日方特授韩国钧三等旭日勋章一枚，经奏准佩带。

为系统地总结这次防治鼠疫的经验，1911年（宣统三年）3月，清政府外务部、东三省防疫事务所发起召开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来自中、日、美、俄、德等11个国家的医学专家参加了会议。这是一次国际会议，中国官员的作为直接影



万国防疫会议合影，前排左八为韩国钧



响到国际视听。韩国钧奉委筹备、处理会议各项事务。会议期间，韩国钧及时将他组织绘制的《东三省防疫图》一一呈送与会的各国专家，至此，外人对我不敢再有轻视之意。俄国医务代表扎巴罗尼博士说：“不对疫情地理洞悉者，不具相当专门知识者，是不能绘就此图的。”会议以东北鼠疫为基点，研讨了鼠疫的起源、传播途径、病状诊断、微生物研究、鼠疫的防疫措施等，交流了各国防治鼠疫及其他传染病方面的经验和成果，并在鼠疫研究上达成多项共识。这是近代中国医学史上，首次由政府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其意义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防疫事竣，锡良督军欲奏保擢升和重奖韩国钧，被其婉言谢绝：“以耗吸国家之金钱，踏损人民之生命，求官取财，自问有愧。”韩国钧再三坚辞，但仍奉旨受到嘉奖，纯属精神鼓励。其他参与防疫之人，也都论功行赏。

实际上，55岁的韩国钧此时已经走到一个时代岔道口，他所效忠的朝廷已然大厦将倾，无论你愿不愿意，都不能挽回其覆灭的命运。而想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和百姓多做一些事的韩国钧，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 封疆北洋

### 转身民国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两个月内即有鄂、湘、陕、赣、晋、滇、黔、苏、浙、桂、皖、粤、闽、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

这年秋天，韩国钧刚刚就任吉林民政使，奉赏头品顶戴，这多少有点最后的晚餐的味道。当然韩国钧并不十分介意。朝廷需要他挑大担子，是为国家尽力，他无可推托。

对由武昌起义进而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韩国钧则持观望与保留态度。当时，炮声隆隆，旌旗北指。10月，江苏巡抚程德全（雪楼）宣告对清廷独立时，韩国钧以苏人名义电程，谓：“独创一格，以保全地方，苦心可仰。恐土匪乘机窃发，仍望力为镇压”云云。当吉林学界争请独立，韩国钧以“吉林处日俄二强之间，与他省情形不同，不如仍旧以观其变……”（《止叟年谱》第15页）为藉，耐着性子，按兵不动，这时的韩国钧兼任吉林保安会副会长。他希图吉林于纷乱之际，“以维持现状为要，不致大乱”。当陈简墀巡抚辞



吉林省民政使韩国钧

职时，欲让韩国钧代理其职，被韩婉拒，“仍请赵督军挽留陈”。这既非谦让，也非矫情，而是作为政坛资深官僚的韩国钧审度时势后所作的明智之举。光绪死后，风闻隆裕有“垂帘之举”，韩国钧“闻电颇骇”。从这里我们可看出韩国钧对后党独揽朝纲的担心，他认为“民主党与君主党相持所不同，而于保全中国

之心则同也”。他陷于极度矛盾之中：“以保一君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君主党不忍也；以去一君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民主党不忍也。”

其时，各省皆以文书昭告天下。沪军陈都督通告：“奉大总统孙文谕令，以本月十三日为阳历元旦，我民国百度维新，亟应及时更用阳历，期与世界各强国同进文明一新耳目等因。为此布告军民各界人等知悉，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着改为中华民国元年正月第一日，从前行用阴历一律变更。孙大总统即择于元年元旦（1912年1月1日）就任，发号施令，与天下更始”。

转瞬，社会党即渐次成立，其最引人瞩目者以剪发为第一要务。因此，剪发风潮一时席卷大江南北。

这时，军阀和流氓政客亦以革命党的面目出现，攫夺了权力。旧巡抚也换上了新都督的外衣。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苏和广西两省，这两省都是由清朝的巡抚重新作为本省最高的军政长官宣布光复的。

在苏州的江苏巡抚程德全为形势所迫，接受当地绅商领袖的要求，在巡抚衙门前挂一块“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招牌。巡抚改称都督，革命算是完成。韩国钧对这个善于投机的官僚早有所闻。1900年义和团战争时，程德全以候补知县的身份在黑龙江，对于占领齐齐哈尔的俄国侵略军殷勤接待，博得侵略军的信任。他由此在官场发迹，一步步升到江苏巡抚。在辛亥革命中他摇身一变又成了民国创立时的一个要人……

韩国钧很看不起这种骑墙派的投机政客。虽说不至于“一仆不侍二主”，但油滑于世，沽名钓誉，过于取巧的事，都不合韩国钧的性格。韩国钧原想静观态势的发展，不料形势急转直下。1912年2月12日，末代皇帝宣布退位。由此，不但结束了清王朝260多年的统治，而且结束了2 000多年来的皇帝专制制度。

这时，操纵着整个局势的袁世凯迫使革命党方面作出重大妥协：如南京的参议院根据袁世凯提出的方案决定了“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以清皇太后、皇帝名义发布的退位诏书，是袁世凯委托在上海的张謇起草的。这个文件中说：“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袁世凯立即以这个退位诏书为根据，宣布自己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首领，将他的原内阁的各部大臣，改称为各部首脑。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翌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由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



临时约法》。3月13日，袁世凯任命他的老朋友唐绍仪为国务总理。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大总统之职。临时参议院从南方迁往北京，成立不到100天的南方临时政府就此夭折。

三个月的光景，世事更迭，时局剧变，如梦如幻，如历千年。韩国钧这时想起苏轼《赠善相程杰》的一首诗：“心传异学不谋身，自要清时阅晋坤。火色上腾虽有数，急流勇退岂无人。”古代名贤尚且能在官场得意之时及时引退，明哲保身。今虽共和，然世道纷乱。奸党篡位，各地兵祸不断。韩国钧早在年初即萌生去意，并已先遣家眷归里。其后多次呈请辞职均未获准，直至12月13日才奉政府电令准予开缺。1913年1月16日才正式卸任吉林民政使之职。

临行筹边使章炳麟特来拜会韩国钧。章炳麟，字太炎，浙江余杭人，曾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清廷通缉，后流亡日本。1900年剪辮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替邹容《革命军》作序，再次触怒清廷，被捕入狱。出狱后为孙中山迎至日本，参加同盟会，并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政府枢密顾问。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的斗士和杰出的思想家，章炳麟此时却受张謇拉拢，参加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言论。就连革命功臣黄兴，也认为“革命目的已达”，便吟咏着“大风歌罢不如归”、“爱我林园想落晖”，说要“掉臂林泉”了。

虽然韩国钧与章太炎对时局的认识和感受从根本上说不尽一致，但“归隐”的主调如出一辙。章太炎对韩国钧说：“此番兄之归里，也算功成荣归，可以悠然林野了。”韩国钧只是苦笑。身为先朝遗臣，恐怕更多的还是憾缺。韩国钧希望通过革除弊政来勃兴国家，但思想上大致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忠君情结像是存于血脉之中的“坚冰”，并不因共

和革命的炽灼而有所融化。但韩国钧能择善而从，面对“大局已定”的形势，他决意激流勇退，不啻说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他生命体中智者的从容品性，常常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体现出来。事实上，20世纪前半叶的许多重大历史时刻都留有韩国钧这种“识大体，顺潮流”的选择，这是后话。不过现在对于韩国钧来说，还需要假以时日，让他好好地静下心来，过滤悠悠往事，反思前行。这当中说不准还要择圣贤之书而读；还要面对家门口流淌了2 000多年的古运盐河水，吟诗作赋，聊抒情怀。然后，才能扬弃“旧我”，积蓄能量，踏上新的征途。毕竟韩公也是55岁的人了。早已过了“天命”之年，决不会固守在一条早已崩溃了的防线上等待什么；或者说他不可能在一条走不通的胡同里，死脑筋没心眼地从天亮走到天黑。但他心里的那“结”需要慢慢的舒缓，开解。时间是转这个“弯子”的最好的轮子。

韩国钧南归中途至天津时，谒见了锡良。这位前清督军对韩国钧道：“君自是封疆之才，但任非其时耳！”这句话是对韩国钧说的，也是对自己和若多清朝遗臣而言的。韩国钧望着这位昔日的上司，感慨良多。数月不见，锡良苍老了许多。从这里我们多少可以猜想到这些遗老此时失落而无奈的心绪。

春节前（腊月二十七日），韩国钧回到阔别六年的故乡。稍事休息后，韩国钧登临海安镇东北的名胜——凤山。

凤山所处地形似凤凰，又因民间传说曾有凤凰栖于此山，故名。凤山的庙宇建筑始于明代，经过清代的几番修葺，已蔚为大观。创办于明代的“凤山书院”，为本镇文人雅士聚会论文之所。在韩国钧的倡导下，一所新式学堂泰县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成立于“凤山书院”。春上，韩国钧在此主持了孔祀，崇文之风，蜚声梓里。

青年时代的挚友徐丰曾闻韩国钧自吉林归，特从泰州来



访。与韩国钧彻夜长谈，举杯相庆：

判袂卅余载，相逢若梦中。

论心先话旧，辨貌已成翁。

车笠盟长在，云泥分不同。

流连杯酒处，此乐自融融。

……

已遂终军志，还思张翰莼。

归来营畧野，且住暂闲身。

从友人唱和的诗作中，仍可以看到韩国钧轻松自在的心境中隐存更多的还是壮志未酬的抱负，因此只是“且住暂闲身”罢了。

韩国钧当然不是陶渊明。

未几，应友人金树芬之邀，韩国钧赴沪，并频繁往来于沪宁之间。

在上海、南京期间，韩国钧会晤了沈恩孚、黄炎培、金鼎峙、庄蕴宽等名流。川沙（今上海市）人黄炎培系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时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省议会议员。韩国钧与黄炎培着重交换了有关中华职业教育的看法，并抽身去苏州，见了江苏都督程德全（雪楼），询及本省军政详情，呼吁军政统一与社会安宁。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到暗杀，伤重致死。究其原因，皆因始于去年底的各省进行的正式国会议员选举，国民党获得了国会议席中的大多数。宋教仁以为可以成立以他为首的国民党内阁。他从湖南转道上海、南京回北京，一路上宣传他的政党内阁的主张，这就触怒了袁世凯。随后就有消息证实，暗杀的主使人是袁世凯的亲信、内阁总理赵秉钧。宋教仁被杀事件立即使孙中山开始清醒过来。他主张组织兵力，声讨袁世凯。但黄兴和其他领袖们不赞成这个主张。

这时，韩国钧已由上海抵宁，会晤了应德閔民政长。应德閔请韩国钧出任实业司长，程德全这时也到了南京，并邀韩国钧出任参谋长，均为韩国钧坚辞。韩国钧只口头答应程都督在其幕中襄办军事文牍。这是碍于情面，选择的一种中间过渡的办法，不致伤了和气。所谓襄办军事文牍，韩国钧自己说得很清楚“乃任秘书为之编列军事预算”。对这种幕僚之事，以韩国钧的才干和资历，是不会有很大兴趣的。但哲理其事，等于在朝野之间找到了绝佳的结合部，既可藉此重返政坛，亦可在不合之时遁入江湖。

这期间，韩国钧往来于南京和扬州之间，劝说扬州统军、前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取消了所设的特别米捐（每石四角）。他还于南京专候姜堰、海安两地商会的代表，询及详情，并于归里之时，察看米市。姜堰、海安米业繁盛已近百年，近因米捐苛负，已受重创。韩国钧与省署切商，四次抵扬，终于迫使徐宝山取消特别米捐。一时民众雀跃，山呼“韩青天”。

此后，韩国钧还专程赴南通晤张謇，讨论了苏北的地方治安问题，认为“县警备队不可少”，于是共同倡议建立通（州）、如（皋）、东（台）、兴（化）四县地方警备队。韩国钧多次在泰州城召开筹防会议，并整顿“宝带桥”捐，“岁收二万余元，以充警备队之用”。

1913年5月12日，国务院电传袁世凯（项城）谕令：急召韩国钧赴京。此前，袁世凯正在同帝国主义列强的银行团进行借款谈判，而韩国钧得到“谕令”之时，袁世凯大借款成功，遂有了财政上的后盾，取得列强的支持，军事上也作好了布置。这时孙中山、黄兴号召南方各省力量，起来反对袁世凯，“二次革命”风起云涌。而“讨袁”军事行动是以江西和南京为中心的，史称“赣宁之役”。韩国钧此时岂能把“宝”押在袁世凯身上，因此拒绝北上亦在情理之中。乱



世之秋，袁世凯此次用人也不算大跌“眼镜”。韩为清末官僚，且“尽忠朝廷，无反叛之心”，这是袁世凯看重韩国钧最重要的一点。但韩国钧对这位比自己小两岁的袁大总统并无多少好感。早年他依靠淮军吴长庆，捐得同知衔，任驻朝鲜通商大臣，这差不多是论斤道两买来的官。令韩国钧反胃的是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伪装赞成维新运动，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取得慈禧太后的宠信。这个袁大总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嗜血如命，又毫无诚信可言。这些就足以使饱读诗书的韩国钧从内心厌恶这个袁项城，并怀有深深的戒备。在一个以科举入仕的正统官僚眼里，袁充其量只是大清朝的一个臣子，与朝廷不可同日而语。或者说，是一个极有手段不得不认真对待的人物，同时也是不能完全依托的。再说此时南北之争，扑朔迷离，举国上下一片讨袁之声。这当口，让韩国钧赴京受用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明智的。事实上，韩国钧拒袁的同时，也已领教了革命军的威势：“当革命军再起之日，正余由家抵宁。翌晨，亦即赴沪，过吴淞为炮（火）所阻，泊一日，夜始行。在沪之夕，炮声陆续不断，红光一现，必有巨声随之而至。虽居租界，心亦摇摇如悬旌也。”（《永忆录》第28页）

在这“纷扰”之时，韩国钧既对革命军有恐惧心理，同时也难对袁大总统抱什么希望。但韩国钧心里明白，口角之硬，不如唇舌之巧。“托病”不出似乎成为古往今来对付各种难症——“却之似有不恭，受之不为所愿”的一剂灵药。

5月20日，韩国钧由沪返宁。24日，徐宝山在扬州被炸死。6月23日，韩国钧因病告假回海安。

回到家乡的韩国钧并未静下心来，每日总要打探来自沪宁等地的讯息。这时程德全派人邀韩国钧去宁，时在7月15日。可见韩国钧只因小疾而暂避是非之地，或是“托病”以退为进，继而待机而动，待时而发。而北洋军政府驻江苏的第一、第八

两师已于昨夜宣布独立，并挟持程都督宣告“讨袁善化”。

这时在南京的黄兴知韩国钧抵宁，特地拜会了他，相留韩国钧以助革命党人一臂之力。韩国钧瞪了黄兴一眼，那目光之冷简直可以结冰：“政治各有意见。至因意见之冲突而诉诸武力，非地方人所敢与闻。”

韩国钧与革命党人之间始终保有一条界线分明的壕沟。韩国钧自是不轻易跨过去的。

辛亥革命的炮声粉碎了韩国钧的许多梦想，仕途甚至因此而搁浅，再加上新旧交替之际出现的社会动荡，韩国钧在心底早把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划入乱党群魔之列，岂能与之合流。

而此时（6月间），袁世凯先后下令罢免国民党的三个都督（江西的李烈钧、广东的胡汉民和安徽的柏文蔚），并且出动军队南下。7月12日，李烈钧据江西湖口炮台宣告独立。15日黄兴在南京成立讨袁军。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虽都有国民党的力量表示响应，但多半是虚张声势。在袁世凯的南下军队强大攻势下，江西、南京的反袁武装迅速瓦解，响应的各省也自动收场。不到两个月，赣宁之役就以袁世凯的全胜而结束了。袁世凯派他的亲信部队进驻南京、湖北、广东，把他的势力伸张到原为国民党军人和其他派系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弱点，又如何敌得过在军阀官僚专制统治集团中翻过好些斤斗而爬上来的袁世凯呢？

在取得军事胜利后，袁世凯毫无顾忌地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开杀戒。他露出真面目对待资产阶级革命派了。7月间，他发出布告说：“暴徒擅自宣布独立，破坏民国统一。政府依约法上之统治权，有以兵力平定变乱责任。”原用来约束袁世凯的《临时约法》，现却成了他用以镇压革命的合法



依据。孙中山、黄兴等遂成“暴徒”，再度亡命国外。

其时，张勋奉袁大总统之命，进攻讨袁军，重占南京，并任江苏都督。

8月4日，韩国钧再次回到海安。

此次避居乡间的韩国钧远离政治旋流，似乎更能进退裕如。前番拒袁，没有北上，称病乡里，实是龟蛇就洞，静观洞外龙虎斗，待你杀得天昏地暗，十回合百回合见得分晓，我方飘然而出。

韩国钧对袁世凯的看法当然不会因袁的得势而有所改变。但袁世凯于乱中取胜的手段，确实让韩国钧不敢小觑。

袁世凯手下并不缺舞枪弄棍占山为王的把式，但能主一省之政，又颇瞩目望的干才，确实是筛筛拣拣，挑不出几个。韩国钧在海安北郊的田畴之上，面对遥远北方的那座城阙，心永远是热的。而此时，远在北京的袁世凯也想到了避居江北乡间的韩国钧。袁世凯看中韩钧两点：一为清廷旧臣，有救国之心，无激进之思；二是每署一地，政声卓著，干才也。至于前番不来北京，察当时之情，实可原谅。纷乱当前，用人为上嘛。

我们从这段历史中走来时，不能简单看待韩国钧的“就”与“不就”，理解成投机抑或择善而从。“二次革命”既已失败，标志着袁世凯专制统一的实现。统一既定，那国家的治理建设就是首要任务。至少说，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况且，主持省政的封疆大吏的位置，对韩国钧来说，正是在更大的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的一次绝好机会，也是韩国钧不了的政治情结。晚清官场多少年孜孜以求的奋斗，不就是为有这样的机会吗？吉林卸任之后，与江苏省官绅名流的广泛接触，对江苏省省情的较为详尽的了解等，使韩国钧有了执掌苏政的想法。韩国钧接掌江苏之政，有其深层的复杂的内外动因。一句“苏人以桑梓义务相责备”，说得

多少有点勉强。此正所谓“受命于危难之时”，升平年代，膏腴之地的这头把交椅，不知何人的屁股能落座？再说做清朝的官，是官；做民国的官，也是官。问题是如何做？“苏人以桑梓义务相责备”当然是掌苏印的原因之一，并不是主要的。

1913年9月6日（民国二年八月六日），韩国钧任江苏民政长（省长），并于9月21日赴苏州接篆。24日至南京晤张勋都督。

## “礼”送张勋

有位研究民国史的专家说：“写民国史不能不写江苏，写江苏不能不写韩国钧。”这是颇有意味的。

民国初年，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称为民政长，后改称巡按使。1913年9月6日，韩国钧就任江苏省民政长，后调任安徽巡按使。1915年辞职归里。1922年再主苏政，充任江苏省省长职。1925年再度辞去江苏省本兼各职，回到故乡海安。

这一阶段是韩国钧宦生涯的巅峰期。而此间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风起云涌，波谲云诡之时。展读封疆大吏韩国钧，看宦海波澜，云卷云舒，进与退，皆从容。除了能使我们触摸到那段逝去的历史烟云，重要的是我们能从更大的时空背景中去探寻紫石的心路历程，让本书的主人翁鲜活起来，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

韩国钧就职之前，张謇曾电邀其至南通相晤。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张謇，嘱其勿辞。

临就职前，韩国钧又复电袁世凯：“请先定军民权限，并财政系统……”看得出，韩国钧出任江苏民政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明确了军（都督）与民（行政）的权限，不致与袁



世凯心腹张勋发生太多的龃龉。明确了财权，好迅速恢复市面，平敷战乱带来的创伤。

民国初年，行政权力不外乎两大项：一是县知事的任命；二是税所长之委任。

韩国钧到任之时，江苏60个县已委任54县知事。48个税所已委任45个税所长。但中央明令此权限归民政长。张勋“嘻嘻”然，嘴上左一声深表歉意，右一声不好意思，并无改由民政长重新任命之意。韩国钧也并不拂张勋情面，只将已委任的年未及二十的无锡知事，收回成命，余未更动。但韩国钧以退为进，约法三事：“知事若贤，余方褒奖之不暇；否则，即余所委派，亦复不能姑容。”张勋能成为一方军阀，坐到江苏都督的位置，并非一无是处。对韩国钧动作，也识抬举：“那当然。”

陶菊隐一句“省长是督军的媳妇”点破了北洋时期督军与民政长（省长）之间的关系。韩国钧上任伊始，与张勋关系的处理，是大度、迁就与无奈的一种兼容。

与张勋同官三个多月后，张勋调任长江巡阅使。事情的起因是：张勋攻占南京后，曾纵兵烧杀抢掠三日。不料，乱兵一时杀红了眼，误伤了三个日本人。日国内极右分子顿然鼓噪起来，纷纷向日本政府请愿出兵中国。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向袁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谢罪和罢免张勋。袁派张勋的江西同乡李盛铎到南京来调查，李劝张勋对日本人让点步，以免引起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张勋与日本驻宁领事船津直接谈判的结果，日本方面撤回了张勋应当撤职的要求，张勋于9月28日到日本领事馆道歉，日方责难算是告一段落，但英美等国却又提出相同条件。它们的公使不止一次地向袁政府表示，把这样一个怪物摆在江苏都督的位子上是极不相宜的，在南京的西方国家侨民的生命财产也是得不到保障的。他们把这个意见说成是



张勋

对中国政府表示好感。

此时，袁正想利用这个“外交事件”撤换张勋。袁素对江苏和湖北两省看得特别重要，原拟派心腹大将冯国璋为江苏都督，段芝贵为湖北都督。在对南用兵的时间，派这两个人做两路统兵大员，就是实现这个计划的一个前提。后来张勋所统率的部

队首先攻下南京，他不得不根据“先入关者王之”的传统观点，任命张勋为江苏都督，但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10月上旬，袁世凯又派张勋的老朋友阮忠枢到南京，把外交团的意见告知张勋，暗示他自动辞职，以免引起更大的外交压力，否则他的面子就更难保住了。深层的原因还有张勋并非北洋嫡系，而且还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助清廷复辟是他的最大的心愿。袁世凯呢，帝制自为，所以说张勋是他的心腹大患。

张勋正在兴头十足的做“两江总督”，听了这些扫兴的话，就跳起脚来发火说：“我的这个印把子是拿自己的性命拼来的，袁宫保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用不着劳动你老大哥的大驾来和我商量。”阮忠枢把他发火的情况报告袁，吓得袁慌了手脚，接连派李盛铎、刘恩源、钱能训、段芝贵走马灯似的到南京来疏导张勋。其中“乾殿下”（段曾拜袁为义父，故有此称）最长于词令，他说：“总统确有苦衷，不能不尊重外国人的意见。”随后提到袁想改任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他又天花乱坠地说：“巡阅使比都督大，都督只管一省的军事，巡阅使管好几省的事。”

张勋被他说到动，而且事实上也不能造袁的反，就提出



三个调职条件：一、督府开支65万元准予报销；二、再拨开拔费50万元；三、规定长江巡阅使节制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的水上警察。这些条件都经袁允诺。12月16日，袁发布了任命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及调张勋为长江巡阅使的命令。这就是张勋濒行之前，狮子大开口，向韩国钧索要军饷百万的因由，这就害苦了韩国钧。报销的65万元和开拔费50万元，都要由江苏财政支应。韩国钧忍气吞声，东挪西凑，权当送瘟神，好不容易付出十之有九，但临行前一日，张勋非要再索六万不可。韩国钧无计可施，心想大头已付，与其共事三个月余，别无冲突，谅张勋都督不致因区区六万之数，而有冒然之举，拖一拖，也就过去了。岂料，张勋派人坐索，时至掌灯时分，坐地收银者，气势汹汹，不甚耐烦。随后，张勋“辫子军”将民政署合围，不得六万钱，不言撤兵。幸而段芝贵将军呵斥张勋之恶行，大声疾呼：“不法之行！若不撤兵，我必率兵解此围。”张勋见此，才不了了之，收兵回营。

韩国钧的大度宽容之中，多了一些迁就与惧怕。总想安定大局，急于收拾兵灾战乱之情势，终让小人无赖钻了空子。

第二天，韩国钧至江边给张勋送行时，“则欢然如平生矣”。这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君子之风，还是文人本性中的羸弱之根？倒是张勋与韩国钧握别时嘻哈的一句谐谑之词：“此次累公多白几茎发”，把一个流氓无赖的闹得到就闹，闹不到就走——无所顾忌，毫不经意的嘴脸，自我刻画得入木三分。对这样的人行君子之道，除了顾及到上峰袁大总统的亲疏好恶外，实无多大意义。

## 兵灾善后

韩国钧执掌江苏省政不到一年时间，其间他的大部分精力主要是放在兵灾善后方面。江苏是一个经济发达的省份，而且其军事地理位置也较为重要，所以在辛亥光复时期，尽管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和平光复，但革命军和清军在南京、上海的争夺还是相当激烈，战火对无辜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破坏。上海开埠以来，成为通商口岸，地位有所提高，但其时行政隶属仍在江苏省辖下。

民国元年上半年，由于政府对溃兵、游勇的处置不力，江苏各地时有兵变发生。其中苏州阊门兵变、南京兵变破坏性较大。而关于“南京兵变”，4月14日的上海《民立报》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十一日夜十时，驻扎丁家桥之赣军忽纵火焚屋，旋即分队出劫，共计两支约3 000人：一支向花牌楼，一支向下关。出营放枪一排，即挨户抢掠。是时宪兵闻变，即整队前往，放枪堵截，一面飞报各军，一律戒严，由沪军驻守花牌楼，阻其向南，粤军蹙其后，包围痛剿。叛兵亦用枪还击，彻夜枪声不绝，火光烛天。叛兵死伤百余人，粤军伤数人。天明该叛兵等始分窜清凉山等处，由三牌楼至北门桥已十室九空，焚毁殆尽，劝业场亦半成焦土……”

又特派员昨日午后3时函云：“当起事时，先列队演说，以同胞为暗号，只许抢劫，不许淫杀，故人民无甚死伤。幸扑灭尚速，未致蔓延，亦幸事也。”文中提及的“驻丁家桥之赣军”，其实是赣军二十七、二十八团，为张勋旧部。光复后



该军降服，由陆军部编入第七师，人员杂拉，鲜有训导，蠢蠢欲动久矣。

叛兵被各军击散后，全窜至清凉山等处，赃物枪弹狼藉满地。被捕者百数十人，在大行宫枪毙数十人。其余叛兵勒令归营。

次日晨，城门洞开，火车通行，商民全行开市。时在南京的重要军事力量如姚雨平、王艺祥、洪承点、杜淮川、陈懋修所部，皆为训练有素，纪律严整之师，并不分昼夜梭巡弹压，故市场甚为安静，贸易如常，并无惊扰状态。但好景不长，赣宁之役又起。

1913年的赣宁之役，就南京的攻守而言，且不论攻守双方的战争性质，城中的百姓无端遭受战火的摧残却是不争的事实。

张勋的辫子军，攻打南京，确使全城遭殃。原来，张勋听得“革命党”又在南京“造反”，“袁宫保”又要和革命军打仗了，乃自告奋勇向袁请战。袁就派他会同冯国璋去打南京。许以攻下南京者封赏江苏都督。袁认为张勋的辫子军并不善战，江苏都督是预留给冯国璋的。但9月1日，张利用徐宝山的旧部作先锋，使用掘地道、埋地雷的种种方法，轰倒了一段城墙占了南京。这才有了张勋做江苏都督的前因后果。张勋采用三天不封刀的办法激励士气，在攻下南京城后，放纵士兵在三天之内任意地奸淫抢劫，直到第四天出示安民之后，这些行为才被“禁止”。三天之中，南京又一次沦为人间地狱，雷震春部在南门，张勋部在北门，挨家挨户抢掠，上自天花板，下至阴沟，都因兽军严密搜查受到破坏，只有搬不动的地皮没有被抢走；更有一家被抢好几次的，抢光之后被兽军放火烧掉了房屋。奸淫与抢劫同时进行。不少妇女在秦淮河投水自尽。当时的《盛京时报》均有详明记载。如此看来，韩国钧所接手的江苏省，确实纷乱而惨烈，不忍睹视。

韩国钧是1913年9月24日抵宁走马上任的，似乎并非如其所说：“入城则市肆各闭其门，其开肆者寥寥数家，货架皆无货”云云。当然，兵灾劫后的恢复非一日之功立能见效的。但赣军劫掠之处皆在三牌楼至北门桥一带，而城北素为冷落之区，富商大户鲜绝，故损失尚少。

11月21日，江阴炮台兵变，反叛兵士肆意劫掠武进焦埭及江阴月城桥等处，旋即在省内外引发轩然大波。北京方面并未施压，谅新上任的韩民政长有能力平息兵变，恢复局面。作为两朝重臣的韩国钧岂是等闲之辈，他左手“硬”，右手“软”，软硬两手都有。他着即与军署密商，力主派精锐之师剿办。平定兵变后，他立即提议专设赈抚局，筹议抚恤因受兵灾而困顿不堪的武进、江阴、南京等地市民，并明确要求，由赈抚局牵头，联络地方士绅，分区查实因兵灾而遭受的损失，然后根据受灾的实际情况，分别偿恤。

韩国钧呢，既已坐到火山口，那只有消弥灾变的份儿。舍此，并无选择。他责令赈抚局核查的损失为1500余万元，是有些水分的。而韩国钧据此上报中央政府，力请拨款救灾，终获救灾款180万元。款数虽不大，但于稳定大局民心，实是收到奇功大效。

不少文人墨客纷纷撰文盛赞韩国钧：“来宁未匝月，而商贾云集，车马喧闹。市肆殷繁视昔加盛焉！士庶吏民贩夫走卒，莫不交口称曰：此新任韩民政长抚恤救济大功也！”

上海的《字林报》甚至列举“汉口及津保之变，一无偿恤”来比较南京的优抚，可谓做足了文章。其实当时的180万元，对于救灾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韩国钧更是一语中的：“区区之数，能救民心。”

平定兵变，抚平战乱的创伤，都是作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应尽之责。但韩国钧做起来，从从容容，挥洒之中又见方寸。在节骨眼上使气力，事半功倍啊。舆论的推波助澜，更使



其政声昭然，深入人心。不论怎样评说，是出于为官的本能，还是玩的“形象工程”，都可圈可点，堪称大手笔。韩国钧上任伊始，即能平定江苏政局，足见其政治才干绝非流俗。

## 赴皖前后

1913年12月，直系军阀、袁世凯手下大将冯国璋接任江苏都督。

冯国璋（1859—1919），字华甫，河北河间人。他虽受宠于袁氏，但他自恃是天津武备学堂的科班出身，并不把袁世凯真正放在眼里，号称“北洋一杰”。他坐镇东南富庶地区，与民政长韩国钧共事，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办了一些事，同时大力扩充了军事实力，财源亦滚滚而来。冯常以军权干涉民政，经常长驱直入民署财政厅，以白条取款。韩国钧因就任前已电请北洋政府为之划清军民权限，所以亦不相让。特别是税收，韩国钧拒绝军署插手，明令各地税所皆以民署政令为准，税源他流，税所长就地免职。



冯国璋

首先是赋税问题。因战事频仍，赋税又要加增。

江苏省自古为膏腴之地。自唐以来，田赋乃居全国之

冠。唐时韩愈就有“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说法。民初，全国丁漕总额为8 000万元，而江苏省竟达1 500万元，差不多占全国的十分之二。而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四属岁额达1 050万元，占全省的十分之七。明时张士诚据吴，“以租为粮”，苏民益困。江苏省人民念国家财政之艰，忍此苦痛。自唐至今，垂及千年，朝代更迭，而赋税独留此数之重而不易，反有加增。韩国钧身为苏省父母官，深感治国之道不患贫，而患不均，于是上书北洋政府“苏松常太四属赋税悉以现征额为至多，永不添加”。袁世凯察当时之情，江苏省既能完成现征税额，只求不追加，于中央财政并无大碍。于是，欣然同意，并颁申谕令：允江苏省保留赋税之原额，不再添加。江苏人民的负担并未因此而减少，但江苏省上下似乎心理上获得某种舒缓，一句“以现征额为至多，永不添加”，也使百姓看到苦海之岸。韩国钧在得到中央政府允诺后，又颁布民署政令：“凡税额骤增之处，移官长之奖金，充地方公用。而官长之考成，则与各项政绩平均优劣，以进退人才。庶不开榨克之风，而忘膏脂之所出。”这对苏省之内大小官吏是一种告诫。在日见污蚀的官场中吹进一丝清风，加之韩国钧惩肃了几个贪官，江苏省官员都有所收敛。由此，百姓心里多少得到一些安抚。

其次，袁世凯恐冯“尾大不掉”，遂进一步对他进行拉拢。袁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自冯国璋外放东南以来，羽翼渐丰，越来越不听袁世凯的使唤。冯国璋在北洋政府中是以实力为后盾的。

其时，他手中掌握第二、第十九两个陆军主力师，第五、第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四个混成旅，以及禁卫军（有一部分在北京），共约3万人。袁对冯的策略是既打又拉。在给他封官加爵的同时，派亲信卢永祥、杨善德等人率重兵驻南京附近，在军事上对冯加以钳制，后又指使江苏巡按使齐



耀琳在冯内部作梗。

冯国璋与韩国钧间的矛盾亦趋缓和。在韩国钧的帮助下，冯国璋对江苏军警进行了整肃，设立了执法处。又从自己的老家调来大批警察，接替张勋的军警维护南京地区的治安，并命令军警不准侵扰学校，更不得擅自搜查学校。在南京还设立了宪兵司令部，以陈调元为司令，并设军事研究所安置解散的军官就业。这些举措，有效地改善了社会治安。

冯国璋对韩国钧的改革也给予了不少支持。如两人共同筹建了南京的自来水工程，在南京城内修了一些马路。韩国钧还筹款6万余元设立了待济处，专门贷给小商贩使之能开门营业，解决生计。冯此时下令成立了旗民生计处，推广垦植牧业等。

在韩国钧的影响下，冯对江苏的教育也开始重视起来。当然，设立陆军讲武堂、陆军警察学校、南京军事图书馆，客观上提高了军人素质，培养了军事专门人才；主观上还是冯为了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巩固自己的地位。

稍晚，冯国璋倡议成立全国教育会，率先在南京设立了筹备处，并逐渐普及到全国。夫人周砥也热心于教育，她多次参观南京女子学校，还宴请女校校长，与她们商讨把女校推向全省。

江苏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境内河湖水网密集，因此，水利是江苏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战乱，江苏省水利设施废弛不少。韩国钧自视事江苏省始，就非常关注水利的兴修，约略在第一次掌苏政期间决策或兴修的三大水利工程有：1914年的年初，筹发7万元，开浚了宁垣境内的秦淮河。3月27日，江北运河会议在宁召开。韩国钧协调与会各方，“筹办淮徐海赈款28万元”，并决定“以工代赈”，既解决用工所需资金，又减轻了江北民众的负担。5月2日，韩国钧风尘仆仆地赶赴常熟，勘视了白茆河，并决定拨款20余万

元，用于白茆河的浚深和河堤加固，并嘱江南水利局汪胡楨工程师督察工程进展。其时，正在实习的上海同济工学堂工科的郑肇经应邀参加了工程的部分设计工作。

这些水利工程，有的在其任期内已经完工，如开浚秦淮河和白茆河工程；有的因工程较大和韩国钧的离任而拖延下去，如徐淮海运河疏浚工程。总的来说，韩国钧主持协调的水利兴修造福了一方百姓，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但是韩冯的政治蜜月，随着冯国璋携新婚之妻北上归来后也就寿终正寝。冯悻悻然透出一些动向：“项城欲以军署兼民政，实非吾之所愿。”冯说要取韩而代之是袁大头的意思，自己好象并不情愿似的，这当然是念及先前合作的愉快了。这是冯卖的“噱头”，由此可见冯的手段了。冯后来能“荣升”副总统，代总统，也并非机巧使然了。除了军事实力做后盾外，也包括圆滑老道的官场处世技巧。

不久，韩国钧入京面见袁世凯，力陈官制修正之要，说得入情入理，把理顺各省军政的关系，最后寄托在袁世凯那里，多少显现出书生的本相来。袁世凯不痛不痒地敷衍了几句：“凡督抚莅任作事，不可事事更张，审择一二要事力行之，必能为地方造福。”实际上，早在1913年1月初，袁世凯就发布大总统令，明确了民政长与都督的权限。在韩国钧就任江苏民政长之前，曾电请中央明令军、民权限的划分，随即中央再令遵照划一官厅组织法办理。可见，关于军、民的职权划分已十分了然。但袁政府所规定的军、民权限是一个原则的划分，在实际操作中会产生一些扯皮。另外，冯国璋与韩国钧的矛盾也有它的必然性，就是韩是一个实干认真、久经官场历练又不甘做傀儡式的人物，那与专权的军阀走到这一步在所难免。袁既要依重利用安抚冯国璋这样手握重兵的嫡系军阀，也需要像韩国钧这样肯为国家出力的文人官吏的辅佐。对主持一国大政的袁大总统而言，调韩国钧任安徽巡



按使，是调解冯韩矛盾的最佳方案。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能让一个文人省长不高兴，但对手握重兵的冯国璋不得不笼络，施以取将之法，甚至在无关宏旨的情况下，作些小让步。这就彻底粉碎了韩国钧仅存的希望。乱世之秋，韩国钧略带理想色彩的一些想法，都被政治实力的天砣碾得粉碎。1914年6月17日，韩国钧奉调安徽任巡按使，卸苏职而去。

北洋政府1914年5月23日令：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9月5日，韩国钧卸江苏民政长任，并电辞安徽巡按使，未获准，遂告假归里一个月余。

这时候的中国，到处兵荒马乱，一片恐怖。与复古运动同时出现的是全国的戒严状态和特务恐怖统治。火光、枪声、巷战、抢劫在各省日有发生，每天的报纸都用很大篇幅登载捕获革命党人和杀戮党人的消息，捐税也层出不穷，人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

袁世凯自3月2日起先后公布了治安警察条例、乱党自首条例、报纸条例、惩办国贼条例。

在许多同僚旧属大多“封官晋爵”的时候晋京，韩国钧的心情应是复杂而微妙的。既然尚未“弃绝”，可见观望与期待还是有的。

10月18日，韩国钧到京。

20日，韩即面见了袁世凯和黎元洪。韩国钧虽为清廷旧臣，但大致上还是一个能顺应历史潮流的人，即识时务者。如今共和三载，官制多复“清例”，弄得“清不清民不民”的。这时袁的帝制活动虽说还没有完全公开化，即使偶然露出马脚来，随即又矢口否认。但这种想做皇帝的气味却是越来越浓，政治嗅觉灵敏的大小官员都能感受得到。与韩国钧同受召见的是一个叫王闳运的老“风流才子”，其时，王已被袁敦聘为国史馆长。王馆长对袁嘻笑地说，总统府应当加挂一块横匾，横匾上应当题“旁观者清”四个字。既然有了横匾，就应

当有楹联来配合。王馆长代拟的联语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政事堂也应当有一块匾，匾上可题“清风徐来”四个字。袁对这位“耆年硕德”的老前辈当然使不出总统的威风来，只得干笑一阵，敷衍了事。

袁世凯复清制老例，并不是要复辟清王朝，而是要自己当皇帝。他不时用试探的方法，投石问路，见时机不到，立马又缩了回去，诅咒发誓决无当皇帝的野心。

这一点韩国钧身处下官的位置不能看得十分明白，但韩隐约感到一点不妙。这种感觉并不能点破。韩国钧只能就目下“双轨”官制的弊端陈说己见：“似回流而使人无所适之，盼总统修之以应时局。”其实，王闿运和韩国钧都猜错了袁的底牌。后来，很多人都称“民国三年”为“复辟年”，清室复辟的谣言也盛传一时。

当时一般遗老都深信“不久日月重光”的话。而韩国钧则认为“回复以往于家国无益”，这是他的进步。他的目光之中隐含历史的穿透力：“朝代更替，一如东逝之水，无以能复还。清定无以复明，明定无以复元，元定无以复宋……”超越时空，立于高处，俯瞰世事，使韩国钧免遭旋流的裹挟吞没。

果然，袁世凯又重弹春上自己的誓言：“本大总统受民付重托，就职宣誓，永不使帝制再现中国，皇天厚土，实闻此言。今重申，恐邪说流传，混淆视听，极其流毒，足以破坏共和，何以对起义之诸人，死难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赞成之友邦！”“国事非于弈棋，政体岂同乎儿戏？”言之凿凿，使王闿运听得目瞪口呆，韩国钧听得疑团顿释。袁大总统并未正面与韩国钧讨论官制问题。他在火候未到的时候，决不轻易揭去锅盖。他要把“鸭子”煮得烂熟，非但飞不了，且更好下口，吃得舒服。当然，遗老们，特别是已成袁的工具的人物，自作聪明，也都是隔靴搔痒。袁并不反对帝制，但表面上决不轻言“复辟”。其实，这还是浅层次的。



遗老们更不了解袁所进行的是“帝制自为”，而不是“帝制人为”。说白了他是不让别人当皇帝（复辟清室），而是自己做皇帝。

10月22日，韩国钧游了颐和园，由仁寿殿至乐寿堂、观澜阁、排云殿、佛香楼、石舫，又乘艇游后山至谐趣园、琴峡。

一别京师又六年。

韩国钧在仁寿殿前伫立良久，他看到的不是中国古典建筑的辉煌，而是一个逝去王朝的背影，一个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2 000年的政治制度的终结地。然而“百脚之虫死而未僵”。一个政权被埋葬了，但它的幽灵却依然在古老的土地上徘徊。

随后的10月26日、11月3日、11月9日，韩国钧三次见到袁世凯。一次为行觐见礼，两次为传见。后两次袁世凯仍在居仁堂召见。同被召见的其他文武官员皆行跪拜大礼，韩国钧虽说心里嘀咕，但容不得他多想，随大流按老规矩行拜。循旧礼跪拜虽说在袁即将登基前表明的一种政治迹象，但由清入民以来，年头不长，到了这地方，巨大的惯性使然，这些旧朝过来的高官双腿就很容易软了。

韩国钧此番晋京只有两件事，一是陈说现行官制之弊端，劝袁修改官制。这个目的当然不可能达到。此时袁虽没有公开表明要行帝制，甚至在前次接见韩时信誓旦旦：“永不使帝制再见于中国”，但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帝制自为”的皇帝梦。袁世凯这次接见韩国钧等各省文武官员，就透出这么一点意思来：“咱们的共和办得怎样？”在“共和”之后加了一个“办”字，其弦外之音，就是暗示共和制度只是一种试办性质，而不是固定不移的制度。如果办得不好，还可以采用其他的制度。各省武人与民政长都懂得袁的用意，为了达到封侯的目的，大都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共和没有办出成绩来，希望大总统多负责任，乾纲独断，以慰苍生霖雨之

望。”韩国钧上了年纪，对封侯没有多大兴趣，不识“时务”地认为，外交吃紧，边防空虚，对政治问题应当多加考虑，以免引起强邻干涉。

事实上，在袁统治时期，地方官吏乘坐呢大轿，鸣锣开道，前呼后拥，卸任时勒令地方人民建立德政碑，恭送万民伞等恶习，早已盛行一时。

韩国钧修改官制的建议不用说袁世凯听得不舒服，就是身旁这些想封侯的各省大员也觉得是妖言惑众，背时的韩老疙瘩说胡话。

当然，韩国钧晋京的第二桩事即面辞安徽巡按使的请求，也没有得到恩准。韩国钧此时的心情颇乱，北洋政府的杨杏城，以及同受召见的熟识的与不熟识的各省大员，如豫省民政长林赞虞、闽督郭鹤龄、粤督张安甫、奉天军督锡清弼和赵次珊等，都力劝韩就职。韩国钧在日记中记述了当时的心情：“士贵自立耳，奔走何为？昔诸公同仁或老或死或遭乱殉节，而余虽数问国事，终未收尺寸之效，愧知己多矣。”韩国钧的失望和苦闷源于其政治抱负的无法实现，虽据省位，而不能有所作为，对日见混乱的时局不免悲观起来。昔日的同僚故旧“或老或死或遭乱而殉节”，怎能不悲从中来，感叹人生的短暂和无奈。袁世凯狡狴的两面手法使他摆脱不了政治的纠缠。最后一次被传见时，韩国钧获袁世凯颁赠狐裘一领、食物四事。最高统治者给地方官员馈赠物品，虽说仅是一种象征意味，但却是很高的政治荣誉。换言之：袁总统的亲自劝说，也是韩国钧赴皖的因素之一。从本质上看，此时的韩国钧或许还没有真正绝意仕途，也可以看成一心为国家出力，不在其职又怎能更好地为国家出力呢？从年龄上看，韩国钧时年58岁，在当时情况下，还是可以在官场上有所作为的。他无所适从，亦不得不从。人在官场，常常身不由己。

韩国钧终于出任安徽巡按使。



## 励图皖治

1914年11月11日，韩国钧到达武昌。在湖北将军段芝贵的衙署，受到特别接待。段芝贵安徽合肥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赴日留学。甲午战争后追随袁世凯编练新军，1905年后曾任黑龙江巡抚。韩国钧在奉天任职时多有交往。停歇两日后，韩至安庆走马上任。

安徽巡按使是韩国钧一生中任职时间最短的一个官差，前后差不多九个月的样子。

初至安徽，人生地不熟。韩国钧花了半年的时间来熟悉全省的情况。

韩国钧把皖南皖北几乎跑了个遍，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他心中酝酿着。淮北万顷碱地“以淮水冲灌，深沟排碱，可望改良”，颍亳平原可特制精碱。皖南呢？当务之急是“改良茶务”，他认识到：“此非专门之术无救”。这些宏大的计划并非空想。韩国钧积经年治水改土的经验，在豫北任知县之时，已有试验，并小有成效。事实上，韩国钧早在年初就约请了天津严范荪、婺源江谦（易园）、宝山袁希涛以及皖名绅黄伯雨、余寿平会商皖省教育，请农商部司长淮安田桂舫来商接收石门山农场事，并聘请美国专家艾伯莱在滁县创办了畜牧树艺所，所有这些都是韩国钧兴皖宏大计划的开场戏。

1915年5月21日，韩国钧视察了位于城东的教会所设的同仁医院，参观了男女各校，其中一学校陈设的标本有埃及3 800年前的木乃伊。这具充满弹性的褐色女尸呈现出皮

肤的质感，令人惊异数千年前古埃及人高超的防腐术，而目下古国虽存，国势已衰，不由得使人深思。推而及之，古老的中华帝国，曾经雄视世界的凛然威风又跑到哪里去了？金字塔、木乃伊、长城、指南针的辉煌，不能成为子孙们永远的骄傲：我们用什么来夸耀那些辉煌以后的岁月呢？目之所及，韩国钧想得很多。为官之要，虽不能振国势兴昌盛，至少要保一方平安，民之安居，若不能及，居官何为？

6月，韩国钧出安庆沿江而下，过贵池、铜陵、繁昌、芜湖、马鞍山，长江两岸，偶尔有葱绿过目，但更多的是萧飒秃然的山岭。江堤呢？破败的破败，坍塌的坍塌。江流越发地凶险。韩国钧对沿途下官说：“应种树营林，以御水患。”22日，韩国钧渡江至东流县八都湖安阜公司视察时，收到省署转送来的大总统颁赠的折扇及缣纱（细绢）和题写的福寿条屏。对快60岁的韩国钧来说，历尽世间风云，深谙官场道术。大总统的颁赠褒奖，既不会使他受宠若惊，也不会使他悖于恪守的信条而行事。韩国钧始终把自己司职的这个巡按使，看成是展呈自己政治才干和为国家服务的一次机会，怎敢懈怠，况乎皖省乱麻一团，经济财力远不及苏省，军署民政之间，亦不甚融洽。

韩国钧意识到“皖之困难，首在财政，亦非不可有为”。假以时日，韩国钧兴许可以在皖省这张白纸上绘出新图。

回到安庆，还没有休顿，各界名流桐城汪能宽、淮南谢金龙、寿县石仁元（旧时有以籍贯连名来称呼，以示尊敬的习惯），以及江谦、袁希涛、田桂舫等，纷纷来商教育和实业之事。韩国钧静心倾听来者高见，也约略谈及己见。

年初，韩任命理财高手常州郑鸿瑞（士敬）掌皖财政厅，经共同筹议后，就皖省财政情况向中央呈文，表达了对皖省财政的看法。一方面对中央政府的筹款目的表示理解，同时陈述皖省筹款的困难及节流开源之策，从呈文的六条看，都是言之有据，论之有理的。其基本依据是皖省实际的



财政情形，反映了韩国钧省治的财政理念，体现了他一贯关心民瘼的民本思想。同时也可以看出，韩国钧并不是唯上官意愿是瞻，而是一个有独立思想和操守的良吏。

韩国钧来皖一月有余，才拜会了都督倪嗣冲。倪是安徽阜阳人，北洋军剿灭“白狼军”的有功之臣，是袁世凯的忠实追随者。

倪嗣冲曾任皖北镇守使，又以督军兼民政长，他并不遵守中央所规定的官制与法令，民政长公署不设五司，仅设内务、理财二科，教育、实业、司法都没有专管机构。随后他又建议裁撤全国司法机关。袁答应省级以上司法机关尚须保留，省级以下可先裁撤。1914年4月5日，袁以总统命令的形式公布：县知事兼理司法，审理诉讼。

其时，中央政府规定：军民分治，文武长官不同城和巡按使指挥地方部队等。许多省没有正规军，如果将军交出地方部队的指挥权，就将一无所有。将军、巡按使不同城的问题，只在广西一省施行过，将军驻南宁，巡按使驻桂林，其余各省大都没有施行。为了邀宠，倪嗣冲首先请辞安徽巡按使的兼职，“以明军民分治”，袁立即发布明令大加奖励。这就有了韩国钧赴皖任职的空间前提，但倪嗣冲明辞暗不辞，处处专权，使得韩在皖省难展拳脚。

倪治皖省，各县悉用酷刑，尤以“皖北处积威之下，人民困苦首在滥刑苛罚，不必其在县官也。一团防局可以枪毙平民，可以任意罚款，盈千累万，自收自支，无一呈报。县知事之贪横，无论矣”。

时皖籍京官任中央政府审计院院长的李经羲（字仲轩）致韩国钧的信中说：“皖之赋税尚不足以病民，地方附加则多近于无义。”曾文公当年有言：“世教既衰，人人呈其无等之欲，鱼肉孱民。而刀匕官司，布一令，甲徒以供若辈横索暴敛之资”，不啻成为其时皖省的写照。韩国钧决心冲决这张

罩在皖省百姓头上的铁网，在沉重和黑暗中给民众一线阳光。他在日记中写道：“历官三十年，一无建树，今日尸位，惟期综核名实，不自欺以欺人，尽其力之所能尽，若夫无力不逮，则亦知难而退耳！”韩国钧把去留想得很通达，这样放手做一两件事，也让百姓明白天底下也不是都漆黑无边，让他们活出一丝希望来。

秋浦县的李长生，因地契纠纷，被判八年徒刑。其母80无以食，只能到牢中分食儿子的囚食。遇雨，母不能至，则终日不得食。

辛亥革命后，为了表示与专制朝代有所区别，便改知县为知事。知事王仁鹏为其申请假释，“未为前使所允”，就是指没有得到倪嗣冲同意，王仁鹏哪里敢放人。李案本属苛刑，纠纷起于地契，因李而起，互有欧斗，而双方无伤。换用现行的说法，即可进行民事调解。但李的坏脾气，吃了大瘡子。韩国钧决意藉此案的甄别，对皖省的苛政猛刑开一刀。这也是对倪嗣冲不大不小的一次示威。

韩国钧对来见的王仁鹏说：“《孝经》云：人之行，莫大于孝。五行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王知事明白，韩巡按使是避刑之轻重，案之是非，而以“孝”入手，开解一个棘手的疙瘩，让倪将军无话可说。

韩国钧随即在王仁鹏的复请假释呈上批曰：“罪囚中有孝子，法虽难宥，情有可矜。知事本应念慈，以资教孝。本使诤（岂）不恤八旬之妇？为之推恩。”

韩国钧扯一面孝道宗法的大旗，借儒家经典的威势，悄悄地在倪老虎的屁股上摸了一把，戳了一刀。倪嗣冲也知趣地默忍了。这并不是说倪嗣冲怕韩国钧，而是碍于韩的资历，从年龄上说，韩属于长辈。再者，李长生案只是当时皖省酷刑非常普遍的一例，也不是倪铁定的案子。

滥刑与酷吏是孪生兄弟。韩国钧的第二刀就是举向寿



县知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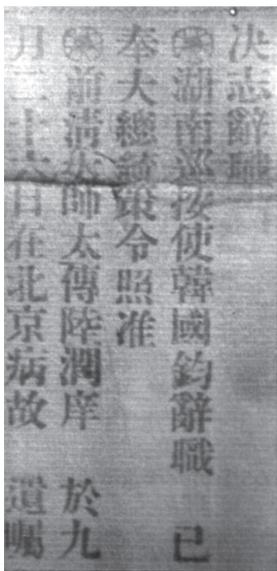
寿县知事邱成，人称“活阎罗”。他每次审案，皆用香火烧炙“犯人”的背和腋肢窝，受刑者皮开肉绽，因之无不诬服。前年夏日，衙役拘到一个名叫罗霄亮的刁顽，刚押至县衙大堂，罗一个跪拜，连连招供。邱问他何故不待用刑就满口招认，罗答道：“我早闻邱大老爷的厉害。不招是死，招了也是死，不如早早招了免受皮肉之苦，落得便宜。”

邱阎罗在寿县地面呼风唤雨，横行不法，动辄罚没用刑，法度全凭他一张嘴。所罚款项，恣意挥霍。韩国钧接鸣冤状不下百余。周巡寿县，怨声载道。这年夏天，韩国钧就撤了寿县邱阎罗。一时间，寿县民众奔走相告，尤如寒冬遇暖日。

倪嗣冲主动请辞安徽巡按使，不过是讨袁老头一个欢喜。他哪里容得新来的韩国钧尽情发挥，坏了自己多年在安徽苦心经营所构筑的倪家天下。韩国钧只在撤了邱阎罗之

后，才礼节性地通报了此事。一是此乃巡按使之职权内事，二是告知一下无非是顾及一下倪将军的面子。倪嗣冲听到寿县知事被撤，随后向袁大总统参了韩国钧一本（电告）：“韩以苛刻为精细……罗织名状，笮伐下官，皖省始无宁日。若此，余请辞都督职。”

倪嗣冲的辞请，不过是要挟罢了。袁世凯调停皖省军民之间矛盾的办法，就是任命韩国钧为湖南巡按使。之所以不调走倪嗣冲，除倪是皖人，



如皋《通俗报》关于韩国钧辞去湖南巡按使的消息

有“皖人治皖”的意思之外，更重要的是，倪也是袁的心腹大将，手握重兵。此时，具有复辟祸心的长江巡阅使张勋正驻扎在淮海重镇徐州。留倪主皖，可以监视张勋。由此，倪也开始了长达数年独主皖政的历史。孰轻孰重，自是一目了然。

这边呢，韩心里明白：“湘亦犹皖也”，遂决意辞去此职。至此，治皖计划就此搁浅。

韩国钧从没有坐热的板凳上站起，离开安徽，告假还乡。假期届满，再请辞湖南巡按使职。1915年9月21日奉准。

## 冷眼观帝制

韩国钧回到故乡海安不久，袁世凯就撕下了复辟帝制的遮羞布。前一年由于中日关系极度紧张，整个1915年的上半年，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也就暂时停顿下来。而在对日屈膝后，他认为对日本已经送了一笔大礼，日本不会出面干涉他的“总统变皇帝”的把戏了。于是从6月中旬起，帝制问题又旧调重弹，且有急转直下的趋势。

这时帝制机关筹安会公然通电成立。所谓筹安会是袁授意研究国体问题的团体名称。杨度因写《君宪救国论》而受到袁的嘉奖：“真是一个旷代逸才。”他亲笔题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匾赐给杨，并叫杨联络人做帝制问题的研究。杨度知道一个人包打唱是做不到的，必须找几个国内知名人士，才能使袁满意，从而把这笔政治交易揽在手里。于是，筹安会由杨度物色的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严复等五个“知名人士”组成。杨与五个知名人士时人称为“六君子”，而“六君子”中杨度是最重要的角色。他和保皇党不同，保皇党拥戴的对象是光绪，他却想拥袁为“真命天



袁世凯祭天

子”，自己做“开国元勋”。杨度曾致函韩国钧，想拉他进筹安会。杨认为韩以在野之身，研究国体，更能自适超然，而其心得更具说服力。

韩国钧虽居乡野，但这点政治嗅觉还是有的。杨度的来函，韩国钧并未回复。这倒不是韩反对筹安会，用他的话说，借研究国体，倡导共和，也未尝不可。但是卷入筹安会，那将是永远洗刷不了的污点，这一点韩国钧并未意识到。韩国钧认为这不过是人文政客的一种无聊。加之，北京正处于政治矛盾的中心，路又迢迢，也就懒得理这茬事。日后的事实证明，这恰恰成全了韩国钧的晚节。

虽说韩国钧嗅到了政治的异味，但他对袁称帝还是将信将疑。项城素多表白：“古往今来帝王子孙都没有好的结局。天下最愚蠢的事情就是做皇帝，我没有蠢到这种程度。为了爱国救国，我已牺牲了自己，我不愿再牺牲子孙。今帝制风潮何故愈演愈烈？”

有人说，袁世凯未必想当皇帝，倒是拥戴他称帝的人想

捞个“开国元勋”。事实上，各省劝进的大有人在。

湖南将军汤芑铭是急先锋。1915年8月25日，他打电报给袁：“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定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

话讲得最坦率的是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他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管，一面吸烟，一面大放厥词：“大总统高升皇帝，只须下一道上谕，谁敢造反就斩下谁的脑袋。”

对帝制最卖力的是“乾殿下”段芝贵。9月间，他联合14省将军密呈袁速正大位。列名的有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陕西陆建章、河南赵倜、山西阎锡山、云南唐继尧、浙江朱瑞、湖南汤芑铭、江西李纯、安徽倪嗣冲、山东靳云鹏、四川陈宦、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澜。

此时的袁世凯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意开快车。他不召集国民会议，而召集“国民代表大会”来表决国体。10月8日公布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以后，25日就在各省区进行“代表”的选举。28日以后就有部分省区的“国民代表大会”进行所谓国体投票，无论选举和投票，进度如此神速，是古今中外自有选举制度以来所未有的。

面对帝制闹剧，韩国钧不能冷眼看世界了。他以在野之身致函江苏国民代表大会，明确表示反对：“民意共和，而代表意君宪，天下鲜见。民国初建，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帝制自为，置道德信义于不顾，岂能安天下之心？”

喧嚣中，这点铮言哪有效应。12月20日起，袁世凯大封疆吏，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封爵的128人，师旅长、镇守使授轻车都尉的70余人。根据民国官制，不但各省将军地位平等，将军和巡按使的地位也是平等的。但袁不根据民国官制而根据清朝官制，对于以前有总督的省，就封那一省的将军为公爵，有巡抚的省则封侯爵。他把巡按使看作以前的



藩司，所以大部分巡按使只能得到男爵。

22日下令，内廷永禁太监，改用女官。25日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从1916年元旦起，总统府更名为新华宫，总统府收交处更名为奏事处，总统府护卫总指挥处更名为大内总指挥处。“新朝”所用国旗，准备在五色旗上加上红日一轮，是取“五族共戴一君”的意思。袁进行帝制，不但受到全国人民的切齿唾骂，即使在他的亲戚故旧以及攀龙附凤的政治寄生虫中，也有因为他们与袁之间存在矛盾，表示不同程度的不合作态度。韩国钧在奉天时的上司赵尔巽在看到筹安会的宣言时，把它扔在地上，从此不再到清史馆上班。徐世昌在辞职未准以前，迁出公府移居蝴蝶胡同。教育总长汤化龙、总检察长罗文干、参政熊希龄等纷纷辞职或请假出京。一时间，政界中人辞职、请假成为新皇帝登基前相当普遍的风气。这时，不热心帝制的政事堂机要局长张一麐，也明升暗降为教育总长。

袁世凯鉴于各方的不合作，不得不派大批侦探守候东西车站，禁止官吏擅自出京。同时，密令各省爪牙加强对反帝制之人的查控、镇压。韩国钧致省国民代表大会的函件，也成为其反对帝制的罪证，上了黑名单，被巡按使齐耀琳密呈中央，受到侦查监控。齐耀琳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12月21日才被袁的“赐爵令”封爵为一等伯。因此齐的积极性就很高，吁请袁“俯顺輿情，早决大计”，要袁加快称帝的步伐。

其时韩国钧在乡间的行动已不能很自由了，与外界的联系受到控制和检查，出海安更是不可能。泰县知事接到省府密电，限韩于海安，不得擅自外窜。知事当着韩国钧面说得婉转些：紫老出行当先报县衙，得允后即可成行。这是省里的意思，请见谅。当然“得允”是顾及情面的说法，不允则是铁定的。

退隐乡间的韩国钧对世事看得明白的看得明白，看不明

白的还真看不明白。特别是对革命党人（国民党为主的）的暗杀活动是持反对态度的。

1915年底至1916年初的中国，可谓天下骚然，苏沪地区也是一片动荡。

1915年11月12日，上海护军使郑汝成驱车至礼查饭店旁的花园桥时，车速见慢，忽一凶手掷炸弹，未中。旋见两人跳上郑汽车的足蹬，向郑连发16枪。郑汝成在送医院途中身亡。

12月5日晚6时，陈其美领导肇和舰起义反袁。战至6日天明，弹尽无援，弃船而逃。25日，蔡锷、唐继尧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分三路进军讨伐袁世凯。随后，袁政府调兵扼川湘而战。

此时的国家一如煮沸的大锅，到处翻滚着反袁的热浪。广西独立和五将军的密电，最终迫使袁世凯不得不放弃帝位。

1916年3月21日的公府紧急会议上，袁世凯终于自己提出取消帝制的意见。22日发表申令，正式撤销承认帝位案。但天下并不能因此而太平，各省纷争无已。近在咫尺的江阴、靖江党人暴动，搅得韩国钧心绪不宁。他在反对帝制和惟恐社会动荡的矛盾心理中审察着时局的发展。他在日记中是这样记写的：“江阴靖江先后为叛兵所据，南通又获党人多名，泰邑震动，幸旋平。”可见，韩对革命党的看法是有偏差的，将其划入乱党叛兵之列。作为两朝元老，韩对世事的评判自有看法，亦属正常。希望社会安稳无乱，在有序的状态中完成历史的更替，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所特有的一种心态。韩国钧不是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不能预见未来，对人生航行中遇到的代表新生力量的浪花，他常常惧怕被其打湿。但他在官场四十年的长久不衰，得益于他能顺乎大的历史潮流，反对袁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就是证明。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讨袁声中死去。韩国钧受侦查之事亦随之俱销。



## 二掌苏政

省长宝座：原是火山口。

韩国钧蛰居乡间的几年间，埋首故纸堆，修志编著，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究心于盐垦实业。其时，时局剧变，中国越发似一盘散沙。政坛亦戏台，“你方唱罢我登台”，主角，配角，跑龙套的，变着戏法走马灯似的登台亮相。先有黎大总统接过袁世凯的唱本，唱北洋政府的大戏。不久，名不见经传的李经羲夺过段的哨棒，抖起内阁总理的威风来，在内阁总理的位子上过了十天的总理瘾。黎元洪的屁股还没有坐热总统宝座，就有一个叫王得禄的山东大汉携刀闯黎宅，一连三人成了刀下之鬼。当然黎总统命大，躲过一劫。随后段祺瑞手执黎的任命，大喊一句“虽在林泉，义难袖手”，杀回北京，复任总理。

戏至中场，又见高潮。冯国璋先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后，又到京代理总统。冯下令派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此时，国会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并成立军政府，汪仅承认代理总理一星期，所以冯又去找王士珍，要他实践诺言组织新内阁。年底，王内阁成立。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

就在韩国钧在安丰泰源盐垦公司醉心于他的实业之时，直奉两系争夺江苏地盘白热化。江苏督军李纯忽然自杀身死。李纯当时是与曹锟、张作霖并驾齐驱的人物，封为英威上将军，苏皖赣巡阅使，地位在各省督军之上。本来，新任安徽督军张文生由徐海镇守使调任，资历很浅，可以受李

纯的节制。江西督军陈光远本来是李纯的老伙伴，也应当没有问题。但是，此时各省督军都自视为独霸一省的小皇帝，北京政府尚且不在他们眼下，那里愿意有一个直接上司压在他们头上，尽管陈光远是李纯的伙伴，他也不例外。陈光远表示江西与湘、鄂两省应当成为一个区域，不能划入苏皖范围，他情愿居王占元之下而不愿受李纯节制，随后他请病假以示抵制。陈光远的这一态度，使李纯受到很大刺激。同时，李纯保荐他的干儿子文和为江苏财政厅厅长，文和是个著名的贪污分子，引起江苏人民的激烈反对。此时，李纯已精神失常，家人不给他上海的报纸看，他却执意要看。当他看到报上登载江苏各团体通电反对文和时，就放声大骂。从此，每日必哭，并经常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他曾致友人施愚一电，说他不久就要“披发入山，与世永别”。1920年10月11日，李纯在房中写信至深夜尚未就寝。已经入睡的王夫人忽然听得一声枪响，急忙爬起来，发现李纯面色惨白，不禁失色大叫，便由侍从人员急召日本医生须藤前来诊视，发现李纯肺部有血迹，又在枕头下面发现小手枪一支，才知道李纯已向右肋开枪自杀身死。

李纯死后，江苏省议会议废除江苏督军，并拟联合各省进行大规模的废督运动。北京政府当然不会倾听这种呼声。10月15日，下令派齐燮元暂行代理江苏督军。江苏地盘马上成为直奉两系的争夺目标，张作霖推荐张勋继任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如果江苏民众反对张勋，情愿自己调任江苏督军而以奉天督军让与张勋；曹锟推荐王士珍继任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继任江苏督军。此外，陈光远希望王占元调任江苏督军，本人调任湖北督军，而以齐燮元或吴佩孚继任江西督军。江苏军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则推举陈调元为代表与北京政府接洽，要求正式任命齐燮元继任督军。

北京政府认为，江苏是一个大省，齐燮元以师长地位骤



然一跃而为大省督军，未免跳得过高过快。但是，由于江苏本属直系的势力范围，齐燮元占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任命他继任江苏督军，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任命他兼任巡阅使，就说不过去了。北京政府为了平衡直奉两系的力量，至12月3日才发布三道命令：任命北洋元老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署理江苏督军，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

这是1920年因大省江苏督军位子而演绎的争权夺利的故事。随后各省涌现废督和民选省长的运动。广州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统。徐世昌再派颜惠庆代理内阁总理。而此前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则笼罩着“共管中国”的阴影。

这时孙中山在桂林组织北伐军大本营，并改道江西北伐。

其时，北京政府已为奉军所控制。

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年头，北京政府再次任命韩国钧为山东省省长，正在扬州开泰源公司董事会的韩国钧颇感意外。他绝意官场多年，怎么在他年近古稀之时，让他在混浊的政治漩流中继续煎熬？原来这是山东巡阅使吴佩孚的一个金点子。

吴佩孚自去年底战胜川、湘两军后，回到他的故乡山东。此时，山东人民正在开展驱田（田中玉督军）废督运动。吴于12月2日济南各界会议上，公然当众斥责：“省议会今天通电排斥督军，明天开会排斥省长，殊属不成事体。”吴佩孚的火是发了，但民众的愤怒并未消减。于是吴就想到找一个有政声民望的人主政山东，掺和一下，以维持山东大局。吴佩孚的建议，很快被北京政府采纳，因此，就有了这个任命。

韩国钧当然不能再蹈汤火，复电坚辞。北京政府不允。吴佩孚转请江苏督军齐燮元派人做韩国钧的工作。

韩国钧复电吴佩孚：“国政不纲，民生涂炭，至今日而已极。救时之要：必有强固之政府，而后有民治可言。今政府势若赘疣，各省自为风气，分崩离析，疆吏又何事可为？钧辱

躯多病，实难膺此重任。”

这时直奉战争爆发。

1922年春（从4月29日到5月3日），直奉战争以张作霖退守关外结束。张除损失关内地盘外，并未受到致命打击。吴佩孚早年在东北做过军事间谍，懂得了东三省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势力范围，如果出兵关外，必然会引起关东军的军事干涉。同时，因孙中山的北伐军已经改道江西北伐，吴佩孚必须拨转马头对付南方，也就没有余力把对奉战争进行到底了。各种政治势力与大小军阀新老军阀之间争斗的最终结果是南北两总统被逐下台。徐世昌被迫辞职逃往天津。陈炯明围攻总统府，孙中山逼迫下野。黎元洪又复位总统。法定的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世凯于民国二年十月十日就职，其任期应至民国七年十月十日为止。袁死于民国五年六月，由副总统黎元洪代理总统，黎又于民国六年七月被逐下台，由新选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至民国七年十月十日为止。黎、冯两人的副总统都是旧国会选出的，按照当时“法学派”的观点，他们代理总统都是合法的。至于事隔多年之后，又把黎搬上台来补足所谓总统任期，其法律根据是不足的。

一片喧闹之中，处江湖之远的韩国钧反倒成了“香饽饽”。

1922年的夏天，苏中小城海安在重复往日的单调冷漠时多了几分热闹。

一些举手投足极具官派的人物接连光顾海安，在麻条石铺就的七里长街上行色匆匆，引来小镇人诧异的目光。

最先叩开韩府大门的是一个叫刘玲生（宝应人）的省政府的科长。他是受江苏省省长王瑚（铁珊）的指派，专程由南京来海安的。王科长与韩国钧寒暄之后，取出王瑚的信函，未及韩国钧拆阅就先道明来意：“受王省长之托，恭请韩老返宁，共商苏省大事。”韩国钧对信使又能如何作答，只得取



了笔墨修了回书，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隔一日又有齐燮元督军派来高毓彤(淞荃)登门劝说韩公出山。

继又有吴佩孚派王子铭将军、黄天行顾问来访，嘱意韩国钧赴鲁掌山东省政。

齐燮元知悉此事后，立即又派扬州的刘君实中将游说韩国钧出山。一时间，说客盈门。吴佩孚已电请北洋政府变更命令，先掌苏政，然后再促其赴鲁。韩国钧甚觉好笑：“余以为（掌）苏命不发布则已，既已发布，而舍苏就鲁，苏人其谓我何故？”

这时，颜惠庆总理来电，催韩国钧赴京面商。

韩国钧大笑：“余既辞鲁又复辞苏，何事再赴北京？”他的态度是坚决的。而苏鲁两省议会的催就电又如雪片飘至。

齐燮元还不死心，一方面电请北京迅及公布命令；一方面又派高、刘两大员督请韩国钧出山。

黎元洪于6月18日发布任免令：王瑚调任山东省省长；韩国钧任江苏省省长。这不愧是人事任免的一着高招，在苏鲁省长人选的晃荡中寻到一个平衡点，可以暂缓苏鲁两省在人事上的纷争。

随后任命的有：高凌霄为直隶省省长，张绍曾为陕西省省长，张其铨为广西省省长，王永江为奉天省省长，汤芑铭为湖北省省长。原任直隶省省长的曹锐是曹锟的兄弟，高凌霄不敢取而代之，因此黎又改派有兵权的王承斌继任。这实际上是黎元洪“废督留省长”计划的一部分，各省军阀为了保留省长兼职作为将来废督的退步，于是纷纷喊使各团体出面来反对新任命的省长，这七位新省长除韩国钧和王承斌外，其余五位都不能到任。

韩国钧因为是大小军阀们点的“将”，当然不在被逐之列。但韩国钧从闲适走向烦嚣，再次坐到政治的火山口。西

去南京的路上，韩国钧的心情充满矛盾。他轻吟道：“出门西向难成笑，入世东坡不合宜。”国务院的“不允辞”的电令，加上朋僚们推拥敦促，渐趋老迈的韩国钧不得已赴宁接篆，时在1922年7月15日。夕照中，韩国钧挪动着有些微胖的躯体，迈着迟缓而坚定的步子，多少透出慷慨赴死的味道。韩国钧称这次掌苏政为“再入漩涡，磨蝎之命竟不可逃”，也是预知此番赴任的凶险与无趣。

## 700万新公债风波

韩国钧想不到自己绝意仕途七八年后又重新坐在多事之秋的火山口上。从民国二年任江苏民政长到此次重新执掌苏政差不多有近十年时间。十年间物是人非，人非物是，风风雨雨，难以言表。

有道是：“铁打的官场，流水的官。”韩国钧40年宦游南北，虽说历经风雨，恶浪险滩都闯过，但清正勤政，能做些有益民生的实在事，又抱定“合则留，不合则走”的超然之态，执权事而不谋私利，处江湖之远，又能忧患民疾，所以在北洋时期成为各方都要借重的人物。因此，在许多人眼中韩国钧是一个典型的官场“不倒翁”。

但是能在民初官场上立得住，且有恒久的声望并非由油滑和世故来奠定的。乱世之秋，要想在混浊中理出一泓清澈，耗费的心力，个中的滋味，只有韩国钧自己明白。

江苏省的重要，又有别于其他省。韩国钧自1922年7月15日再掌苏政，到1925年5月8日离任的近3年时间内，有三件事令他最为头疼：即公债之发行、议教之冲突、水电厂之标卖。

韩国钧说：“江苏者江苏人之江苏，非余一人之江苏，



必苏人同心协力，苏可以言治。”由此可以看出，韩国钧上任的初衷除了有潜藏的政治情结外，苏人治苏的理念也是促使其出山的一个因素，正如他所谓“苏人以桑梓义务相责备”之言。然而，在此次江苏任上，他感触较深的剧烈党争，其实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议会政治所特有的现象。以他所谓的“议教冲突”而言，就是江苏省议会和教育界因经费预算所发生的龃龉，终而导致影响较大的冲突事件。这一事件韩国钧在向中央报告的电文中陈述得较为清楚。

电文称：“此次苏省议会议决十一年度预算，教育经费比十年度虽增十余万，而以较本年度交议数则削减至十余万之多。年度过半，各项继续及新增事业，俱以举办，骤被削减，实有万难。正拟俟会咨，到即交复议，适渔日举行教育行政会议，各校长召集省垣，于虞日函请原任教育预算理事刘议员文辂，到省教育会事务所谈话，致起冲突。刘议员受有微伤，即扭控校长任诚、贾丰臻于检厅，指为被殴，提起刑诉。校长等则谓刘系离座失足，倾跌擦伤，时无证人，莫名真相。本署以双方报告情词各执，既经归案归司法，即飭厅验查核办。佳日晨，据警厅报告，各校学生有游行之举，即电令严密防阻。晌午，有议员、学生先后来署，议员谓学生殴伤吴议员辅勋，捣毁王议员景常寓所什物。学生谓被王议员家丁殴伤，亦各向检厅起诉。是日纷扰之时，警厅曾拘去学生一名。即经飭令解送法庭，岂有纵令释放情事。至此次事变之生，固属出于意，而维护防范则未尝少弛，且经迭飭教厅，严令各校长约束学生，毋为轨外之暴动。又经迭令警厅于各寓所加派岗警，切实保护。复于学生到署请愿时，经本省长严切告诫，一面并飭检厅将两日刑诉案分别依法侦查，秉公核办，各校学生旋即照常上课，议员亦别无它事发生。惟近日迭准省议会来咨，谓官厅不能维持秩序，宣告休会。查休会与否，系议会自身问题，官厅无权干涉。除已将维持

秩序情形咨复外，准电前因相应撮要电复。”

韩国钧的电文将议、教冲突的起因及经过叙述得比较清楚，而且从其作为省长的处置来看，也是合情合法，公允不偏。然而，为什么电文称议会“谓官厅不能维持秩序，宣告休会。查休会与否，系议会自身问题，官厅无权干涉”。这其实透露一个信息，即议会对韩国钧有偏袒教育界之嫌的不满。韩国钧一向重视教育，自第二次执掌苏政以来，对教育更为重视。韩国钧所述教育经费因“年度过半，各项继续及新增事业，俱以举办，骤被削减，实有万难”等语，就是一种同情的语气。当然，议会的不满不仅仅是靠休会来表达的。这就有了韩国钧所述的“遂集矢于余，其势汹汹，不可终日，有欲控诉或弹劾余者”的由来。

民国时期的所谓议会制度，尽管从表面上看已经建立，但议会实际上并没有确立应有的权威，其中，议员自身各方面素质的限制和议会制度的不完善，是议会难以充分发挥应有功能的因素。但是，从江苏前任省长齐耀琳在议会的弹劾下被迫辞职来看，省议会监督制衡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多少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平心而论，韩国钧自1915年辞官至1922年复出，有较长的时间没有接触官场，对官场的有些变化不太熟悉。在先前主掌苏政和皖政时，他最大的无奈是军人干政，而此次“议教冲突”导致的议会对其弹劾、控诉，恐怕是他难以接受的。韩国钧把“议教冲突”归结为党派之争，未免失之偏颇。好在，韩国钧在“议教冲突”处置中，即使对教育界有“左袒”之嫌，但其出于重视教育的公心，没有图谋私利，因而，面对议会的弹劾、控诉，“仍平情处置，不加丝毫成见”，故“久亦无事”。

韩国钧把“公债之发行、议教之冲突、水电厂之标卖”称为其宁任时最为棘手之事，实际上，与“议教冲突”给他带来的棘手相比，发行700万新公债风波则使他再一次饱尝仕



途艰辛。

公债亦称国债，是国家以信用形式吸收巨额资金的一种形式，公债按借款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内债和外债。中国近代严格意义上的国内公债的发行是从晚清开始的，为了挽救因财政危机而引起的统治危机，晚清政府多次发行国内公债，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三次，即1894年的“息借商款”，1898年的“昭息股票”，1910年的“爱国公债”。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发行的“中华民国军需公债”，开始具有一定的现代公债的完全形式。北洋政府时期，发行的公债规模扩大，仅自1912年到1926年间，北洋政府总共发行了28种内债，发行总额达6.2亿多元。纵观北洋时期的内债，1921年以前，北洋政府视举债为筹款的不二法门，可称得上是滥发内债时期，这就引起了银行界和民间人士的强烈不满。1921年，北洋政府在财政总长周自齐的主持下，在悉心听取银行界建议的基础上，对政府内债进行了整理。整理之后，公债价格上涨，金融市场活跃，政府债信得到了一定的挽救，但并不能解决政府财政收支不抵这一根本性问题。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北洋政府还是要靠发行公债来度日，这就有了1922年江苏省700万新公债风波的起因。

1922年，北洋政府决定在江苏省发行700万新公债，名为“江苏国库灾歉善后公债”，就是中央政府为发行公债而分摊给江苏的任务，不过公债的用途主要用于江苏。对于此项国债，韩国钧力主发行，这与他的思想经历有关。韩国钧虽在晚清政府为官近20年，但一直都没有能够坐到主掌省政的位置。在北洋政府官至封疆时，他切身感到一省财政的重要。一掌苏政期间，美国使臣柔克义认为中国不可轻借外债的看法，对其影响很大。在韩国钧看来，既然不可轻借外债，内债方案应为可行。应当说，韩国钧赴任时江苏省的政况，是促使韩国钧支持中央决定的重要原因。《申报》报道“自韩国钧接

任苏省长后，一般人士咸以为苏人治苏之目的既达，苏省政治从此可以刷新，乃迄今月余，外界所得闻之者，不过所委任之秘书，较前为多，所聘之顾问咨议较前更多而已。而据知其内幕者云，即此顾问咨议问题，已觉日不暇给，难以应付。盖应预定之经费有限，而各方之要求无穷，且纵不给薪，而名额过多，亦属不成事体。精神矍铄之韩省长，对此不免频频蹙额。”在这段报道中，从财政的角度可见江苏省问题的关键，即“预定之经费有限，而各方面之要求无穷”，这难免会让省长韩国钧“频频蹙额”。也就是说，江苏省的财政难以应对现时的各种政况。所以，对于这“七百万之公债，财政界认为续命之汤”。韩国钧通过“财政会议决定募集，而省议会一部分议员，以其不合法律手续，力持反对，京沪方面亦不少反对之表示”，对此，韩国钧颇为焦虑，“已请江北之黄以霖、马士杰，江南之贾士毅等往北京疏通”。

针对这项国债，不仅省议会一部分议员反对，旅京江苏国会议员对于江苏省发行公债700万元之举，颇不满意。参院议员朱浦恩等20人拟提出质问书，质问政府。大致谓此700万元之公债，既属于江苏分金库范围，何以不交国会通过。苏省众议员等20余人也提出大致相同的质问，且正式呈书政府。旅京苏人“对于代表来京深为怀疑”，决定在“江苏会馆开旅京同乡全体大会，运动反对”。

其实旅京苏人对此公债，也并不是全体绝对反对，在其内部也分成两派，一为激烈派，一为缓和派。前者则以此项公债为绝对不能发行，后者则非根本主张不发行，惟于账目要细查，基金要稳固，军费要多减。反对派虽借“国会未通过”为反对理由，但从其给苏省长的电文中可以看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其电苏省长长文，内分三策。“绝对划分军民两费，省长对于军费不包办，此为上策。岁计不足，先行截留中央收入七百万，此为中策。仿照皖省怡大债券案办法，以中



央专款为担保品，此为下策。而中下两策中，均以核减军费，整理收入为要件，并由公择其一，足解纠纷，何苦国省混淆，滥发公债，败名取辱。”本质上看，旅京江苏人对于苏省发行公债的意见，分激烈、缓和两派，虽主张各有不同，而根本则出于爱乡之一念。

对于旅京江苏人同乡会的反对，中央政府采用了变通的办法，将由江苏省发行的国债改为省债，《申报》对此作了报道：“江苏省七百万公债迭经省内外的一致反对，然省政府有‘得之则生，失之则死’之表示，势非发行不可，惟责任谁属，为一问题。故省政府用国库名义，使为国债性质，以其责任归诸中央。政府亦知其然，不愿代负此责。现经财部参事厅会计、公债两司会核结果，一致主驳，但所谓驳者，并非根本取消，系将原名‘江苏国库灾歉善后公债’圈去‘国库’二字，改为‘江苏灾歉善后公债’。其表面理由，以此债系省债性质，担保品亦属地方收入，故应正名为省债。实际以苏省议会几度开会未成，省政府可以先行发行，再请追认。若为国债，须经国会通过，手续繁重，通过与否尚无把握，故决改为省债。”

从这则报道可以看出，中央政府之所以采用变通的方式，将国债变为省债，是调解中央与地方矛盾的一种策略，本质上是希望700万元新公债能够成功发行。其时，韩国钧为了公债的成功发行，以及能够取得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也将苏省财政整理计划向社会各界作了说明，《申报》对此也有报道。

应该说，韩国钧的财政整理计划，是对反对发行公债人士的一个解释和交代。但是，反对公债发行的，仍大有人在，以至于发行决议迟迟不能获得议会通过。最后，韩国钧不得不向北京通电，以辞职相抗争。

韩国钧以辞职力争公债发行的通电，言之切切，论之有

据。1922年10月2日，国务院总理王宠惠以“此事有政治关系，顾不得法律手续，其势不能不与批准”为由，绕开国会，阁议批准了江苏省公债发行决议，这对省长韩国钧来说颇感欣慰。在未经省议会通过的情况下，随之700万元新公债开始发行。然而，整个10月份，旅京苏人不断掀起请愿抗议活动，反对中央政府批准江苏省公债发行决议。与此同时，江苏省部分议员也鼓噪反对，与旅京苏人相唱和。最后，支持韩国钧的东南老名流张謇不得不出面予以调解、劝说。最终，江苏省公债在部分反对声中正式发行。

总的来看，在围绕江苏省新公债发行的问题上，主要存在以下几对矛盾：一是江苏省省长与议会的矛盾；二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三是中央内部国务院与国会的矛盾。归结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政府与议会的矛盾。政府为财政窘迫，需要发行公债，而议会却以种种理由拒绝议案通过，阻止发行。政府有政府的难处，议会有议会的理由。应该看到，政府和议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议会政治的常见现象，但韩国钧为解决江苏省财政窘况，绕开省议会发行公债，多少能反映出韩国钧缺乏些现代意义上的法制观念。正如一则反对通电所指出的那样：“查本省发行公债，若为国债未经国会通过。若为省债，未经省议会通过。中间仅经阁议通过，又非主管部门所提出，法律手续显然不完整。”

当然，也应该看到，民国时期法制很不健全，议会制度也不完善，个别议员的反对并非完全出自公心。在当时江苏财政极度窘迫的情况下，经过一系列的据理力争之后，韩国钧绕开议会发行公债，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韩国钧自己也承认“公债之发行、教教之冲突、水电厂之标卖皆宁任三年中最为棘手之事。而此三年之精神遂为此数事牺牲无限，而于吾无毫末之益……”这样的表述又过于简单，一句“牺牲无限”当然包容了太多的无奈和苦涩。



事实上江苏省政坛惊风骇浪，处处险恶。这些精神牺牲中，都有与议会冲突的成分在内，这多少反映了民国议会政治的特点。令韩国钧没有想到的是，他为闸北水电厂标卖耗费唇舌，所得的款项，竟充军用。这表明，在军阀专权的时代，一个文人省长对政治只能有太多的无奈，尤其在军阀争战中，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但是后来江浙战争爆发，新公债引发的风波再次成为反对者的口实。公债的发行原本是补财政之不足，而实际上多半用于军饷。

## “消防队员”

江浙战争又称齐卢战争，本质上是派系军阀为争夺上海的实际控制权而发动的争战。

上海原是江苏省治下的一个县，辛亥光复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立了沪军都督府，由陈其美任都督。袁世凯任民国总统后，陈其美于1913年被迫辞去沪军都督职务，都督府撤销。为了有效控制上海，袁世凯派其心腹将领郑汝成率北洋军进驻上海，郑任上海镇守使。1915年11月，郑汝成被革命党人刺杀身亡，袁世凯又派淞沪镇守使、北洋军第四师师长杨善德继其任，改称淞沪护军使。不久，袁又任命卢永祥为淞沪护军副使。由于护军使职务比镇守使为高，直属中央指挥，不受所在地督军管辖，因此江苏督军无权管理上海的军务。袁世凯的这种安排有限制时任江苏督军冯国璋的意图，但问题是，上海的行政管理却属于江苏省，这就为后来的军阀争夺埋下了祸根。加之上海是我国第一大商埠，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财税收入十分可观，“每月光鸦片收入就能养活三个师的兵力”。这就让江苏督军齐燮元十分眼



1923年钱钟书祖父钱福炯筹建钱宅时，请时任江苏省省长韩国钧题写的“繩武堂”牌匾

红，声称“上海是我们江苏的一部分，一定要夺回”。而卢永祥则宣称“上海是浙江的门户，一定要保住”。在利益的争夺中，代表直系的苏齐与代表皖系的浙卢，难免一战。

袁世凯死后，北洋派分裂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而杨、卢皆属于皖系。1917年，段祺瑞升杨善德为浙江都督，卢永祥为淞沪护军使，上海遂成为皖系的势力范围。1919年8月，杨善德病死于浙江任所，段祺瑞实际操控的北京政府调卢永祥任浙江督军。卢又保荐第四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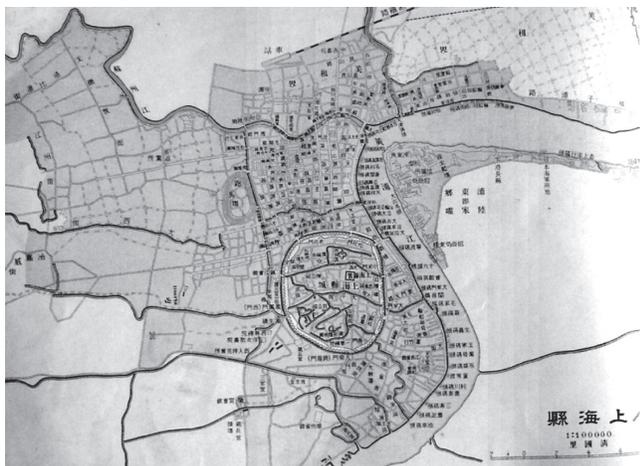
第八旅旅长何丰林继任淞沪护军使。在此期间，江苏督军冯国璋和继任督军李纯都曾力争上海的军事控制权，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达到目的。这样，上海一直是皖系军阀的势力范围，直到酿成齐卢战争。

1923年7月上旬，齐指使江苏各团体通电反对在上海召集国会、组织政府，同时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也质问江苏当局何以增兵昆山，于是江浙局势突然紧张起来。

齐燮元又准备联合另一直系军阀、福建督军孙传芳共同出兵，并由王承斌带领第23师南来接应，杜锡珪带领海军为辅助力量，进攻浙江和上海。

1923年8月，英、美、法日等西方列强的驻京公使联合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发出照会，警告北京政府。英国公使马克列向北京外交部提出紧急建议更为具体，即上海周围（包括水面）30里内不得驻兵或者采取军事行动。在此区域内，中国无论何方军舰均须撤退或解除武装。沪宁路不得运兵。上海兵工厂应予封闭，吴淞口炮台须卸下炮门。尽管他们口头上标榜对中国内战严守中立，可是照此去做，皖系海陆军的力量必须无条件退出上海，事实上这是西方帝国主义者对直系军阀的一种支持。同时，江浙士绅在风声鹤唳中又一次发起弭兵运动，他们和江苏省议会所提的弭兵具体条件，如划淞沪区为缓冲地带等，几乎和欧美诸国的建议完全相同。

西方列强的警告对阻止战争的爆发有一定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是齐卢双方都感觉还没有完全做好战争准备，同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上海总商会力主和平。深知兵灾之祸对社会民众危害的韩国钧，与主张弭兵运动的江浙士绅张謇、张一麀等相呼应，为避免战争的爆发积极努力，最终迫使齐燮元、卢永祥、何丰林等人于8月19日达成“江浙和平公约”五条共识。这一公约最后由江浙两省军政长官齐燮元、韩国钧、卢永祥、张载阳、何丰林等人共同签字，盖章



1907年的上海地图

发表。和平公约的发表，促成了江浙形势的暂时缓和。

1923年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在爱多亚路温泉浴室就浴时被人行刺，投送医院不治身死。在徐国梁的继任问题上，韩国钧和齐燮元没有分歧，会派申振纲继任。但淞沪护军使却另派警察厅总务科长陆荣箴代理厅长，遂又一次引发了直皖两系争夺上海的风潮。何丰林是皖系军阀卢永祥的嫡系。何与韩国钧、齐燮元首先就上海的行政权问题展开了电报战：何丰林坚持淞沪为特别军区，不受江苏督军管辖，淞沪护军使根据法令有节制上海司法行政之权；韩国钧、齐燮元则称警察属于行政范围，不在军区管辖权之内，淞沪警察厅厅长应由江苏省长向中央政府提名推荐，淞沪护军使无权委派，并电请北京政府下令裁撤淞沪护军使，保荐陈调元为苏常镇守使兼管上海防务。最后，北京政府令申振纲暂不到任，由陆荣箴代理厅长，这是北京政府的折中处理，也是北京政府的无奈之举，但此举无疑加深了齐燮元对卢永祥的忿恨。



此时的贿选大总统曹锟对于这样一件大事不能不问吴佩孚，而吴正施行“和皖”计划，因而齐攻沪的打算又一次落空。

齐燮元本不属于曹锟的直接系统，由于他报效过巨额军费和贿选经费，加之他所处位置的重要，因此，也受曹的重视。

齐所报效的巨额军费和贿选经费不少就出自700万新公债之内。韩国钧每日里如坐针毡。所谓“遂集矢于余，其势汹汹，不可终日。有欲控诉或弹劾余者，余仍平情处置，不加丝毫成见，久亦无事”。省议会对韩国钧的压力是很大的。除了新公债外，淞沪警察厅人事安排，也成议会大热点。当时淞沪警察厅经费加上游巡队费共有55万余元。江苏省承担此费用，而人事任用又与江苏省无涉。这实在是一大窝囊事。“从前齐、王（瑚）皆非苏人，自当仰何之鼻息。今既苏贤治苏，则权自我操，申君接事则经费自当照给，如不能接事则取消经费。何必以我苏之民脂民膏养数千之天津人哉？否则缩小范围归上海县办理，如镇江然。近来救时之论皆昌言裁兵，缩减军费尤可轻吾苏之负担。如能密电中央裁撤护军使或改为镇守使，必得宁垣之同情……省长既为吾苏省牺牲，何不乘此时机，垂名宇宙，是否有当伏乞钧裁。”这是省议员正肃密陈韩国钧的函件。可见当时为淞沪警察厅人事问题所引发的矛盾是多么激烈。

韩国钧处于两难之间。在淞沪警察厅人事安排上虽与齐督军无左，但韩齐两人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齐燮元争的是直系的利益，韩国钧要的是一个符合法理的权限。可是此事尽管韩齐一心，也还是于事无补。上海属你江苏省的行政范围又能怎样？上海地面在我何丰林脚下，你来打不成！所以齐燮元也只能发发牢骚，大骂何丰林，却奈何他不得。齐燮元无能为力的事，韩国钧又能有何作为？

不久，齐燮元被任命为苏皖赣巡阅使。气壮如牛的齐燮元至此只能气憋心头，无可奈何。

滑稽的是，陆荣廷因江苏省省长和督军电令交代惧而辞职，何丰林大骂陆是胆小鬼，但并未对此事作出对策。而北京政府又令申振纲暂不到任，仍由陆代理淞沪警察厅长，作为悬案，搁置起来和了稀泥。只是苏人恶气难咽，徒其愤愤然。

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到处碰壁。吴原想借孙传芳为打手，征服广东，但此时孙已接受了齐燮元的四省攻浙计划，想在浙江发展。而乱中取巧的卢永祥恰在此时收容了臧、杨残部。齐燮元认为这是进攻浙沪的有力借口，孙传芳也急于要向外发展，于是他们调兵遣将，岌岌备战。齐打密电怂恿曹锟说，奉军不能立刻采取行动，浙江可以一鼓而下，而浙江问题的解决，我们就可以腾出全部力量来对付奉系了。曹锟表示赞同，并劝吴佩孚必须采取“休戚一体”的态度，准备“积极应援”。

江浙问题关系着反直“三角同盟”的共同命运。张作霖派杨毓珣到杭州，表示本人一定派兵入关为助，并先汇来200万元接济浙沪联军的军饷。

韩国钧深知天灾（自然）人祸（战争）对社会与民众的危害。因此力劝齐燮元“勿为天下先”，意思就是不要先挑起战事。韩国钧苦口陈说，并不能消弥齐督军的战争欲望。

齐燮元望着眼前的这位文人省长，心中顿生鄙夷，实力加地盘等于发言权。纷乱世间，作谦谦君子管什么屁用？鉴于韩国钧的资历声望，齐燮元犯不着与他争执，口中应着韩国钧的话，不置可否，但胸中与卢永祥、何丰林一决雌雄的决心已下，岂是谁能说动得动的？

隔了一日，韩国钧又邀周孝怀同往军署力劝齐燮元。周与齐有同窗之谊，谁知这回齐燮元不待韩、周两人开口，就



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我已电请北京政府下令讨卢。”就在韩国钧、周孝怀前脚踏进督军府门槛的同时，齐督已命令苏军一路沿沪宁线由青阳港进攻黄渡，一路沿太湖西侧由宜兴进攻长兴。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终于爆发。

韩国钧又密请张仲仁去游说齐燮元，张君此前曾邀齐卢两督缔结过江浙和平公约，但此一时非彼一时，黄牛已入海，拖尾巴哪里济事？韩国钧还是不死心，再往督军府面陈齐督：“我年将七十，舍死外无他望，君年四十耳，前途未可限量，奚为此无谓战争？使战而胜不能兼督于浙，不胜将奈何？”齐督军哪里听得这个老朽的忠告，说韩省长少费心，我齐某有自救与救人之法。

代理内阁总理的顾维钧是嘉定人，江苏人士不许他逢迎军阀出卖故乡，因此顾在江浙战争爆发后仍不敢下讨伐令。但在直系高压之下，无奈9月7日终于下了讨伐卢、何的命令。9月12日，众议院通过了颜惠庆的组阁案，颜是上海人，也因物议可畏，迟迟不敢上台。

江浙战争最后因为齐燮元与孙传芳争夺收编卢部溃兵，弄得貌和心不和。齐视上海为俎上之肉，而孙传芳在上海所发布的文告中，有“本使添辖浙申”的一句话，似乎已经把上海划入他的势力范围以内。孙传芳又借口“援苏”一役消耗军火很多，必须取偿于上海兵工厂，其目的在于据上海兵工厂为己有。卢、何下台后，孙派白宝山代理淞沪护军使，齐派宫邦铎为上海镇守使，北京摄政内阁又派首先到上海的鄂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张允明为淞沪护军使，因此上海出现了“一国三公”的混乱局势。白宝山是江苏第一师师长，驻防海州，战时调往宜兴受孙传芳的指挥，因此与孙接近。白有自己的地盘，不愿与张允明争淞沪护军使，于11月14日率部退回海州。

此时，一时得势的齐燮元又收编了卢永祥的第十师，改

派郑俊彦为师长，移驻苏北，并从新发行的700万公债中挪用若干，购军火用海船由海路去福建。这更给韩国钧添了大的麻烦。齐的臭名，弄脏了韩的清誉。韩国钧的责任只是无法有效抑制他，并没有做黑心事。

齐燮元与卢永祥早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就因上海的争夺而时有冲突发生。1923年10月10日，通过贿选的直系军阀曹锟就任总统，12日，卢永祥通电不承认曹锟的总统地位，并声言与北京政府断绝联系，这就使曾为曹锟贿选经费出大力气的齐燮元大为恼火，决心对浙卢一战。但在后起直系首领吴佩孚“和皖攻粤”计划的压制下，齐燮元没有擅动。

此次，韩国钧执掌苏政，督军齐燮元曾三番五次的电催、邀请，同时韩国钧也汲取了以前与督军相处的经验教训，因此，韩国钧与齐燮元在一些军政问题上加强了沟通。当然，在淞沪警察厅长继任问题上达成共识，两人的目的并不尽相同。韩国钧是以省长的身份，追求的是一省之行政的统一，而齐燮元的目的是争取直系的利益。作为无兵无卒的文人省长，韩国钧在齐、卢相争的过程中，又能做些什么呢？其主要意图不过是希望江苏避免兵燹之灾，保境安民。然而，韩国钧的一片苦心，却招来了非议。1923年12月23日，江苏省县议会联合会的一份公开通电，竟然将韩国钧看成一个“徒逞私利，罔顾民隐”的祸苏之人，因为江苏县级议会联合会自称是一个代表民意的权威机构，因此读者也会相信韩国钧就是一个“以保护一私人地位关系，竟不惜借重武力，将全省民命财产，孤注一掷”的人，并再次提到700万元公债和最近淞沪厅长任命“类如财政会，该明知非法，竟以督军会衔如集，增加人民七百万之巨……最近淞沪厅长问题，亦袭彼故智，与督军会衔，挑动恶感，致江浙和平，行将破裂”。然而，江浙之争本质上就是军阀派系的利益之争，如



果把韩国钧与齐燮元会商继派淞沪警察厅长，看成是致”江浙和平，行将破裂”的根源，未免太肤浅，而所谓“解铃系铃”一说，则纯属无稽之谈。

韩国钧对江浙战争的实质是看得比较清楚的，他说：“江浙战争非江浙人之战争也。自有此役为天下先，天下遂自此多事。余逢此不幸之会，阻之不得，去之不能。苟余非苏人，固应为洁身计矣。”韩国钧能够看到“江浙战争非江浙人之战争也”，确实看到了战争问题的实质，而他作为文人省长“阻之不得，去之不能”，既道出了实情，也反映了他的无奈。而“苟余非苏人，固应为洁身计矣”则表达了他的一种“苏人治苏”的责任感。事实上，韩国钧也是这样来践行的。

应该说，韩国钧在战前对齐的力劝，是其尽力挽救危局的最后尝试。韩国钧痛恶军阀混战，对主持一省行政的省长来说，不论是发展实业、教育，还是让百姓安居乐业，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韩国钧反对战争是为了百姓的利益，齐、卢发动战争是为了军阀的私利，韩国钧的力劝当然打动不了一心向战的齐燮元。



江浙战争中的南翔废墟

战争的残酷，直接的表现就是生命、财产的损失。齐卢一战40余日，以卢永祥的通电下野而告一段落。由于此战主要是在苏州至上海一线展开，因此战争对苏南社会经济的破坏是巨大的。仅以齐卢的主战场浏河一带而言，“人民财产始厄炮火，复遭淫掠，加以海军时时开炮遥击，故房屋焚炸独多。如学校、庙宇、商店、教会、善堂、医院以及长途汽车，尽遭兵劫”，另外，浏河商市房屋，“为政争炮火焚炸，业经过调查，计被毁一百六十户，房屋一千七百八十间，合银五十二万三千九百十五元，炸坏房屋五百六十一户……两共损害合银六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五元。其屋内焚毁及被兵匪劫去之一切财物，何止倍蓰于此”。

有兵灾就要救灾，这一点韩国钧并不陌生。其实，在战争期间，韩国钧也一直在为尽快结束战争和救灾而努力，韩国钧自述：“此四十日中维持调护，百计俱穷，只以救济战地人民为急务。因邀美国教会诸君之入红十字者，分途赴前线救济妇孺，先后共四千余人，费款四千元，此则有赖西人之力耳。”

在江浙战争进行的同时，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由于直系将领冯玉祥临阵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贿选总统曹锟被迫



设在真如的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司令部



下台。直系首领吴佩孚兵败榆关，也只好由塘沽乘军舰浮海南下。直系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吴佩孚“武力统一”政策不得人心，曹锟贿选的丑行以及各直系军阀的种种罪行，都遭到国人的反对。

浮海南逃的吴佩孚，经上海、南京、九江等地到达汉口后发出通电，表示拥护曹锟宪法，并建议由黄河上游及长江流域各省在武昌成立护宪军政府，否认北京政变后所发布的命令。在该通电上署名的有齐燮元等21人，主要是原直系十省的督军将领。当然，吴佩孚失势后，通电署名的是碍于情面，并不是真心拥护吴的做法。毕竟，实力是军阀说话的本钱，而且，此时成立护宪军政府，无异于主动树立与北京政府的对立面，由此可能引起更大的纷争。因此，在江苏省长韩国钧发表劝说吴佩孚的通电之后，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等原直系督军回电表示赞成，因而，吴佩孚护宪军政府的计划流产了。韩国钧对吴佩孚过宁及通电相关事，有如下的记录“吴使过宁，余登舰一晤。吴使但言纲纪破坏由于人心先坏，平等自由之教育，其效如此，他未言及。是夜即上驶至鄂，旋发筱电，拟组织护宪军政府，长江流域几于同入漩涡。余遂单独通电各省，以为吴使刚正直毅，群伦钦仰。惟为国家计，今日不堪再现纷争之象，筱电传示天下，人民不免惊疑。若仅组立联合会机关，辅助段公，收拾时局，则情感易通，方针易定，实为大局之幸。某在苏言苏，恐地方既不愿受此牺牲，经济亦不能供此负担，尚祈审慎执行，云云。旋皖赣各督纷电响应，前议已寢息。”

有人认为，韩国钧的这一通电是齐燮元授意的。但是，应该看到，即使是授意而为，也是要经韩国钧同意的，而且通电中“在苏言苏，恐地方既不愿受此牺牲，经济亦不能供此负担”等语，就是韩国钧一贯民本思想的反映。韩国钧的通电是原直系督军将领下坡的台阶，对护宪军政府计划的

流产起到了促进作用；对稳定时局，避免更大纷争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1924年10月13日，卢永祥失败通电下野，这并非意味着江浙战争的结束。随着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结束，直系的溃败，促使北京政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以奉系张作霖为首的得势军阀支持下，1924年11月21日，皖系元老段祺瑞重新出山，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行中央政府权。按奉张的意思，12月11日，段政府免去了原直系将领齐燮元江苏督军的职务，齐去职后的江苏督军衔由省长韩国钧兼任。很显然，韩国钧以省长兼督军只是段政府一个临时性的举措，这一点韩国钧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向中央力辞，但未获准。

对韩国钧来说，省长兼督军并不是一份美差，此时苏沪的军政形势十分混乱，十分棘手。在上海的西方列强鉴于这两股势力可能有导致战争的危险，向北京外交部建议取消这两个军职，上海划为非驻兵区。此时，曾战败下野的卢永祥已被中央任命为苏皖宣抚使。为了东山再起，卢又派何丰林等到上海招收旧部，引起了上海局势的进一步复杂化。苏、沪的财政地位历来受到各方瞩目，奉张也不例外。为了将苏、沪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2月初，张作霖改其心腹大将张宗昌为宣抚军第一军军长，名义上归苏皖宣抚使卢永祥节制，实际上已开始向江苏进兵。而被免职的齐燮元留在南京不走，打算宣布独立，同时将自己的军事力量布防镇江、无锡一线，准备抵抗进苏的奉军。

对于中央任命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12月14日，江苏各镇守使联名通电表示拥护韩国钧，拒绝“另有军事大员来苏，希图总揽军政，破坏现状”。显然，苏军将领目的是为了维持江苏省现状，反对卢永祥南下宣抚江苏，而韩国钧就成了挡箭牌。24日，苏军的一部忽在苏州哗变，声称与齐脱离关系，这一局势使齐据守镇江抗奉的计划受阻。28日，齐离宁赴



沪，另谋活动。齐到上海后与孙传芳相约组织了江浙联军，齐任第一路总司令，孙任第二路总司令，共同抵抗奉军。

1925年1月10日，卢永祥由徐州南下至南京。15日，段政府下令裁撤淞沪护军使，宣布上海永不驻兵，并谴责齐的谋乱之举，同时，改任卢为江苏军务督办，任命孙为浙江军务督办。这样，齐、孙江浙联军解体。张宗昌的宣抚军自1月13日起源源渡江，与齐部军队接触，齐军很快溃败。1月28日，齐在上海宣布下野，东渡日本。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江浙战争，此次战争以齐的彻底失败而结束。

在军阀争权的舞台上，韩国钧只是一个陪衬性的人物，韩国钧省长兼任江苏军务督办，看似权力很大，其实不然。韩国钧自述：“沪上一警察厅，余委申振纲，卢委陆荣箴，张又委常之英。一交涉员，余委许任，卢委陈世光，张又委冯国勋。如此纷乱，安有民政之可言。经余商明，交涉员以许任，警厅以常任，秩序稍稍恢复。而知事，则丹徒、丹阳、常熟、上海为张所委任，溧阳、宜兴为褚所委任，淞江、金山为浙之所委任。行政系统破坏至此，更复何事可为？”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并不是韩国钧的过错。面对苏沪军阀间的争战，韩国钧所能做的就是尽量避免战火，保一方百姓的平安。

在齐燮元被免职后，韩国钧邀请军政商学各界在军署开茶话会，由“齐督军自述战事经过与解职情由”，意在让齐燮元抒发一下不满的情绪，使其能够体面地离开南京，也算是江苏省各界对齐的送行。韩国钧的这一举动，给落魄下台的齐燮元些许慰藉，也是希望齐能够识大局，不要再举兵争战，避免生灵涂炭，可谓用心良苦。然而，齐燮元还是在奉军人苏后，举兵迎击。怎奈齐军一败于高资，再败于无锡。齐的举动，让韩国钧无可奈何。面对如潮的溃兵，韩国钧所做的就是尽力避免溃兵扰民。韩国钧自述：“沪市一隅，中外商务所系，溃兵如潮而趋，必以沪为尾闾。余预为筹款，密派孙君

少江、朱君叔源等，在沪收容溃兵，随时资遣，获以无事。此为初料所不及，实则所费仅区区耳，然非孙朱二君之力不至此。”韩国钧能够提前准备，花费不多，而致上海商埠不被溃兵所扰，应该说他已尽力了。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政局，年近七旬的韩国钧决意辞去本兼各职，段政府虽然极力挽留，但此时的韩国钧去意已决，段政府只得批准。1925年3月31日，韩国钧与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办了交接，卢兼任江苏军务督办，但继任省长郑谦迟至5月8日才抵宁，至此，韩国钧才算正式卸任省长职。

韩国钧在江苏省省长任上近三年，兼军务督办三月余，江苏财政积亏自江浙战后为数不下3 000万元，中央政府令韩国钧及江苏财政厅在宁清算，并成立了财政清算监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气势汹汹，大有拿韩国钧问罪的架势。

其实，从知县起家久历官场的韩国钧，对江苏省财政亏空的原因有具体分析。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税源减少。

“奉军驻扎宁沪一带者益多，地方供应不资。县知事与税所军人多所干涉。淞江所属则在浙军范围之内，驻兵征饷不复有苏省主权，中央且不能制裁，苏省又何从抗拒？”另外，虽然“江南蚕利岁收逾千万”，但奉军久驻，“民户不克归家饲蚕，损失非常之巨”。二是战争费用超支。齐督军一战为的是直系的利益，耗费的却是江苏省的财政。三是救济兵灾和抚恤伤兵也耗费颇多。其中一次抚恤伤兵费款就达20余万元。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驻苏奉军撤军，韩国钧派刘君实、杜绍棠两中将，高集安参议赴奉天面晤张作霖，商量撤军事宜，幸而商妥。张宗昌虽履约撤兵，但又步张勋后尘索要开拔费40万元。韩国钧不得不设法筹集，最后送走了张宗昌，但韩国钧痛感“盖苏已悉索殆尽矣”。

从常理看，一省长官当然应该对财政亏空负责。但是，在军阀专权的时代，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全国兵马财政大权



都操在各省督军手中，中央政府的命令等于废纸，省长是督军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下，韩国钧又能做到什么程度呢？

当然，韩国钧不得不就亏欠情况对中央有一个交代，他在电中央的呈文中说：“财政出纳，财政厅长司之，省长仅负监督之责。至若审查考核，则无论省财政与地方（中央）财政，依法均各属诸立法机关。于省为省议会，于国为国会，而国库收支之事后监督又特设之审计院，此外别无所谓监督机关。某任内经手款项应由法定审核监督之机关予以切实审查，以符手续，是非虚实，将来不难自明，无俟某之置辩。”平心而论，韩国钧为官近40年，也算持正清廉。他从法理的角度辩白，当然不无道理。一句“是非虚实，将来不难自明，无俟某之置辩”，也是韩国钧问心无愧的表白。关键是，亏空巨款的事实是存在的，无论如何，对韩国钧来说留下的是无尽的遗憾。

回顾二掌苏政的经历，韩国钧感慨：“自余十一年七月莅省，秋后即有议会与教育界之冲突。十二年又因闸北水电厂事与议会争执，先后年余，始有结束。而江浙事起，谏阻不得，救济又不能，战事甫平，而中枢代嬗，于是又有易督兼督之事。奉军南下，齐督东行，地方既经糜烂而处境尤难应付，问心无以对苏，而力又不能救苏，尸位何为？再四请辞，幸遂初服，然吾苏疮痍之后，竟非前此景象矣。”

应该说，韩国钧的这段话是中肯的，也是客观的。其中“问心无以对苏，而力又不能救苏”道出了一个文人省长在军阀专权年代的无奈与悲哀。韩国钧历宦近40年，二掌苏政的经历或许是其宦生涯中的一处败笔。尽管他一心为民，一心想为国家出力，但时代的大背景是韩国钧所超越不了的。韩国钧在军阀争战中，力所能及地消弭灾变，极大地减缓了动荡时局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因此，作为省长的韩国钧虽无作为，但我们完全可以称其为一个不锈蚀的封疆大吏。

## 林下紫石

### 生日避客

《唐诗纪事》卷66载:赵牧效李长吉为短歌,对酒曰“手接六十花甲子,循环落落如弄珠”。意思是说不知不觉60年过去了,一如摆弄手中的珠子一般。下面说说1916年韩国钧过60岁生日(按中国传统计岁)的事。

这一天清早,天色微蒙,韩国钧嘱家人备一小舟,径向东行,至东台安丰的一片苇荡中,停歇下来。韩国钧选择安丰是有些想法的。这里万顷滩涂,清风徐来;极目四顾,天荒地老;苇草杂陈,空寂无人。空气中混杂着浓烈的海腥味,犹如听到大海的呼吸。旷远荒凉的原生状态,是那樣的简朴,那样的单纯。远离尘嚣的韩国钧“如出樊之鸟,其乐无极”。

韩国钧生日避客,要的就是一个清静。他在偌大的苇荡里,静心梳理着纷乱的思绪。他把自己60年的人生,反反复复地筛汰着、反省着、沉思着,像在做一篇生命的忏悔录。

这一生中,韩国钧三次濒临死亡,但都“死”而复生。生有定数,而死何足惜?6岁时窃食酒枣,此可谓第一次经



历“死亡”。从此，头脑中“死”的概念根深蒂固。43岁时署永城县事，七日不汗，亲见无数饿鬼索食……走游在人鬼之间，阴阳两界。60岁前沐浴时，煤气中毒，昏然不知人事，差点向阎王爷报到。

庄子曰“劳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说的是人之生老病死的常律，同时朴素地揭示出劳逸息与生老死之间的辩证关系。息者，无疑于死也。难道不合流俗，即以“息”而终老？能使韩国钧自慰的是从州县起家，虽未建伟业，但事事尽求良心，能担起责任。

生日前夜读《宋史》，韩说“已知之事读之如逢故人，未知之事则如新识之友”。他平淡而充实的赋闲生活，自觉“贤于饱食终日者”。

韩国钧选择安丰过60岁生日自是有其道理的。随后（1919）由他集资创办的泰源盐垦公司即在安丰场落脚。韩国钧生日避客，一是减少了许多无聊的应酬，让疲惫的身心得以放松调息。其次也借机勘视安丰场，在胸中为泰源盐垦公司绘起蓝图。须知，举大业者，岂能一蹴而就，打无把握之仗？所以，这也算韩国钧自办实业的一个序曲和伏笔。

1926年，农历丙寅年三月初四日，韩国



韩公馆正厅拱梁

钧70岁生日，此前10日，各地友人来祝寿者不下百人，令韩国钧酬接不暇，甚烦心力。泰县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教师章奎森采用扬州五师校歌的曲子，重新填写了庆寿歌词：

祝千秋，松苞竹茂，五福颂箕畴。正是莺花三月暮，寿酒献金瓯，荷幃幃东南保障，淮海庆安流。功成身退超然无虑，林下任悠游。人间亦自有丹丘，共说长生不老，阶前绿遍科名草。畅流曲韶，上巳初过，祝厘人满海陵道。

蔡兆庆老师负责教唱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师生们排列于大厅寿堂内全体肃立行祝寿礼，献祝寿辞，唱祝寿歌。

韩国钧引用庄子语，对众人说：“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无可有，故能若是之寿。”又说：“余自问虚度岁月，于国于民，无所裨益，何事称祝为哉？寿不足重转增？”古有彭祖生于彭城，其外祖父打哈欠的功夫，不见了彭祖，外祖父说孩子死了。传说彭祖活过800岁，也还属殇子（未成年而亡），也就是俗话说的“夭寿”。相对于浩瀚宇宙800年不过转瞬之间。那么70岁亦为“不寿”，何论“大德高寿”？“无可有，故能若是之寿”，意思是说一个没有用的人，才能有这样的年岁，这也是借典以自谦。说的是庄子去一大山，见一巨树无人采伐，便问伐木人：“此树之巨，何不伐耶？”伐木人说：“无可有。”因此，不可有之材才得以长久地生长。若说70岁是大寿的话，定是“无可有”才活到今天。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从这个角度说也是长寿的，但还是无可有才见长啊！

韩国钧借庄子的两个寓言，表达了对人生的一种看法，并告诫子孙不能虚狂和自足。一省之长，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人生七十说高也高，说短也短。关键是“于国于民，要有所裨益”。

韩国钧在整个祝寿期间，频繁会见宾客，颇费精神，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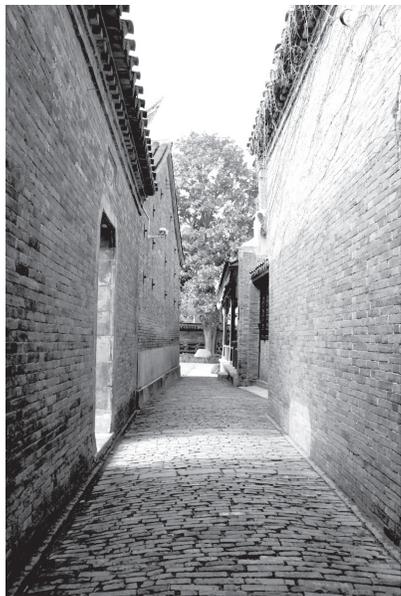


真正做的是一件事：是将各界人士的所赠寿仪8 000元，捐给海安平民工厂，后由此款购地130亩，作为工厂永久基金。需要说明的是，这8 000元中，亦有韩国钧的润格费在内。从当年的朋僚函札中我们能感知这种时尚。通易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黄群给韩国钧的信中透露了这一点：

紫石先生大鉴：

尊函并书件拜领，兹奉上润格二十六元，乞哂收。泰源诸事有劳我兄就

近主持，夙所感佩。尊示各节当与隽卿鲁山[岫]诸老接洽后，专函奉复。以前隽老亦有将泰源文件托通易保管之说，此事俟董事会决定后，群可效劳也。此颂年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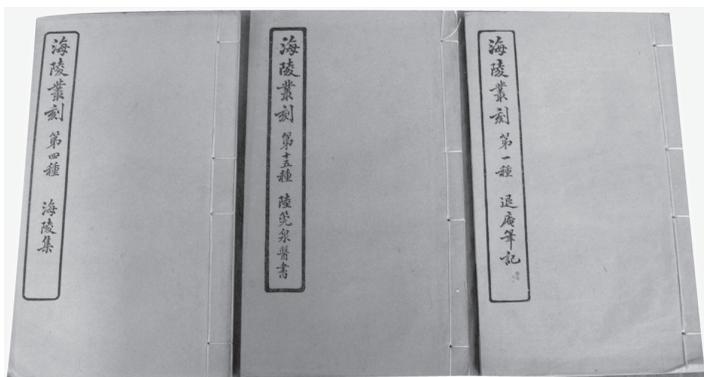


韩国钧故居防火巷

## 文化工程

韩国钧对地方文化的关注和贡献主要表现在《海陵丛刻》《吴王张士诚载记》《续泰州志》等三部大部头的著作的编纂上。

一部《海陵丛刻》集地方文史之大全，汇宋、元、明、清16家著述，凡23种，67册。从1919年冬开始编纂，历时十年



《海陵丛刻》书影

(其中复出江苏省省长期除外),终成此皇皇巨著。为后人研究苏北海陵地方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

这部丛书依种类分序排序,计有:《退庵笔记》六册,《梓里旧闻》二册,《退庵钱谱》三册,《海陵集》四册,《林东城文集》二册,《小学骈文》四册,《运气辨》二册,《依旧草文集》七册,《敬止集》二册,《庭闻州世说》二册,《微尚录存》一册,《春秋长历集证》四册,《海安考古录》三册,《绘事微言》二册,《陆莞泉医书》六册,《柴墟文集》四册,《东皋诗集》一册,《发幽录》一册,《双虹堂诗选》四册,《先我集》四册,《保越录》一册,《北辕录》一册,《袁景宁集》一册。

其间,韩国钧鸡鸣即起,究心考订,旁征博引,在故纸堆里又找到了治学的乐趣。他以史家的严谨,探寻者的勇气,跋涉在地方历史文化的山水之间,并获得莫大的快慰。每日青灯黄卷,有清茶相佐,让心沉浸在历史文化的流泉中,是他当时呈现出的一种生命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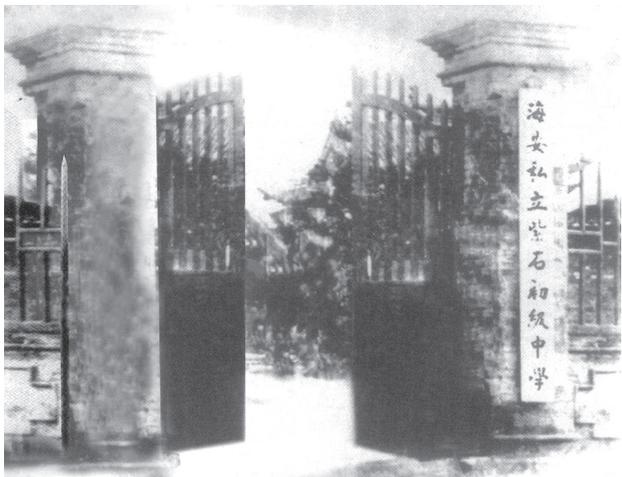
就说先后收入《海陵丛刻》的《运气辨》《陆莞泉医



书》作者陆儋辰（笕泉）吧，其人通才博识，尤致力于医，一生著作甚丰，但惜于财力，未能付梓，身后遗著濒临散佚。韩国钧编纂《海陵丛刻》时，陆先生已故去60年，收集整理其医著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韩国钧招贤集资，颇费苦心，四处搜寻，终于整理成册。韩国钧两为其跋。韩国钧还从近20万言的手稿中，发现混杂其中的《证治赋》独特的学术价值。他称之为“中医学入门必读”。而《运气辨》更是集陆先生毕生学术之精髓，其中“移光定位”之独识使历时1300余年的运气学南北征之误识，得以纠正。这部在中医学理论上极具突破意义的著作，是陆儋辰（笕泉）三易其稿，晚年始成的一部专著。编纂成书之时，韩国钧在《运气辨后叙》中写道：“予生也晚，不及从先生质问所学。”又自谦地说：“予不知医，而留心医理，检诸家注解，自唐代王太仆以下，虽复张皇幽眇，既辟途径，而千虑之失，时或不免……欲求一书详哉言之，拨云雾而见青云，盖其难矣！”韩国钧探究运气学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韩国钧在《后叙》中还说，运气之学是“从心光一缕中细渍而出，可以上质轩歧，而于‘移光定位’一语尤有独契，盖非苟于自信者。”这既是对陆先生在医论上有所突破的肯定，同时也看到韩国钧在整理编订医经之时，其学养已臻相当境界。“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韩愈忧遗著湮没，尤如淮南鸿宝，或韞椟长埋，或流失无踪。文明的传承，任何智识者，都颇看重，但如韩国钧这样躬身力行的，亦不很多。韩国钧的热衷，使生命星体的运行，留下行迹，也为地方文化典籍传之久远，有了实在的内容。

《吴王张士诚载记》是韩国钧晚年尤为倾心的一部书。韩国钧从1920年代开始搜求汇编，历时多年始成。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3月初版时，韩国钧为其作序，全书共5卷。



紫石中学

韩国钧“尤热衷于吴张遗事，博访周咨，复手自摘录、搜集散材得数十种，爰属伟成益加采获，汇编成书，用彰先烈”。可见作为鉴赏编订者的韩国钧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其正编按年纪事法记述了张士诚起义14年期间发生的事件；附编为附传、附考、附志、附录，记述了与张士诚起义有关的人物逸事、遗文以及典制沿革等。韩国钧独钟情于吴王张士诚，皆源自乡人先贤不屈的精神力量。张士诚的叛逆性格，永不言败的执着信念，深深打动了他，感染着他。“用彰先烈”应该是韩国钧编此书的深层次动因。

此外，韩国钧还任《续泰州志》总纂，这部书采集记载了1827年（清道光七年）至1911年（清宣统三年），泰州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水利、风物等内容，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典籍，共35卷，是一部内容丰富翔实极有价值的地方断代史。

韩国钧在潜心修史的过程中，获得了官场上永远得不到的快乐。



## 泰源盐垦

当清末状元张謇在狼山脚下大展拳脚，风风火火地办起纱厂、油厂、冶铁厂、垦牧公司、轮埠公司、师范、职业学校、图书馆、公园、剧场、医院、气象台，把狼山脚下闹成一块近代气息甚浓的绿洲，并由此摘得许多全国第一的桂冠时，在距南通不过百里之遥的海安，韩国钧再也按捺不住了。他面对大海的咆哮，一个酝酿已久的试验就在这片疯长苇草、一望无垠的滩涂上开始了。

1919年（民国八年），韩国钧创办的泰源盐垦公司正式落户东台安丰场。总公司设在簏子苴（现东台市原蚕种场），公司收购的荡地在今新农乡境内。

当然，韩国钧在黄海滩涂办盐垦实业并非开先河之举。早在1901年张謇在通海地区就创办了垦牧公司，利用滩涂围垦的土地种植棉花，为大生集团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张謇的这篇滩涂文章，做得不大不小，但他率先垂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垦植事，而江海平原的盐务事可追溯到春秋时代。那时海安、扬州等地均属吴国。海安沿海是著名的吴盐产区，扬州是吴盐的集散地。

西汉初年，刘邦封其侄刘濞在江苏一带为吴王。他为发展沿海地区的盐业，解决产区与集散地的运输问题，从古老的扬州经海安至新成陆的如皋之间开辟了一条运盐河，这就是古通扬运河。韩国钧就是喝这条运河水长大的。他当然不会忘却这个关于盐业的传统优势。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句

“蜀麻吴盐自古通”，说的就是吴盐产销两旺的盛景。

今天，我们从《两淮盐法志》上还能读到这样的文字：清同治二年，通、泰二十盐场，虽同取黄海之水，摊灰淋卤成盐，但盐之色质却不同。通州所属余东、吕四等场为上，名“真梁”；通州所属余西、金沙、石港及泰州属下的新兴之上冈，曰“冲梁”，次之；最次为泰州属下的丁溪、小草、草堰、刘庄、伍估、新兴庙湾称“上白梁”，而通属李堡、角斜、掘港，泰州所属之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又次，为“白梁”。

新盐入堰，总得堆储淌卤，不便按月计利，盐商意见颇大。当时淮南总局根据“运司”呈文，报请江苏盐政曾国藩批准，分别略加牌价，使场商、江贩两得其平。

曾国藩不愧为具有商业眼光的官僚。他巧妙地使用盐政的行政权力，不违经济规律，又使“场商、江贩两得其平”，不能不算是政坛高手在商场的小试牛刀，而游刃有余。

20世纪初的那些精英们大都明白了“父教育而母实业”的真知，他们或兴办教育，或举创实业，为的是在国势衰微的苍茫末世，弄出一抹民族的亮色来。

韩国钧早在任河北矿务局总办时，就是“总办”一省实业的官员。与英人矿界交涉的结果，使得英人所办福公司开



垦区垦民在开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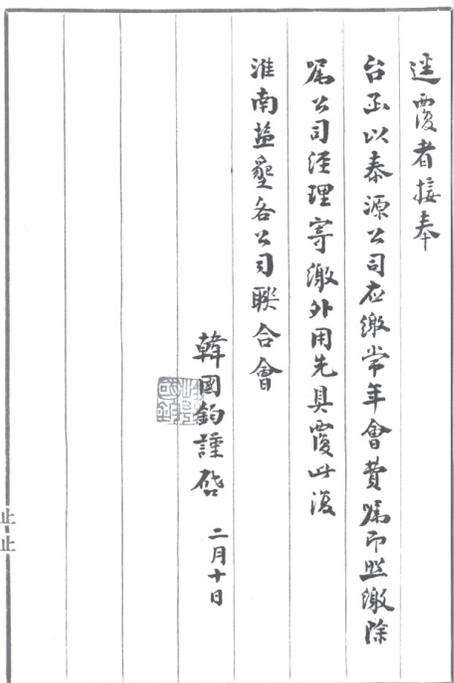
采的矿区内，出现了中国人的“凭心公司”。最后，英人无可奈何，不得与其合办，将福公司改为“福中公司”。这是维护国家主权，为民族工业的生存发展做的一次成功的努力。同时，韩国钧在清化镇设立蚕桑学堂，培养农桑经济人才，此举开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先河，也是他实业经济思想的一个反映。他在奉天任职

时曾参与创办过资本为70万元的农场，在广东也曾主办过资产50万元的农工厂，此可看作是韩国钧实业思想的实践。因从政的原因，韩国钧并不能全心致力于实业。但从那时起，韩国钧全力办实业的想法就植根于他的思想深处。20年，这希望的种子，萌发了，终于在1919年成为大黄海滩涂上的一个经济实体。韩国钧亲任董事长。

泰源盐垦公司就是他的试验田。他把传统的制盐业和新兴的围垦种植业结合起来，“白梁”的劣势就能转化成优势。泰源20年不衰的奥秘就在这里。

当然，泰源不是心血来潮，一阵风就吹起来的。

这里有个背景问题。甲午战败后，在强烈的民族危机刺



韩国钧关于泰源公司缴纳会费的信函

激下，张謇无意于仕途，开始萌发了实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为解决自己创办的大生纱厂的原料供应，于1901年创办通海垦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对通海一带的沿海滩涂进行大规模的开发。由此，揭开了江苏沿海大规模开发黄海滩涂的帷幕。

1914年，张謇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时，颁布的《国有荒地承垦条例》规定：“凡国有荒地，除政府认为有特殊使用之目的外，均准人民按照本条例承垦”。这是张謇将个人农业经济思想以国家法令的形式推广到全国。在张謇的倡导和通海垦牧公司的示范效应下，自1915年起，江苏沿海滩涂上，张謇、邵铭之、陈仪、吴寄尘、张佩年、许泽初、周孝怀等纷纷牵头兴垦。几年间，南起长江的吕四场，北至海州南陈港之间700里，总面积达36000余平方公里的广大滨海区域内，兴起了一个招股集资、兴办盐垦的热潮。先后有70多个盐垦公司成立，总投资额达1732万余元，占地432万亩。

韩国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兴办泰源盐垦公司的。关于泰源盐垦公司，早在1918年间就有了动议。一年中，韩国钧奔走于扬州、东台、南通之间，已不能计数了。磨破的鞋就有好几双，耗却唾液元气，那也是了得。安丰有的只是无边的滩涂和带点咸味的海风，而资金、人才、职工，一切都要靠韩国钧煞费苦心地去做谋划、运筹。要费脚力、脑力，要磨嘴皮子。你不能说得别人心动，哪来的合作、协同？幸而，再多的烦忧操劳，都在大潮之时，立于这片土地上听黄海的涛声中得到消解。韩国钧喜欢这种旷远苍茫的情势。官场的蝇营狗苟，残存于他胸中的那点不愉快，早被眼前的壮阔雄奇扫荡得无影无踪。

但是草甸和海风里，没有启动的资金。韩国钧以他苏省名贤的身份，再次杀回扬州。扬州自古为“淮盐”总汇，经济、文化繁荣，商贾云集。唐时为对外贸易海港之一。明清为两淮盐运中心，当运河交通之要冲。



这个时候，韩国钧想到长江边上的张謇。张謇的事业刚开始，不可能抽出资金来帮韩国钧，但张謇办实业的一些好的路数成为泰源起步成功的关键。

公司成立之初，采取盐垦兼顾、以盐济垦的形式，然后逐步废灶，扩大农田，开辟棉区，在地势高爽、土质宜农的滩涂地带优先开垦植棉。沿海地带，卤潮较重，仍然设灶蓄草供煎，所产海盐交纳国家规定的盐额。泰源盐垦公司在生产经营、组织形式上采取张謇的做法，以股份有限公司方式，用股额定股权，产生代表出席股东大会，通过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是各股东委派的权力机构，董事会由董事长、董事、监察组成，公司的方针大计由董事会讨论决定。韩国钧亲任公司董事长，延聘马叔昂、卞纾声等先后任经理，大致是依从了张謇的谋划。事实上，韩国钧六十有三，再为生意而蹦在前台，显然已力不从心，作为公司的老总，运筹帷幄，把住决策大关，其优势甚显。

经过半年的努力，韩国钧已集股本金额80万元，实收70万元。收购盐灶186副，田地15.8万亩。公司职工14人，佃农700户，人口4500人。

韩国钧虽在扬州融资碰壁，但泰源盐垦公司的成立大会，韩国钧仍然选择在扬州召开。这种“不因小失而铸大错”的做法，固然有他性格中的坚韧因素，但韩国钧更多的考虑到泰源的影响力，这就是现代商家所言的广告效应。扬州虽在近代落伍，但在苏中没有任何城市能与之比肩，韩国钧看重的就是它的名城效应。再说今后泰源的销售仍然要依托扬州这块宝地。

10月28日，韩国钧在扬州亲自主持泰源盐垦公司成立大会。韩国钧宣读了公司的章程，任命了经理。谈了经营方略：三成留煎（盐），七成领垦。股东们被韩国钧热情洋溢的讲话，燃烧起新的希望，都对投资抱有信心。因有韩国钧领

衔泰源，与会各界人士也都看好泰源的前景。台面的文章做足以后，接踵而至的是更加具体而艰难的创业。

泰源盐垦公司首先面临的是东潮西水的侵蚀。防海水回灌以及疏西水入海是泰源打响的第一炮。一条11公里的捍海长堤经过泰源人昼夜不停历时半年的修筑，终于横空出世。堤内开凿河道25公里，属地分为八个区，每区九匡，每匡48垧（每垧20~25亩），使之成为井字或甘字形。各区四周环以河道，匡有匡河，垧有垧沟，互相衔接，以利泄水。

在韩国钧的蓝图里，泰源是农工商畜的综合实体，是黄海边上的一个小世界。垦区内一条31公里的公路成为八区之间的纽带。为了确保各区之间的通联以及垦区与外部的联系，公司还架设了10公里的电话线路。这个在当时充满现代气息的经济实体成为黄海之滨引人瞩目的所在。

韩国钧的试验是多方面的，连测候所（小气象站）也建起来了，既可直接服务于盐垦生产，又能为研究垦区气象积累资料。

第二年春上，韩国钧脚踏草滩，他的视线停留在茂盛的绿草之间。公司职工虽说只有14人，但垦区内有四五千盐工和垦民日有所食，何不利用草滩来大力发展家畜饲养业？这个想法得到公司董事会的支持。公司盛极之时，牛的存栏量达1000头，生猪也有800多头。

“父教育，而母实业”的理想，是20世纪之初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共识。韩国钧在大黄海滩涂上继续为理想的实现进行着不懈的试验。这个试验的直接结果，诞生了两所小学和两所私塾，拥有学生近200人。垦区教育的拓荒至今成为这个区域教育的最初基石。

公司考虑垦区妇女多的实情，也为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还开办了小型工厂。据1920年底的统计，当时泰源布厂的织机已有200台之多。织机的轰鸣，使昔日只闻大海怒涛的滩



涂上，充满了生机。

但是，泰源起步后，却在棉花种植上遇到难题。1920年棉花亩产平均只有七八斤。按照这种收成，泰源将面临亏损。其时股东也纷纷提出质疑。股东的投入是要有回报的，不能拿银子去打水漂。有人向韩国钧发难，建议撤换经理马叔昂。韩国钧心里清楚，棉花产量不是换个经理就能解决的。他在公司生产经营会上说：“别无他法，四字可救泰源。”与会众人纷纷询是那四个字的法宝？韩说：“改土优种！”公司遂延聘土壤和植棉专家会诊，最后的结论是：一是改良土壤，防盐保苗，即开沟爽碱，种植绿肥，铺生盖草；二是改进栽培技术，实行间苗，打顶心，改散播为点播；三是推广美国棉花良种金字棉。由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棉花亩产由10斤左右，上升到最高时的50斤，一般都在30~40斤左右。

众人以为神。其实韩国钧在豫北已作过浚深排碱的土壤改良试验，并收显效，当他看到泛着碱花的土地，心里就有了底了。并非神算，也非瞎猫撞到死老鼠。

泰源当时的经营方式和理念还是一个公司加农户的杂糅体，耕地绝大部分出租给佃农耕种。尽管公司业务范围涉及农、工、商、矿（盐）等，但从本质上来说，其内部的生产关系还是传统的封建农庄式的租佃制。垦区有佃农700户，人口达4500人。佃农一无所有，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公司向他们提供贷款和技术，让他们租种公司的土地。佃农获得收成后，公司按市场价收购他们的劳动成果，以货币的方式结算。而借贷关系的确立，不是按市场和商业规律来运作的，而是按户口人头摊下来，这就种下了祸根，最终酿了一杯苦酒自己喝。1920年，就发生公司人员追逼佃农偿还借款。那些还不起贷款的佃农被逼无奈，放火烧了泰源公司总部的部分房屋。幸韩国钧及时赶到，允暂缓催还借贷，可分

年偿还。实无偿还能力的，可替公司服务，劳务按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可徙他地。

一场足可烧成熊熊大火的事端，经慎重处理，方始平息。公司虽有损失（三间房产），但未伤筋骨。

泰源的发展，对当时开发海上苏东起到积极的影响，对东台地方经济亦有促进。经过四五年的开发，三仓河、一仓河、新农小街，已是初具规模的海滨集镇。

泰源经过最初的艰难与波折，渐入佳境。前后经营时间达20余年。抗日战争前公司年产棉花6 000担，食盐10万担，并生产了一些粮食。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因资金匮乏，加上水患虫害，公司宣布破产。其时，韩国钧已在暮年，哪有心神气力顾及泰源之事。但他对老百姓的总总好处，都是成为百姓心中永久的雕像。1938年，由东台弼港渔会知名人士发起建造了韩公长生祠，至今祠碑仍完好地保存在弼港镇。碑文中谓：

古者，士、农、工、商谓之“四民”，以农为最辛勤。农之为业，耕、稼、陶、渔各异其性，以渔民为最辛勤。江、湖、河、海各异其地，以滨海之渔民为最辛勤……

海安韩公，明足以察闾阎之苦；力足以遏奸宄之萌；言足以重官府之信……记曰：“渔民乐其乐而利其利”，今之弼民是已。歌颂功德，不足以报，于是建长生祠以寿公。

民间的祝祷，就是以这种古老的方式，延续着永恒的怀念。

## 鸟出樊笼

1925年3月31日，韩国钧在瞻园与卢永祥办了交接，由卢宣抚使兼任江苏军务督办。



4月21日，南京各界在秀山公园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韩国钧随后到秀山公园的孙中山灵堂凭吊。

4月29日，因郑谦没有正式到任，韩郑还未交接，迎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是韩国钧40年宦生涯中最后一次以官员身份接待客人。韩国钧完成了最后的公干。

5月8日继任省长郑谦才抵宁，至此，韩国钧才算正式卸任省长职。当然突然间从忙碌的权力宝座上走下来，左右上下到处晃动着军界强人的影子，“夫书生意气如蚁蝼之势”的感叹，再次袭扰着韩国钧。

韩国钧以江苏省名士的身份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在卢永祥召集江苏士绅开的善后会议上，韩国钧虽然继续遭到仁社部分人的冷眼与攻讦，但他处置泰然，这当然是因为一方面查不到他贪污的真凭实据；另一方面心中无鬼也就不怕鬼。40年的官场修练，使他能从容而平静地面对各种谤议。

韩国钧中庸平和的处世之道，使他能夹缝中生存，并能包容更多的非难与误会。早年交涉局长的经历，更使他在对外事务上成为一个高手。

韩国钧作为前清遗臣原本对共和是有抵触的，当时的心情也很复杂的。他一方面希望革新吏治，借鉴西法，来达到国家强盛的目的；另一方面正值仕途的上升期，突遭国事变故，断了自己的前程，心中的不快是可想而知的。政治上他大抵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辛亥革命的结果，埋葬了一个延续了267年的王朝和有2 000多年历史的国家制度，这是韩国钧始料不及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思想限制了他的眼光，特别是他对资产阶级革命党的态度，充满了敌意，斥之为“乱党”。

但是韩国钧对共和的抵触，随着袁世凯篡权以后，他能重新在民国前期，受封为封疆大吏而有所改变。韩国钧性格中最为本质的东西是：“厮位以图其实，惠及国家与民众”，

也就是说，在一个更便于发挥自己才能的位子上，为国家和老百姓做些实在的事。他虽说谙熟政治斗争，但并不热衷；虽说对外交涉，多有谋略，但究其本质，终非是弄权之辈。这是韩国钧儒家思想所规范出的行为准则。家族传统中的“仁厚”的烙印也注定了韩国钧不能投机政治，舞弄权柄，以求闻达。所以在人生理想与现实境遇发生矛盾之际，他能处置泰然，取“合则行，不合则流（去）”的态度。

韩国钧的思想及至告别政坛之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北洋军阀热衷的是争夺地盘，玩一把强人政治，他们走马灯似的轮番执政，无例外地都要韩国钧出山：一是缓冲各派系间的矛盾，在中和调解之中起到阻隔事端的作用。二是韩国钧出任省政，仅作为一种文人当政的平和象征，对社会好交待，对他们自身没有危险。再加上韩国钧关注民生尤重实业水利是经世致用的干才。而韩国钧从民国二年以来，两署江苏省政，看透了这帮军阀政客的本质，他们要的是自己的权力和地盘，而不是国家的兴盛和百姓的安居。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尸位何为？韩国钧因此绝了仕进的念头。再说快70岁的人了，心力明显不足。他在日记中坦露心迹：“国政不纲，民生涂炭。政府势若赘疣，各省自为风气，分崩离析，疆吏有何事为？！”韩国钧性格中“重大局，轻权位；重民生，轻私利；重口碑，轻浮华”的传统人文精神直接影响到他的进退去留。

韩国钧离开瞻园时怅然失若的心绪，是极其短暂的，随之而来的“无官一身轻”的感觉充溢全身。韩国钧自己是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的：“羁栖三载，幸获自由，正如出樊之鸟，欣悦无已。江声山色，若送若迎，胸怀畅适不可言喻。”

回到离别三年的故土，韩国钧甚感欣慰。是夜，“卧甚



适”，表达了韩国钧回到故乡畅快的心情。

韩国钧回到故乡海安，稍事休整，于1925年6月15日乘船去泰州，为亡妻扫墓。这是韩国钧回到故乡后做的第一桩事。前年夏，王夫人病逝石头城，也算备极哀荣。从北洋政府的代表至社会贤达、各方人士，每日少则数十人，多则逾百，正所谓唁者盈门。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蔡元培、颜惠庆等名流均有挽辞。

韩国钧一生不二色，这在旧中国官场中是鲜见的。他冠年完婚，家徒四壁，仅以教读糊口。中举后作幕四方，所入也不丰，又四处院试，连旅费也要借贷。而贤妻荆钗布裙，备极艰辛。大挑一等人选候补知县。在河南省以州县起家，才能携眷随居。后来，官做大了，仍能清廉自守，夫人则持家俭约，亲操家政，极有贤声，且赞襄韩国钧之处甚多。

韩国钧将夫人归葬于泰州东门外，而未葬于海安有这样两种解释：夫人王序新生前笃信佛教，归葬泰州，而泰州自东晋以降的1600年来素为苏中佛教胜地，有千年古刹光孝寺和东山寺、西山寺、北山寺、雨声寺、南山寺等八大丛林，归葬泰州也算遂了夫人的愿，在佛气灵然的西天极乐世界中永生。

1931年（辛未）晚辈楚璜给韩国钧的信中这样写道：“……王序新太夫人十一月十五日西逝。此母诵经念佛四十年，临终前一日，见云彩中佛像无数。迄卒，诵佛号而逝，周身皆冷，惟顶门强热。此从顶舍者，生（升）西之征也。卒后一七内，家人时闻异香，其为往生极乐无疑，并以奉闻。”由此可见夫人对信仰的虔诚。当时韩国钧的一副挽联：“不因空屋宁谈佛，尚未归田苦忆君。”也表达了“人走屋空，谈佛忆君”的追怀。而泰州东门的凤凰墩又是丛林中的一块宝地。夫人葬于凤凰墩，真是名实双至。此其一。

其二，泰州可以说是韩国钧最初的发迹之地。扬郡试

院就是当年韩国钧与扬州府属八县童生考秀才的试场，位于今泰州府前路东端，前身是明代的都察院。1874年（同治十三年）至1877年（光绪三年），韩国钧两次应诗赋取列扬属第八名和第一名，就是在这里。考取秀才的韩国钧就是从泰州赴江南乡试，进而作幕步入仕途的。把夫人的生命终结地与自己的人生起点，构架在不同时间的同一空间，不能不算韩国钧的颇富创意的手笔。

汉唐古郡，淮海胜地，文风鼎盛。韩国钧从东门墓地归来，特地察看了扬郡试院。头门、仪门、大堂、思补堂，一切照旧。宫殿结构的大堂，古雅精巧，檐间斗拱均作三桃式，枋上彩绘人物依然栩栩如生。只是物是人非，50年前的考棚（所谓考棚，即将房屋隔成若干小间，每间容一考生入内应试，房内只设一桌一椅，门口悬以竹帘）肃默森然的气氛已荡然无存。泰县教育会、劝学所的几位公务人员，瞟了几眼韩国钧，并不在意一个老者胸中的几多感念。匆忙与冷清中，完全忽略了一个陌生者的造访。年年岁岁花一样，岁岁年年人不同。世事沧桑的感慨再次袭上年迈的韩国钧心头。

退隐的韩国钧并未恬于颐养。

他热衷于地方的许多新兴事业。从泰州祭扫夫人墓回到海安后，又视察了海安电灯厂、通俗教育馆。

韩国钧年已古稀，无力过问政事，且冷眼旁观世事更迭，任你唱罢他登场，戏好看不好看，总要演下去的。其时，韩国钧在书法里修练着最后的人生。陈毅称其书法“以颜骨而兼欧法，握笔而有挺秀圆润之致，固难能而可贵矣。”绝别官场的日子里，韩国钧自觉“贤于饱食终日者”，求“静中之乐”。他专心阅读五代史、汉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曾文正日记及佛经，深觉书中“已知之事读之如逢故人，未知之事则如新识之友，极有兴趣”，并接受和形成“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思想。



“书法惠及乡里”也不是一句恭维话。许多山川名胜都留有韩国钧的墨迹。扬州大明寺碑“山川异域，风月一天”八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存世至今。

海鴻戲墨朝臨帖  
 慕火凌雲夜校書

韓人先生  
 正之

己卯年韓國鈞

韩国钧手迹

### 受困如皋

1927年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年头。蒋介石终于扯下了伪饰的面具，这个“弱国中的强人”，以屠者的面目粉墨登场，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亮出了新军阀的姿式，收取北伐成果。

此前的4月5日，蒋的党羽捏造“江苏六十县公民代表大会”的名义，通电主张迁都南京……

退隐的韩国钧在感受世态变迁的当儿，并没有太多的感叹，这大抵应了一句老话：“见多不怪。”但是北伐军进军南京、扬州等地，北洋军阀孙传芳由扬州退守淮阴，白宝山军与第9师冯、宋各旅聚集海安，韩国钧再次感受到支应的困窘。其时，北洋军队40 000万人麇集弹丸之地的海安，地方支应所（地方负责军队供给的机构）正准备解散，韩国钧悬留再三，亲往主持供给。次日与白司令商谈，派机枪一队驻支应所，弹压纷乱，其后粮草陆续催派到位。从表面上看，此举大有亲北洋旧属之嫌，韩国钧作为北洋重臣，当有解不开的北洋情结。但是细细推想，倘若对其支应不周，或根本不予理睬，那后果一定糟糕。溃兵扰民，输红了眼的兵痞们，烧杀抢掠任何事都做得出来，地方损失定然大增。由此看来，韩国钧“亲北”之举实可见谅了。

韩国钧把溃兵们安顿好后，又与白司令商量，待所部兵马全部撤离，司令始行。这对安定地方人心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白见海安的善待，也就欣然应答。

同时，韩国钧又命地方保安队与警察队及缉私营合组特务队，彻夜梭巡，市中寂静，并无大的骚动。只偶尔听得被拉夫人家亲属的哀哭声，只好任由他去了。大局始定，小损也顾不上了。

随后，国民军一营驻扎海安。

4月28日，国民军旅长李明扬抵海安，与韩国钧晤谈北伐事宜。这次会谈，使韩国钧对南北时局有了新的认识，对国民军北伐的举措始有认同，消解了许多莫名的敌意。

韩国钧与李明扬见面，也是试探一下国民军的“虚实”与动向，一为地方治安计，二也是出于为官经年敏于政事的习惯。起初，韩国钧以地方名贤官场元老的身份与李见面，



韩国钧与江石溪私宜甚笃，二人同为“冶春后社”重要成员。1933年秋，江石溪病逝扬州，韩国钧闻讯后亲赴江府吊唁，并手书挽联：“向秀赋方成，惊闻笛声到邗上；江郎才未尽，尚留诗卷在人间。”此联刻于“江石溪先生安息处”的两侧亭柱

也不过是礼节性的接触，同时为地方亮一副护卫的盾牌，大兵过境，有韩公在此，似可免些骚扰。老面子有时候值钱能使人买账。如此，会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然一经开谈，彼此甚洽，不知不觉大半天过去了，双方谈兴不减，掌灯时分，韩国钧嘱管家备酒菜，为李明扬洗尘。这餐晚宴实在是计划外的安排。李旅长有滋有味的嚼着下河蚌红烧五花肉，喝着三塘美酒，不知此为“飞来餐”，韩公的即兴之作。韩国钧在日记中这样表述了此次会谈：“晤谈北伐事宜，甚相得。”

韩国钧对北伐军释疑后，于6月2日放心地去了上海。

韩国钧登上轮船离开海安时，心情是很畅快的。古运河的风，吹开长衫的下摆，韩国钧立于船头，俨然一尊雕像。当船行至一荫凉处时，那份惬意与仲夏的炎热适成鲜明的对比。就在向南通（到南通后转赴上海）进发的途中，韩国钧一生中可谓最羞辱的时刻悄然向他袭来。说来跟国民军北伐亦

是关联。此时北伐军到达如皋不久，国民党如皋县党部便应运而生。北伐是在“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声浪中不断向北推进的。“四一二”蒋介石的屠刀上还凝固着共产党人的血迹。5月21日，长沙又发生“马日事变”。接着，汪精卫在武汉又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大开杀戒。霎时，白色恐怖，笼罩大地。在这种大背景下，如皋县党部成员皆唯恐因思想左倾或一言不慎而被扣上共产分子的帽子，一是缄默寡言，积极清除共党分子；二是加强党务活动。其时，党务工作的内容除举行例行纪念会外，主要是为了取代旧势力进行所谓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实质是以暴易暴。

韩国钧既对“北伐”释疑，也不戒备，倒是“共产主义”有所误解。他说：“如皋泰兴共产起，烽火接于咫尺，其起因由于知识分子思想错误，兼如泰之间，佃农受资产阶级压迫，一倡百和，遂致蜂起。”他同情民众，但又认为“共产事起”是因有错误思想的知识分子利用了农村现阶段受压迫佃农，“以为不幸。”

但韩国钧万万没有想到国民党人会对他“非礼”。

3日，韩国钧经过如皋的消息，被如皋县党部常委季云（子峰）侦知，季与北伐后如皋县首任县长乐济安谋划，决定逮住韩国钧，其控告罪名为大贪官污吏，结交军阀，以20万元贿送当时的督军。此等“大鱼”不逮，鱼鳞虾虫又有什么意思？此时不为，更待何时！季、乐邀功请赏心切，决定立即诱捕。

但季、乐行动之时，韩国钧的船已过了如城河下，到了如皋东四十里的丁堰镇。乐济安对季云说：“只可诱捕，不可强逮。”季云遂派人持乐县长名片赶到丁堰镇，说是如皋乐县长请韩公到县署有要事相商。

韩国钧甚感诧异，但还是随来者来到如皋县署，当晚乐济安见了韩国钧。乐济安长得也算方正，性似爽直：“有劳



紫老远来。有人向中央党部控告阁下，请屈尊暂栖此处，已去电请示，俟复示到，再行不迟。”就这样，韩国钧被软禁在县署西花厅内。韩国钧中举的次年，曾在此随刘梅荪先生入房师，也算旧地重游。不想47年后，竟在礼教之地受此辱没。1000多年前，北宋著名学者、大教育家、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胡安定就出生在这里（如皋胡家庄）。那么，社会演进了1000多年，依然斯文扫地，此皆战乱所致，我们民族的痼疾就源于此。

韩国钧平生哪里受过这等侮辱，但面对如此窘境，多言又何益？韩国钧遂平静地说：“余自忖于心无愧。”这一宵，韩国钧彻夜未眠，失却自由，心中焦灼难熬啊。

随后韩国钧电省政府钮主席：“南京，省政府钮主席惕生弟勋鉴：钧过如被扣，所控如实，愿听法律制裁。特奉。国钧。”

韩国钧与现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钮永建（惕生）的关系非同一般，既有师生之谊，又有救命之恩，且韩与南通张謇（季直）及其儿子张孝若素有深交，钮永建及张家知韩国钧如皋被困，必然救韩于困窘。

4日晚，如皋县政府收到省电，命派员护送韩国钧到南京，沿途毋得失礼。乐县长接到省电，即选派干练人员准备护送韩国钧赴宁，严饬护送人员一路妥为照料，不得无理，并定于翌晨起程。

南通方面，张孝若得知韩国钧如皋被扣，立即与南通驻军师长伍文渊联系，营救韩国钧。伍师长当即电令驻如皋的杜芝芳团长到县政府迎迓韩国钧。

4日晚，杜团长衔命把韩国钧接出县署西花厅，并对乐县长责以大义。当夜韩国钧与杜团长同宿团部。

5日晨，杜团长谢绝了乐县长选派人员的护送，着即派本团得力兵士护送韩国钧到南通。韩国钧至通，首先谢谒伍

文渊师长，得知张孝若为其出力，即赴张府道谢。此后韩由南通经上海转赴南京，向钮永建致意，互诉衷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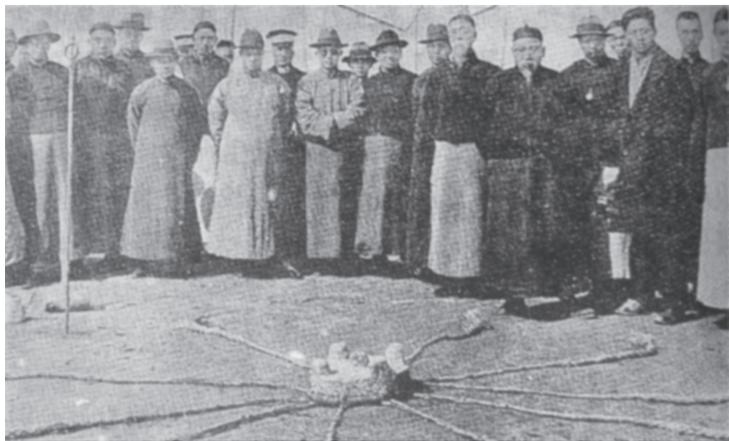
## 生命的抵押

1931年6月18日，韩国钧应张学良之邀去北平小住。8月28日，韩国钧接高邮电告，运河大决口，盼君速归。江淮发生大水，江苏里下河大堤决口26处，计800余丈，洪水所至，10余县成了水乡泽国，约70000余百姓丧生，灾害惨重，灾情危急。凡能造福民生之事，韩国钧都能登高呼举，竭尽全力，尤以水利为著。

韩国钧从北平返回江苏，9月30日过南京时，见江边马路已淹，随后至镇江大华旅馆，乡人来晤者甚多，皆为里下河大堤决口之事也。

10月3日，韩国钧一行赴扬州，4日，至邵伯、高邮一带视察，极目高邮、宝应、兴化、泰州汪洋一片，渺无边际，沿村桑杨，仅见树梢，墙屋多塌，浮尸漂陈。6日，在兴化城召开的各界士绅会议，与会士绅痛哭流涕，徒以竞相挥泪。这些平日里高谈阔论的儒雅之士，此时竟没有了主意，只有恐惧、慌乱和哭叫的份儿。韩国钧挺身疾呼，要求当局抢险堵口，拯救黎民。8日，韩国钧见商量不出什么结果，只好折返。其时狂风大作，轮船颠簸如在汪洋之中。晚7时抵海安。

对此，省府大员，束手无策。省政府主席叶楚傖自从受命到了镇江以后（1929年5月，江苏省会由南京迁至镇江），最初很不习惯在地方上做事。有一次在总理纪念周上作报告，他称，我虽人常常在镇江，可是心却天天在中央，暂时离



1931年，韩国钧（右六）在高邮西堤工程与职员等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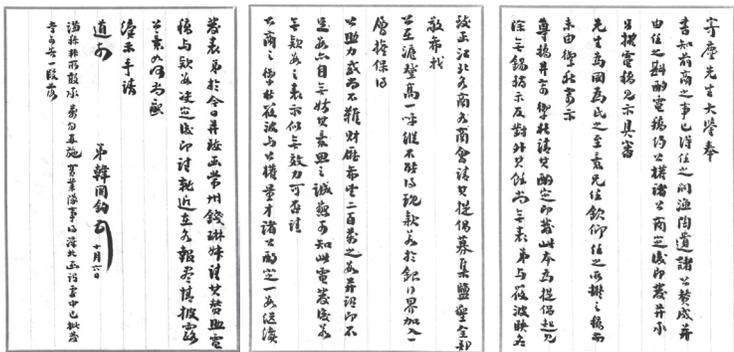
开中央有说不出的恋恋不舍的样子。因此，叶楚伦对做省政府主席并不怎么热心，也不大管事。他当了半年之久的省政府主席后，就对江苏省政的许多方面表示不满，但是他也拿不出什么改革的良方，只能因循守旧，聊以敷衍。

同时，他的兼职很多（此时兼任约法起草委员、国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国民政府代理文官长），又嗜酒成癖。他喝的是绍兴黄酒，平常随身带有一把小小的白瓷茶壶用以装酒，随时随地小饮。他曾对人说：“古人有过‘寒夜客来茶当酒’，我这是‘白天开会酒代茶’。”若酒逢知己，他是非醉不可；风雨连绵，他就干脆杜门不出，衔杯展卷，继以长吟；醉则温醇自克。平时他兴之所至，连浮大白；若抑塞于怀，更是借酒以浇块垒。韩国钧要想得到这样的主儿的支持，无疑与虎谋皮。但叶楚伦还是不得不敷衍一下。于是邀韩国钧至镇江商量复堤之事。镇江会议上，韩国钧挺身疾呼：“悲愤任人。非亲临现场，指点调度，历经艰险，不知凡几。”与会各方意见参差，又知识互异，吵得像煮开了锅的粥。幸赖韩国钧德高望重，又精于此道，才得以整合一

致，使各方携起手来，通力合作。11月1日，在扬州召开江苏省水利协商会议，韩国钧被推为主席。16日，叶楚伦终于没有了耐心，就复堤之事全权委托给韩国钧，由他召集人商修复堤事宜，虽说“工程经费、技术人员”各事“一一议定”，但仍是纸上谈兵。经费不得落实，其他一切都是空谈。26日，韩国钧又偕朱石僧、马隽卿再赴高邮勘灾。12月2日，省府会议任命韩国钧为善后工程处副主任委员。15日，江苏省政府主席易人，涟水顾祝同接任叶楚伦。

顾祝同上任后，仓促设立了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自任主任，只是挂个空名，实际事务都由韩国钧主持。韩国钧只得奔走扬州、镇江、苏州等地，呼吁筹款筹料，约请工程技术人员。是时，韩国钧想到留德的水利工程专家郑肇经（郑是我国最早赴德深造水利工程的先驱者，1924年学成归国。郑是现代水工模型试验技术的创始人恩格斯的研究生，是这位世界水工界泰斗的第一位中国弟子）。郑肇经1924年回国时，颇受时任江苏省长的韩国钧礼遇、器重，应邀出任国内第一所水利高等学府——河海工科大学首席水工教授，又兼任江苏省公署水利佐理等职。

江淮大水之时，郑肇经任上海市工务局主任工程师、代



韩国钧关于江苏省水利建设公债案的信函



局长，兼任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委员、主任工程师。韩国钧到上海特邀郑肇经参与运河堵决复堤工程。郑肇经欣然应允，随韩赴苏北江都、高邮等地，勘视灾情，组织抢险，并迅速拿出堵口复堤的方案。老迈的韩国钧怎堪如此折腾，由扬赴泰州商借款项，至泰县县府时不慎跌倒，几乎不救。韩国钧再次以生命为抵押，来完成最后的跋涉。送韩返扬的张专员说了一句：“难得韩公。”

30日，省政府召开善后委员会会议，工程款仍不得落实。31日，省财政厅长舒石父提出借三年丁漕先行开工，又是议而未决。

韩国钧75高龄筹款救灾跌倒泰县县府的消息，一时传遍大江南北，引得众多的同情和支持。稍事休息恢复后，他又于1932年1月3日再去扬州，与赈灾委员会委员席鸣九晤谈。8日，赴苏州商借丁漕款，未果，又与张仲仁、费仲琛去无锡、常州晤荣德生、杨翰西、钱琳叔、冯小青、陈寅生诸君，苏南之行多有斩获。

1932年春，韩、郑仍在扬州办理运河堵口事宜，并不断去现场指导施工。来圣庵、党军楼、里辅等段发生走埽、移位、凹陷等难工时，又相继前往。5月，堵口告成，郑返回上海。7月，堤工验收完毕，韩国钧写信致谢：此次堵口勉成，皆兄之功也。韩欲寄酬资，郑复信：“为民分忧，义不受禄。”

6月2日，复堤工程款见绌，韩国钧提出：“商银行暂借济急，以保工程顺畅”，又委马隽卿至沪与国府水灾会协商，想取得支持，但三次商借未果。年过古稀的韩国钧，卖着老面子，亲自出马，找宋子文商量。财政部长宋子文知工情紧急，国府再紧，不能背“不顾民众死活”的骂名，咬咬牙，拨了20万元。至此，韩国钧东讨西募，勉强维持工程，总计工程费350余万元，工程方得竣工。嗣后，韩国钧编辑了《江北运河善后施工图》。

值得一提的是，当堵口复堤完工开始验收之时，省建设厅长董修甲等人秉顾祝同之命，验收工程节外生枝，提出要施工人员王叔相等具结保固并赔偿难工堤段的返工费。韩国钧愤然对曰：“工程人员是请来的，不是招标包工，经费应实支实销。要保要赔，由国钧一人承担。”这些国民党大员也算“降龙伏虎手足无措，节外生枝刁难有方”。哪知韩国钧不吃这一套，不畏权势，给刁难者当头一棒！董修甲自知理屈，悻悻而去。韩公勇于负责，对能在民众危难之时挺身相助的工程技术人员，善用关爱，一时广为传颂。

1938年6月9日上午8时，随着几声巨响，滚滚黄河水夺堤而出。这是蒋介石“以水代兵”，阻挡日军西犯，命令军队在河南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灾难。此举虽暂时阻滞破坏了日军的推进计划，但并没有取得军事上的主动，反而使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千百万人民遭到灭顶之灾。整个黄泛区由西北至东南，长达400余公里，面积54 000多平方公里，流经豫皖苏三省44个县，三省倾家荡产者480余万人。据不完全统计，以战前法币折合人民币计，河南损失19 328.5亿元，占原财产的22%；安徽损失25 265.8亿元，占原财产的23%；江苏损失3 210.3亿元，占原财产5.3%。按农业减收来说，河南22 452.7亿元，安徽18 104.6亿元，江苏6 916.7亿元，以上各项财产及农业减收两项，已达95 280.8亿元，更不用说无辜而死的89万多群众了。

相比之下，遭受洪水袭击而伤亡的日本侵略军不过2 000余人。军事上只是暂时遏制住了日军西犯。然而，历时未久（10月下旬），敌军主力继续西犯，结果在武汉沦陷前，郑州已先失守，蒋介石决口拒敌的计划彻底破产，留给三省44县老百姓的，是一个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恶梦和惨绝人寰的大灾难。



蒋介石实施以水代兵计划后，密令程潜对外宣传为“敌机炸毁黄河堤”。但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的这一不光彩的“抗敌”手段即大白于天下，以致其至今仍遭到历史的谴责。

花园口决口，黄水南趋淮域，又一次波及江苏里下河地区，又一次把耄耋之年的韩国钧推到抢险救灾的风口浪尖。

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韩德勤面对兵荒马乱、外敌入侵，自身都难保的局势，哪有心思忙这揽子费力费票子的事？韩国钧坐不住了，他又一次为民呼吁，急电重庆经济部长翁文灏，要求派人来苏，消弭水患，办理修坝排涝工程。当时武汉已经沦陷，上海又在日军控制之下，交通如此阻隔，谁愿承担风险？翁文灏感到为难。韩国钧又急电江苏旅渝同乡会的张一麀、黄炎培、冷御秋，同时致电中央水工试验所，盼郑肇经务于汛前回苏一行。

冷御秋、黄炎培认为郑肇经对江苏水情熟悉，又是韩国钧的世交，促成了郑回苏修坝排涝。翁文灏遂决定组设“苏北黄灾救济委员会”，韩国钧为主任委员，郑肇经和成静生（时任江苏建设厅厅长）为副主任委员。

郑肇经偕一科长，从重庆动身，绕道昆明、河内、海防、香港，于1939年春赶到上海，韩国钧随即派旧国会议员黄辟尘，以红十字会的名义，掩护郑肇经一行前往苏北。由于韩国钧的周密安排，郑等安全通过了日军的封锁搜查，终在汛前抵达海安。

5月上旬，韩国钧偕郑肇经同舟去兴化（其时国民党江苏省政府迁至兴化）。在第一次兴化会议上，就如何修坝排涝苏北救灾事宜，韩国钧与省方交涉中，发生激烈的争执。韩德勤在会上推卸责任：“江苏这次遭灾，是黄河决了口；经济部主管水利嘛，理当负责……”韩国钧未等他话讲完，

即说：“经济部既然组织了黄灾会，我们就应设法把事情办好。”他建议立即责成运河工程局和省建设厅拿出修坝排涝的计划和预算，准备施工。其时邵伯、高邮、盐城、东台、泰州、泰兴尚未沦陷，韩国钧与郑肇经等同往运河及里下河视察水情，决定加固运河大堤，修复东、新坝基，确定了分泄排涝的路线，布置抢种庄稼，并分别责成运工局、建设厅组织实施。同时电请经济部拨付了工程款30万元。庆幸的是花园口决口之黄灾对里下河地区的影响，还不算太大，里下河的修坝排涝工程得以顺利进行。但82岁高龄的韩国钧因连日的长途奔波，倍受辛劳，闹了一场病。途径泰州时，韩国钧不顾身体不适，造访了驻军李明扬将军。李明扬听说韩国钧亦是抱病来访，精神大爽，全忘了病痛，与韩公交换了对当前时局看法，不觉一下午就过去了。

临行时，韩国钧再三叮嘱李将军：“要以抗日为重，不可与新四军发生摩擦。”

李明扬颌首应了一个“好”字。深深地点了点头。

霜降前，韩国钧又在泰州召集水利专家商讨花园口未堵筑前里下河地区必要的防汛事宜。无奈，因敌机不时骚扰，泰州罢市，会议仓促结束，各自登舟返程。韩国钧所乘小船行至泰州南门外，集队的船只挤在一道，忽有敌机自扬州飞来，盘旋上空，很多人上了岸，有躲在坟后的，也有藏于大树下的。韩国钧行走不便，坐守船舱，只听咯咯的扫射声，韩国钧端坐舱内，如有护身法宝，竟幸免于空难……

回到海安后不久，韩国钧给在重庆的友人写信表示感谢，并在信中说：“黄河花园口不堵，我死不瞑目。”

水患不除，韩国钧难安。抗战期间，韩国钧身陷敌伪包围，生命垂危之际，尚遗电于国民党中央：“淮河不浚，苏北其鱼”，其关乎民瘼之精神，可见一斑。



## 抗战楷模

### 结交陈毅

黄桥战役是新四军开创华中抗日新局面的一次重要战役。它不仅奠定了新四军在苏北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基础，而且对于发展和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配合全国人民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危险，争取时局的好转，具有重大意义。

黄桥战役不是一次单纯的军事战事，而是政治仗与军事仗结合起来打的高超指挥艺术的体现，是人民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一个光辉典范，是新四军发展史上的壮丽一页，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史上不朽的篇章。它也是陈毅将军模范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和原则，所取得的苏北抗日统一战线胜利的一次成功尝试。韩国钧在黄桥战役前后的爱国壮举，为黄桥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武汉会战结束后，中

国共产党在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下，苏南陈毅部的新四军开往苏北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苏北的形势很复杂，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其中，日伪势力最大，他们占据主要的交通干线和主要城镇。居次位的是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此人以其同乡顾祝同为后台，拥兵自重，不事抗日，专事反共摩擦，欺压百姓。居第三位的是在泰州一带的李明扬、李长江，俗称“二李”。“二李”原为国民党江苏保安处正副处长，与韩德勤虽同属国民党系统，由于受到韩德勤的长期压迫、排挤，不能自保，正副处长的位子先后被韩的亲信取而代之，目下鲁苏皖游击队正副指挥的位子，还是借助桂系势力才谋到的。所以彼此互存戒心，明争暗斗，冲突时有发生。但“二李”与前面提到的两股势力还是有些区别，多少有些民族正义感。

此时的韩国钧所看到的是，国民党华北战场失利，而江苏又连失苏州、南京、徐州等地，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巨大。江苏国民党韩德勤的“省军无一抵抗”，保安旅“号称十旅，拥此多兵，未有联合攻日计划”。因此，他对国民党抗日发生怀疑，对民族前途感到悲观。国民党要他迁居淮阴、上海、重庆，他拒绝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国钧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平心而论，此前，韩国钧对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是不理解的，正如他在《永忆录》中所述：“民十八九，如皋、泰州共产事起，烽火接于咫尺。其因由于知识分子思想错误，兼如泰之间佃农受资产阶级压迫，一倡百和，遂致蜂起，彼时以为不幸”。特别是1939年5月23日，韩国钧在东台工程委员会与汪湘纶商谈水利工程事宜，五架日机盘旋上空，从其居住的屋顶飞过，只听轰然一声，邻居一房姓书生瞬间炸毙，手持书卷坐姿未改……后至三昧寺途中，更是遇到死伤者数十人，其状至惨。此前，日军占领海安期间，耄耋之年的韩国钧被



迫带家人奔走逃难，这一切让韩国钧大为愤怒和羞愧。大敌当前，抗战御侮是每个爱国人士的共识。对国共双方在抗日中的摩擦，韩国钧认为“烽烟遍地，非化除党见，一致御外，还我山河不可”。应该说，这是韩国钧愿意支持陈毅东进的思想出发点。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的情况，韩国钧也是有所耳闻。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挺进苏南敌后抗日，屡战屡捷，以及陈毅亲赴苏北泰州与李明扬、李长江谈判，联合“二李”一致抗日等消息，促使韩国钧思想开始变化。当年秋天，韩国钧在约见王瘦生时对王说，国共两党对比之下，“新四军和国民党不一样”，“新四军有希望”，并亲书赠友人王瘦生一联，谓：“忍看江河千里赤，微闻国论一时新”，表示寄抗日希望于共产党和新四军。日军第一次退离海安时，他回到故宅便欣然命笔，赋诗“大哀自信心非死，小劫宁知孵尚完”，透出了争取抗日胜利的信心。

1940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指示陈毅：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中间势力如李明扬等，应采取中立政策。陈毅根据实际情况，确立了“击敌、联李、孤韩”的方针政策。

春天，陈毅于苏南谋划苏北统战大略时，得知苏中名绅韩国钧与韩德勤及其部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韩国钧从晚清到民国，仕宦多年，曾两主江苏省政并一度兼任江苏省督军，与江苏省军政两界关系颇深。韩德勤部下的军官大多是韩国钧的拜帖学生，他们对韩国钧极为尊重。退隐后的韩国钧又身兼多种社会职务，热心地方公益事业，造福桑梓，是地方上的名绅，享有很高的社会威望，在苏北颇有号召力。陈毅深知其人于苏北团结抗战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后陈毅在泰州李明扬的宴席上认识了江苏商会会长陆小波，复经陆介绍韩国钧，陈毅主动与韩国钧通信，恳请韩国钧支持新四军抗日。韩国钧久闻新四军及陈毅将军抗战之威名，接函

后当即复信，表示极愿为抗日效力，并亲书一联赠陈毅，联语称其“注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表示对新四军抗战救国的信赖和拥护。陈毅接信后，复以一联书赠韩国钧：“杖国抗敌，古之遗直；乡居问政，华夏有人。”赞扬韩国钧的爱国精神，感谢他对新四军抗日的支持。

1940年3月28日，泰兴县政府常备旅第一团团长沙孙继生、团副黄正选发出《战区异党部队（指共产党新四军——著者）应视同敌伪剿办电》，电云：“接旅部电，奉韩德勤蒋介石电，异党部队应视同敌伪，准予剿办。”接着顾祝同又电令江苏省保安第四路指挥部，以“武力解决异军”。新四军挺进纵队为粉碎敌伪扫荡，移住江都郭村休整，转眼到了夏天，国民党顽固派以大军进逼苏南新四军。为了和平解决内战，免动干戈于民族危亡之时，共同抗日，新四军顾全大局，决定移师江北；韩德勤、李守维又屡以大军阻击新四军于江边。韩国钧唯恐内战爆发坏了一致抗敌的大局，以老迈之躯，不辞辛劳地奔走于韩德勤与新四军之间，斡旋调停，避免韩德勤与新四军制造摩擦。韩德勤虽不识时务大局，但对其主子的意图倒能心领神会，找着茬儿要跟新四军较量。韩德勤坚决反共的态度，让韩国钧大失所望，愤然指责韩德勤：“有违民族之大义。”不是韩德勤不给韩国钧面子，韩德勤作为反共老手，他所效忠和奉行的都离不开这个宗旨。我们不妨对其简历略作浏览，便能解开个中反共情结。

韩德勤是江苏泗阳洋河镇人。辛亥革命前报考江苏省陆军小学，被录取为第四期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韩结识了同乡、第五期学生顾祝同，结为莫逆之交。辛亥革命后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光复”，清政府举办的江苏陆军小学宣告解散。后“陆小”复校时，因返校各期学生不足数，陆军小学就将第四期、第五期合并，韩德勤与顾祝同成为同期生，情谊愈笃。后来顾祝同在军政两界皆仕途通达，级级高升，总



忘不了提携韩德勤这个同乡同学老大哥，韩德勤亦忠心耿耿追随顾祝同，成为左膀右臂。

蒋桂和蒋冯战争期间，韩德勤升任副旅长并率第三旅参加了讨伐桂系、冯系的一系列战役。不久调任陆军新编第三师第七旅旅长。

1931年，韩德勤的第52师奉调前往江西参加围剿工农红军，隶属蔡廷锴为总指挥的第一军团。1月，获三等宝鼎勋章，随后兼任南昌卫戍司令。7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9月15日，从兴国北撤的韩德勤部在东固县附近的方石岭遭到红军的伏击，第52师全军覆灭，韩德勤混在俘虏中逃出。后被降职，并受到处分。

顾祝同任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兼江苏省主席时，又举荐韩德勤到江苏任职。顾祝同转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军总司令，韩德勤随顾去就任北路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参加对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1936年1月，韩德勤被国民政府授二等宝鼎勋章，封陆军少将。之后，韩追随顾祝同马不停蹄地由重庆飞往贵阳、昆明，督饬各部队追剿肖克、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的长征队伍。

“七七”事变后，顾祝同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8月淞沪会战开始，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为蒋介石），实际负责淞沪作战，调韩德勤任司令长官部参谋长。淞沪失陷后，处于战时状态的沿海各省都换了军人担任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任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任省府委员、民政厅长，因顾要指挥部队作战，不能到职，遂于1938年5月荐韩代理省主席。次年任省政府主席。

由此可见，韩德勤的荣辱升迁都与反共紧密联系在一起。你叫他不反共，他能听命？

再说，江苏国民党军队总兵力为16万人，韩德勤系统有

8万人，但派系繁多，矛盾重重。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都受到韩德勤排挤。李明扬是老同盟会员、原省保安处长，而韩曾当过李的副手，以李明扬的资历自然不把韩德勤放在眼里。现任保安处长为李守维兼任，李明扬反受韩派统辖，更是不服。陈泰运部税警总团属宋子文系统，且有何应钦的同乡关系，但陈曾受韩德勤软禁，亦怀恨在心。各股力量各保其实力，故不能集中用兵，团结一致抗敌。这也是实情。

这时的韩德勤决心反共到底，挑唆李长江以11个团的兵力，进攻在郭村休整的新四军。韩国钧闻讯，当即信函“二李”制止内战。李长江不听劝告，结果损兵折将。事后，韩国钧当面责备“二李”，并晓以国家民族、团结抗战之大义。

1940年7月，郭村战斗后，新四军在团结、抗战、反顽的口号下，对“二李”重申互助互让、共同发展之初衷，并释放全部俘虏，归还部分枪支，退出郭村，进驻黄桥。8月初，陈毅致函韩国钧，反复阐明新四军救国救民之宗旨，说明团结抗战的重要，揭露韩德勤等顽固派制造摩擦的真相，恳请韩国钧“纾解内部纠纷”，展开抗日战局。韩国钧表示“无任钦佩”，为实现“一致抗敌的宗旨，全力对外，不使内部摩擦”，愿出面继续调停。于是，韩国钧向韩德勤转达了新四军为救民救国力求在苏北分区抗敌的愿望，并于8月7日和9日连续致书陈毅：务求本着一致抗敌原则，合力对外，避免内部摩擦。此时，韩国钧虽出面调停双方冲突，但对韩德勤还抱着幻想，认为自己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加入共产党，超脱于党派之外，之所以出面调停各方冲突，是因为韩德勤的军队实力不足以对外，只有“化除党见”，一致对外，才能还我河山。韩德勤呢，一面高谈互相谅解，精诚团结，一面以副司令官身份发出“极机密”级歼灭新四军的作战命令。

9月初，韩德勤调集12个团的兵力进攻黄桥。新四军在奋勇自卫击退进攻黄桥之韩德勤顽军后，陈毅又致书韩国



钧、李明扬揭露韩的反共本质及危害，引证“宋明不亡于外寇，而亡于内部私战之争”的历史教训，说明团结抗日之大义，请求“具实调停息事”。韩国钧“闻之泪下”，又出面为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奔走呼号。韩德勤、张少华仍坚持反共立场，再次进攻黄桥。新四军为解决衣食问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9月14日进据姜堰，并立即呼吁各方和谈。韩国钧极表赞成。

9月中旬，在黄逸峰协助下，由韩国钧主持，在海安召集各方军事长



黄逸峰



联合抗日座谈会会址



韩公馆车厢房内景

官举行“停止苏北内战，一致团结抗日协商会议”（即“联合抗日座谈会”）。韩德勤事先表示同意，但至开会时却拒派代表参加。会上，韩国钧与黄逸峰、朱履先、李俊民以及如皋、泰兴、泰县等8县代表联合通电苏北各方军事长官，要求停止苏北军事冲突。函电由李俊民起草。函电称：“值此敌寇当前，尤以保存实力，团结对外，以期扫荡敌氛，收复失地。彼此纵有误会，亦应和平解决。”对于“联合抗日座谈会”提出的“停战息事，一致抗战”，“扫荡敌氛，收复失地”，“体恤民艰，改进政治”等五条建议，李明扬、陈泰运等均复函表示赞同，韩德勤仍拖延不复。陈毅表示“切实遵办”外，还提出了五条补充意见：新四军暂住黄桥、姜堰一线；立即召开苏北军事会议，共同分配抗日任务；彻底整军；澄清吏治，召开苏北军民代表会议，容纳民意，改造苏北，增加抗战实力。韩国钧见韩德勤无和谈及团结抗日的诚意，又与陆小波、黄逸峰、朱履先、黄辟尘等联合苏北绅商学各界致重庆二电：一电致重庆战地党政委员会黄炎培



转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诸要员，呈述韩德勤军旅“不能收复失地，扫荡敌氛”以及“排斥异己”、“虐待民众”、“烧杀拷打”、“抢掠村舍”、“强迫借款”等罪行，要求国民党当局急电韩德勤停战息争，整顿军旅，改善省政，挽救危局；一电致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江恒源转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诸要员，呈述韩德勤查封禁运粮食，致使苏北各地米价骤涨，粮食紧张，要求国民党当局急电韩德勤改善统制粮食，保证内地流通，调节民食，以纾民困。在韩国钧影响下，李明扬亦急电蒋介石，指出“苏北局势日非”原因是韩德勤措施“失当”，要求“即派大员来苏坐镇，力求改善，挽救危局”。

韩国钧为共产党、新四军团结抗战的诚意所感动，他说：“我是中国人，年龄再大也不能当亡国奴，年事再高也要为团结抗日效力，抗战御侮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之责。”他以84岁高龄的在野之身，联络苏北士绅几十人继续奔走往返于韩德勤和新四军之间进行调解。韩德勤却不为所动，继续坚持摩擦。

9月下旬，韩德勤提出：“只要新四军退出姜堰，万事皆休，一切均可商议，否则无谈判之余地。”韩国钧和各界代表都认为韩德勤提的条件苛刻，要求无理。陈毅为团结抗战，立即于姜堰召开军民会议，公开宣布，新四军为顾全大局，促进合作抗敌，决定30日前全部撤出姜堰。这位当年成都学界有名的“五虎”之一的“陈Forward”（足球前峰），决定先将球回传，然后寻机破门。政治足球当然比起绿茵场上的角逐要来得惊险复杂，稍一疏忽，就会酿成民族和民众的悲剧来，对这一点陈毅是深知的。

但是，陈毅在“回传”球时，向韩德勤传递着一种异常强硬的和警示信息：严正要求韩德勤改变政治态度，以友党友军对待新四军，并提议召开苏北和平会议，协商苏北抗日问题，郑重声明：“如韩德勤必欲置我军我党于死地，只有出

于自卫一途，即是说，我军退到黄桥决不再退。”陈毅、新四军以国家、民族、人民为重的大局之举，使韩德勤制造摩擦暂时少了借口，同时也给他以“晓喻”，让他掂量着行事。此举也得到韩国钧和各界代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称赞和支持。

9月30日，新四军从姜堰撤出时，韩德勤一面大骂从中调解的爱国民主士绅；一面电称：“新四军一定要撤出黄桥，开回江南，才可进行谈判。否则，无商谈余地”，并密令其部下“集中力量”“不惜牺牲”，追剿、包围进而歼灭新四军，指使李守维调集大军进攻黄桥。

是日，韩国钧接到陈毅来信，信中揭露了韩德勤准备进攻黄桥新四军的阴谋；又接到黄辟尘、卢子庵、黄逸峰、吴云山、贾和哉、胡显伯等人的联名电：新四军退出姜堰后，韩德勤又以要求新四军退出黄桥，开回江南为实现和平之条件。当日晚，韩德勤电令部下，要“不惜牺牲”，“集中力量，力求主动”，追剿、包围而歼灭新四军。

韩德勤铁杆反共，决意挑起内战的热情，成全了一次著名的战役——黄桥决战。

黄桥，是苏北有名的市镇。黄桥地区在内战时期曾经建立过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的革命策源地。后来，在蒋介石反革命血腥镇压的白色恐怖下，那里盘踞着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保安第四旅。新四军在7月底进驻黄桥后，顽固透顶的韩德勤，疯狂地向新四军发动进攻。9月6日，他从海安出兵，分两路第一次向黄桥进攻，在营溪被新四军打退；10月2日，他又集中两万大军，以其嫡系89军和独立六旅为主力经营溪分三路向黄桥进攻。韩德勤亲自到曲塘坐镇指挥，并对部下公开宣布：“打进黄桥，放假三天。”

韩国钧闻讯，极为义愤，当即打电话责问韩德勤，韩狡辩说李守维不听话。韩国钧预言：

“韩德勤不是仲弘（陈毅）将军的对手，胜利是属于新



四军的。”

10月3日，新四军一纵游击营在营溪以南与来犯顽军揭序幕战。顽89军军长李守维趾高气扬地指挥着中央纵队，从营溪、古溪直向黄桥杀来。此时，陈毅早有准备，命粟裕率陶勇、陈玉生部坚守黄桥。三纵以少数兵力把顽军引进“口袋”。

10月4日清晨，顽89军前锋13师从界沟、分界经官庄受阻后，闯进了“口袋”底——黄桥镇前。于是激烈的战斗开始了，炮声、枪声响了大半天，顽军留下大量尸体，却不能踏进黄桥一步。

这时收束包围全歼李守维之敌的决心已下。激战至午夜2时，一团第三次总攻时发现李守维军部向北突围逃跑，溜至一座木桥头，人马挤成一堆。木桥边沿断塌，人马纷纷落水。顽军从挖尺沟向东突击，在北面警戒的三营立即开火，顽军又向西突击。李守维东逃西突，始终未出“口袋”，遂临时决定将军部安置在小周庄后靠河边的砖窑内。一面仓促组织火力，一面驱逐士兵跳入冰冷的姜黄河，企图泅渡突围。三营周营长带着部队赶到河边，指挥部队向正泅渡的顽军猛烈开火。李守维骑着马仓皇逃窜，因其躯体肥重，又背负大量金银，马儿不堪重负，遂连人带马淹死在挖尺沟中……

至此，韩顽右翼纵队，因我统战工作的作用，从陈兵观战，到退出战事；其左翼纵队也闻风丧胆，慌忙收兵。在黄桥以西（泰兴城东地带）窥视的日本鬼子和伪军，也灰溜溜地缩回泰兴城。韩德勤犹如丧家之犬，抱头鼠窜，仓皇收拾残部，从曲塘溃退到兴化，最后逃至曹甸，依附淮阴的伪军去了。与此同时，新四军乘胜追击，直下海安和东台，并在白驹、刘庄与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部胜利会师。

黄桥决战，新四军七千健儿，在陈毅英明指挥下，共歼顽军主力11个团，计11 000余人，扫除了新四军抗日的绊脚



韩公馆后花园小洋楼，黄桥决战后陈毅、粟裕曾住此处，俗称“将军楼”

石，打开了华中敌后的抗战局面，也向敌人无可置辩地宣告：“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次战役在战略上取得了反摩擦的空前胜利，完成了新四军推进苏北的历史任务，使整个华中出现了抗战的新局面，同时也促进了韩国钧思想的彻底转变。

黄桥老百姓支前堪称先进。黄桥烧饼由此名满大江南北。

韩国钧在黄桥战役中和战役后，发起苏北民众绅耆各界250人，两次致电蒋介石及重庆国民党要员，揭露韩德勤“不愿御侮，只图内战”，“自毁实力，殃及民生”以及“溃军经过烧杀掳掠，百余里糜烂不堪”，致使“交通断绝，省政停滞”等行径，迫使韩德勤不得不提出请求处分和辞职。

黄桥一战使“未隶于国民党亦未入共产党自问超然”的韩国钧认识到，无论政治上道义上，还是军事实力上，共产党都是先进的，是强者。他说：“过去以为袁世凯是私塾，国



国民党是学校。今天，吾心明白：国民党是私塾，共产党是学校。”他寄希望于共产党，并发自内心地说了一句：“朱毛非一般之人。中国将来得天下者必朱毛。”

## 名誉议长

1940年10月9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移师海安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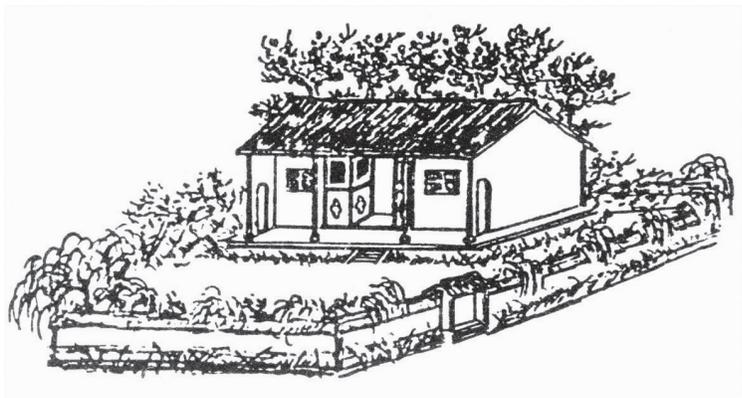
陈毅到海安，坐席未暖，即前往韩公馆拜会了韩国钧。陈毅的心情是急切的，他要感谢紫老团结苏北中上层人士，与新四军的合作，使韩德勤在政治上陷入孤立的不懈努力。韩国钧呢？亦是想早日与陈将军面晤，一睹文武全才的风采。当陈毅说起黄桥摩擦事件，实出于新四军自卫时，韩国钧说道：“幸而将军指挥若定，战胜了省韩部队，不然老朽都是汉奸，在海安住不得了。”韩国钧当即设筵为陈毅洗尘，并邀其住于后花园。陈毅详细阐明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有问必答，坦诚相见。韩国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彼此都有“相从日浅，相知甚笃”之感。韩国钧对陈毅将军极为敬佩，说：“数十年来，在军中从未见有如此雄才大略，文武全才如陈将军者”，盛赞陈毅有“管（仲）乐（毅）之才”，并手书一联相赠：“天心已厌玄黄血，人事难评黑白棋。”陈毅亦回诗一首：“山河破碎思前事，抗日合作看精诚；丈夫一怒安天下，横马越刀取东瀛。”表示新四军坚持团结抗日的一贯立场，以及争取抗日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心。对于新四军以民族利益为重，韩国钧极表赞许，表示愿意与新四军合作，为团结抗日出力。

10月10日，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部队在盐城以南，白驹以北狮子口桥头会师，协同开辟苏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

战略任务基本完成。此时，韩德勤一面托韩国钧、李明扬、陈泰运等求和，一面制造舆论，将苏北摩擦的责任推卸给新四军，企图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为了揭露摩擦真相，加强对苏北国民党武装力量和地方上层民主人士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0月11日，陈毅电报中共中央，我方拟原则同意与韩德勤进行谈判，但首先要其保证实现分区抗敌，不再有破坏抗战和反共行为。次日，陈毅又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召集韩、李、陈与新四军四方和平会议，共同分区抗敌。中共中央完全同意陈毅的意见，并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迫韩放弃反共方针，承认分区抗敌，停止李品仙东进之师，保持与李、陈及绅士们的统战关系。因此，如能召集韩、李、陈、新四军四方和平会议是很好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也致电陈毅：原则同意讲和，提出对韩的先决条件是：1.停止反共；2.彻底实行抗战建国纲领；3.分区抗日；4.抚恤新四军死伤人员；5.保证不再有反对新四军行为。陈毅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对地方著名士绅韩国钧，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的统战工作，倡导和议，力求在苏北实现分区抗敌。

此时，韩国钧已成香饽饽，是国共两党都在争取的对象，是苏北棋盘上的一颗重要的棋子。

20日后，陈毅停止进攻兴化，派朱克靖至泰州提议和平谈判，并托李明扬向韩德勤提出五项意见。李明扬赴兴化与韩德勤面商后，带回三项意见：1.原则上赞成所提五项意见，团结抗日，具体办法由开会决定；2.要求新四军八路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双方派人定缓冲线；3.开会由民众代表韩国钧召集，地点在泰州。但这只是韩德勤虚晃的一枪。与此同时，韩德勤妄图联合中间派，扭转被动局面，将韩国钧弄到泰州去，并以群众代表名义，要求新四军让出东台，以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之联系。韩国钧也是息事宁人，不知韩德勤玩花头，只要能息战停争，一致对外，也就不惜老力，当



曲塘和会会址王宝芝花园

起和事佬。当然，韩德勤的这一无理要求，遭到陈毅的坚决拒绝。

24日，李明扬至海安拜会陈毅。经过一天协商，决定即由李明扬、韩国钧发起召集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由“联抗”进行联系和组织，并确定“联抗”司令部所在地——曲塘为开会地点，时间定于30日。这个决定是明智的。以韩国钧出面召集苏北抗敌和平会议，是各方都能接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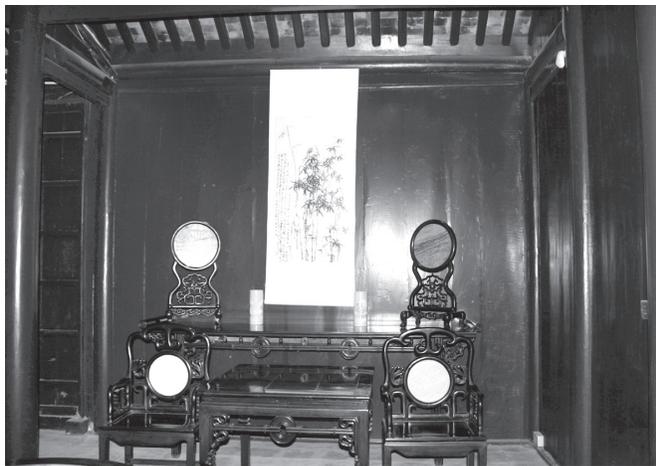
次日，韩国钧、李明扬如约发出召集苏北军民抗敌合作会议的通知，邀请苏北各军政首领及地方耆绅，至曲塘共商苏北今后大局，以使苏北军民团结抗敌，改善政治，挽救时局，解除民困。陈毅为表示和平诚意，将韩德勤部被俘的中、下级军官，先行遣归，并要求他们转达新四军的和平愿望。“联抗”司令黄逸峰积极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

10月30日，新四军代表陈毅、管文蔚、朱克靖，八路军南下部队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税警团和一部分保安旅的代表，通、如、海、启、两泰、如西、靖江、东台、江都、兴化、高邮等12县代表，韩国钧、季方等30余人，齐聚曲塘，准备召开和会。但韩德勤的代表、省府秘书长马镇邦却滞留泰州，拒不

到会。陈毅揭露了韩德勤的阴谋。到会军民一致谴责韩德勤无诚意。同日，陈毅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曲塘会议的请示报告》。31日，李明扬亲至曲塘参加会议。

由于韩德勤的代表不到会，苏北抗敌和平会议乃改为谈话会。会议气氛活跃，完全采取民主自由发表意见的方式，各方代表均慷慨陈词。陈毅在会上明确表示：第一，新四军、八路军顾全大局，不采取报复手段，不攻兴化，在各方承认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的政治地位之条件下，愿与各方合作，并准备与韩德勤直接谈判；第二，各军就原防立即着手进行各种必要改革，立即计划出动抗敌；第三，应制止阴谋家扩大反共，韩德勤等待援兵，以图反扑，我方实行自卫，此后内战责任应由对方承担，李明扬在泰州应制止特工的造谣活动。到会各方代表，均一致谴责韩德勤对休战之无诚意。

韩国钧再次看出国民党韩德勤无意休战的本质。他在会上发言指出：“西安事变，恩来先生及中共中央大仁大



韩公馆西花厅



义。此后只闻国民党限共反共，不闻中共有反国民党行为。新四军一再退让，韩德勤一再进攻，确属事实。我八十四岁老头子，不是共产党，但就事实讲公平话。目前政府及国民党不与中共合作，绝不能抗日救国。论政策及人才国不如共，乃是事实。”不争的事实，已促使韩国钧进一步倾向共产党。作为无党无派的地方名绅，韩国钧的讲话在与会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会议提出了临时解决苏北问题的四项办法和今后基本改造苏北的八项主张。

会后，韩国钧、李明扬将曲塘谈话会各方面意见分别

红旗十月满天飞。

陈毅

十年革命在人血，不见国帛  
 革命归下江淮河汉今谁属

陈毅于韩公馆西花厅的题词



临时参议会旧址

电达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和江苏省政府韩德勤等，要求召集军民大会，通过纲领，并建立党政军统一机构，主持苏北抗敌大计，立即产生临时省议会，其产生方法以民选为原则。

11月9日，叶剑英接韩国钧、李明扬关于曲塘会议的情况报告，抄呈蒋介石，蒋即密韩德勤查复。15日，韩德勤电复蒋介石，诡称曲塘会议“全系共产党假造民意”；蒋介石并据此电复中共重庆办事处。

为此《新中华报》特为韩国钧等发起召开的“苏北抗敌和平会议”（即“曲塘和会”）发表了题为《苏北事件何以善后？》的社论。

曲塘和会的召开，是苏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新胜利。这次会议，揭露了韩德勤毫无诚意，等待援兵，扩大反共的阴谋，争取了地方实力派和广大中间人士的极大同情，从而确立了共产党、新四军在苏北抗战中的领导地位。

韩国钧以他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以他数十年养成的乡望，以他无可替代的身份，在苏中大地上，在共产党人的引领下，完成了人生一盘精彩的棋局。同时，也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和永久怀念。

11月初，胡服（刘少奇）到达海安，在陈毅、朱克靖的陪同下拜访了韩国钧。韩国钧虽然不知道胡服的真实身份，但从陈毅、粟裕、管文蔚这些头面人物去码头迎接来看，这个胡服一定不寻常。胡服的拜访，使韩国钧倍受感动，更觉共产党、新四军体察民情，人心所向。11月中旬，苏北临时参政会在海安召开，韩国钧积极参与筹划并到会讲话。与会的有江都、高邮、泰州、扬中、丹阳、泰兴、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崇明、东台、盐城、兴化14县的议员380人，包括各党派、各阶层人士，但以上层人士居多。其中共产党员2人，工人5人，旁听代表20余人。会议选举“联抗”司令黄逸峰为



参议长，朱履先、朱克靖为副参议长，公推韩国钧为名誉议长。此后，在共产党、新四军坚决抗战的立场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韩国钧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各界一致团结抗日，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工作。

## 最后的悲壮

1941年1月6日，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爆发。韩国钧最初听到皖南事变的消息，是传为中共兵变。

时在事变后一周。1月18日，陈毅将军致电韩国钧以及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林叙彝、黄逸峰、季方（正成）、詹长佑等，通报皖南事变情况，抗议国民党政府取消新四军番号，



85岁的韩国钧

表明苏北新四军立场：“凡一切准我抗战生存，不进攻我者，不分党派皆视为良友；凡一切进攻我者，必视为死敌。”韩国钧深感忧虑地说：“国共将有决裂，于抗战前途大有妨碍。”

苏中形势进一步恶化。2月15日，韩国钧带着家人至海安镇北十余里的徐家庄避难。当日晚韩国钧作七律一首，其中有“苟全性命原非计，饱看兴亡亦可哀”之句。次日，日兵第二次侵占海安，拆平民

工厂、东岳庙、眼光庙、玉皇阁，到处建筑碉堡。

春天到了，看到万物复苏的景象，韩国钧的心情似有好转，提笔写下：“晨光忽尔见熹微，一风随柯任指麾。再度出亡天莫问，万方多难我安归？彻桑敢说予谁侮，绕树几无枝可依。黑白未分棋未了，鸟囚至死不忘飞。”表达了企盼和平恢复自由的愿望，同时致函陈毅：“前年徐州撤退之际，敌寇及溃兵肆虐地方无宁日。今者大军进退，乡里不惊，村居安谧，足堪告慰。大军临危不乱，老悖所深谢者。”对于抗战胜利后，中国能否实行共产党的主张，他又不无疑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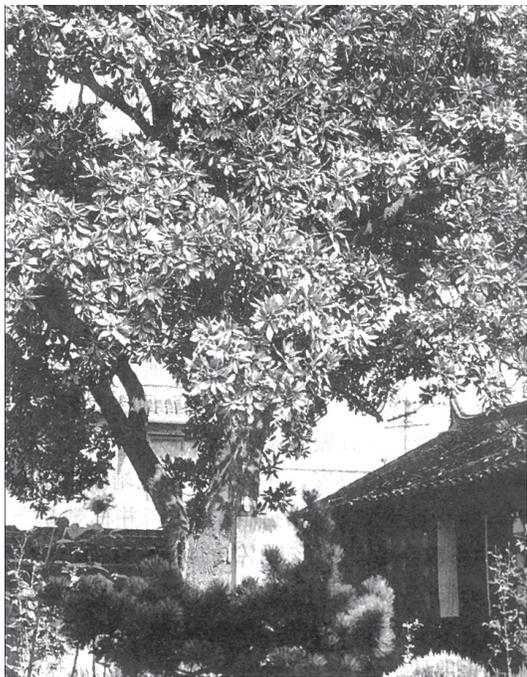
4月，国民党于沪报道谣说韩国钧被迫自尽，昆明并有为韩国钧开追悼会者。韩国钧闻之极为气愤，立即给予驳斥。

5月，韩国钧为自著《永忆录》作序。

秋天，韩国钧复函苏北行政委员会，感谢拨公粮给其作为家属赡养费。陈毅为韩国钧安全考虑，致书韩国钧，嘱其北迁。韩国钧预感来日无多，迁徙颠簸，终了途中，还不如守望家园，安息于家乡。虽说有家不能归，但徐庄与海安镇咫尺之遥，善后事宜，家人尚可照料，免添别人的麻烦。于是婉谢了各方的一片好意。其实，这也是韩国钧性格中适善而从的一面，一切随缘，勉强不得。

陈毅将军仍是放心不下韩国钧，他在与黄炎培商量后，函请韩国钧移居香港。当然消息被国民党公诸于报端，敌伪闻讯，随即追索韩国钧，岂容他远走高飞。话说回头，即便请韩国钧移居香港的消息不公布，以韩国钧当时身体状况和性格，亦是不能成行。何以见得，韩国钧接陈毅来信后，曾对长孙韩忠谏说：“中共至诚，美意可嘉，然以今日日寇南侵之速，华东不保，华南亦是危在旦夕。香港虽为英属，战争疯子，哪有君子协定？”忠谏低头聆听，也不作劝导。后来事实证明，韩国钧的预测是十分准确的。

9月13日，日伪军警重重包围了徐家庄。泰州敌酋南蒲



韩国钧手植广玉兰

旅团长、伪国府秘书长李士群、伪苏北行营主任臧卓、海安日军司令山下、东台日军司令官达马、伪东台县县长吕进彦、富安日军头目山崎等联袂徐家庄，威逼韩国钧出任伪江苏省省长，遭到韩国钧的严词拒绝。日伪复以移家海安镇为请，引诱韩国钧就范，韩国钧厉声答道：“垂死之人，不愿再见海安惨状！”宦游南北40年的韩国钧什么惊涛骇浪没有见过，岂能在垂暮将死之际，污浊了自己一生的清名。达马指责韩国钧“和共产党关系密切，和国民党亦有来往，为什么不受日军之请？”韩国钧坚定地回答：“老朽是中国人，宁死也不当一天亡国奴！”达马气急败坏，把指挥刀和手枪摔在桌上相威胁，韩国钧怒斥道：“吾八十老翁，死何足惜，陷敌

图生，誓不为也，请即枪毙！”韩国钧泰然自若，大义凛然，日伪无可奈何，只得将韩国钧的长孙忠谏带往泰州以作人质。

韩国钧在给韩鼎臣一联中有“能受天魔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的联语，传达出一个沧桑老者对人生的感悟，当然亦是对后辈的箴言。书赠族孙韩忠培的联语为：“道在六经宁有尽，躬耕百亩可无饥。”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平民思想。

1942年1月23日，日伪退出徐家庄后，韩国钧忧念成疾，并日渐加重，是日下午三时许，韩叫家人搀扶至桌前，勉力握笔，分别致函陈毅、黄逸峰、李明扬，恳求各方团结抗敌。写好后交嘱吕龙正立即发出。

随后又口授家人一电稿致重庆全国参政会，希望国民党以大局为重。

晚八时许，韩国钧告谓家人：“共产党是真正的革命党。人才济济，你们应该和他合作。”并说：“抗日胜利之日，移家海安始为开吊，违此者不孝。”言毕，长叹一声，与世长辞，享年85岁。

## 身后哀荣

韩国钧抗敌不屈，以身殉国后，苏北各界闻讯，无不沉痛哀悼。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地的盐阜区党委机关报——《盐阜报》，于1942年2月6日发布消息，题为《前江苏省省长、苏北硕望韩国钧先生逝世》。其文中说：“两个月前海安敌酋山下等曾率兵对韩寓严行监视，胁迫韩氏出任伪职，复遭韩氏严辞拒绝。韩氏民族气节之高尚，实为楷模，苏北各



界纷函其家属吊唁”。其时，身在阜宁停翅港的陈毅将军，正展读韩国钧临终前三日的手书函件，陈毅日夕以健康为祝，忽闻韩公辞世，深为痛惜。他回想庚辰（1940）春来，于李明扬宴席上结识陆小波，复经陆介绍，与韩国钧通讯。陈毅从军来，每莅一地，乐与当地贤士大夫游，能纳交长者如韩紫石先生，固深以为幸。

夏天，在苏南，国民党以大军进逼，共产党不忍内战衅启，命陈毅率师渡江，期以和平手段解决，孰料李守维辈，屡以大军逼我于江滨。韩国钧以在野之身，出而斡旋，彼此信使往返频繁。迨后李守维违反民意，穷兵黜武，终于自殉。韩先生力持正义，忠于谋国之孤心苦诣。

是年冬，新四军移师海安，与韩宅比邻，斟酒论文，接席无虚日。韩先生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肆意制造摩擦内争之行为，深为愤慨。陈毅秉承中共中央加强国内抗战团结之政策，复于大小事，征询紫老意思。紫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陈亦言必信，行必果。彼此均有相从日浅、相知甚笃之感。

1941年春，苏北伪军蜂起。韩国钧移家乡居，初以地方秩序必紊乱为虑，继见大军穿插敌后秩序井然，日寇下乡必遭阻击，地方伏莽亦次第而平。紫老复专函致慰谢。韩国钧对新四军之殷殷希望，充溢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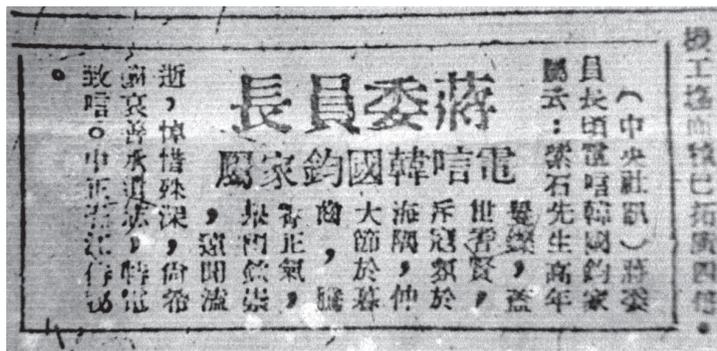
中国历史上，反抗外族之侵略，屡见不鲜。其中仁人志士，断头丧身以殉者，先后踵接。于宋有文、陆、张、郑诸贤，于明有史、左、顾、黄诸贤。韩国钧殉国，其诸贤异代的化身欤？宋、明亡而不复，复则在数世之后。今日抗战，日蹴胜利之途。韩公之志，为酬不远。这是韩公际遇，差胜昔贤，而后死者所当奋斗不息也。

思及此，陈毅挥笔写下：

#### 悼韩紫翁

挥毫健美君才调，涕泣无言泪暗消。

英年陋巷同颜子，开府江南过温峤。  
 虎庭骂贼毋心沸，深闺易嫁青眸标。  
 相逢地下开颜笑，模范夫妻万古邵。  
 苏北耆英数海安，策杖排难沥肺肝。  
 杞人惟恐青天坠，精工难填碧海干。  
 忧国有心愁闻鮑，接席多缘愧识韩。  
 知音寥落天涯感，寂寞何人解辛酸。  
 秋容老圃胜东篱，中履萧然此子遗。  
 波涌江淮龙蛇斗，变起萧墙燕雀危。  
 天心已厌玄黄血，人事难评黑白棋。  
 鲁连贤志埋幽恨，亲痛仇快忍思维。  
 温温权贵六十秋，斜阳鞭影起孤丘。  
 斑马文章能臧否，颜欧书法论怨尤。  
 林下疏河爱黎庶，晚景抗节挫敌首。  
 壮者易征无多语，何日全师复神州。  
 蜂起狐鸣恣鼓吹，泰岳鸿羽正当时。  
 数通函电存遗爱，百代人群沐德施。  
 五年晚节矜道劲，十万貔貅任怨訾。  
 一尊酒醉西风冷，惆怅人天知不知？



蒋介石电文，载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四日《新华日报》（重庆版）



韩国钧逝世后，蒋介石发来信电，《新华日报》亦转发了中央社的这则电讯：“紫石先生夔铄，盖世耆贤，斥寇氛于海隅，伸大节于暮齿，腾霄正气，举国钦崇，远闻溘逝，悼惜殊深，尚希节哀善承遗志。特电致唁。中正。”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最高统帅的唁电，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影响很大。延安《解放日报》也刊登了前江苏省省长叶楚傖的唁电，电文称：“阅报惊悉紫老弃养，曷胜怆愕。紫老邦家硕望，乡国典型，致耄耄之遐龄，著天地之正气，方冀灵光永驻，何期变起俄顷，人断天路，抚今追往，感叹弥深。”同时，《大公报》也刊载了国民政府军政部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何应钦悼念韩国钧的唁电。各大报纸也纷纷撰文，缅怀其生平业绩，或赋诗结联，以悼念韩公。

建阳县士绅韩生前至交张逸生撰挽联：

大事不糊涂 世莫能容 弓旌欲致高山老  
是翁精叟铄 天胡弗慙 气节常思昼锦堂

4月初，陈毅在阜宁县停翅港指示三师师长黄克诚着手筹备韩国钧追悼会事宜。盐阜区行政公署主任宋乃德又根据陈毅指示，会同苏北各地的士绅名流，致函各界发起治丧，筹备追悼大会。9日，黄克诚、彭雄、张爱萍、刘彬、宋乃德、庞友兰、杨芷江、田厚哉、王冀英、唐澄碧、计雨亭、顾希文等25人联名代表新四军盐阜区党委、行政公署、九县参议会及各界民主人士发出《公告》，为追悼会征求悼诗挽文。《公告》肯定了韩国钧一生的功绩，赞颂他：“不辞劳瘁致力抗战”，指出其“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不特为邑人所共仰，亦为邦国所矜式”，“为纪念先生之功绩，以励来者，使天地正气得以发扬，后生青年知所法式，将举行追悼会以志哀思。”

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在陈毅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韩国钧追悼大会于5月5日举行。与会的有陈毅、黄克诚、刘彬、宋乃德、贺希明等新四军军部、新四军三师、盐阜区党

委、盐阜行署的负责同志、各县县长、各县参议长、副参议长、工农商学和妇女等群众团体的代表，其中有盐阜区地方士绅知名人士庞友兰、杨芷江、计雨亭、王冀英、朱沐香、张金光、田厚哉、顾希文等，计960余人，可谓场面盛大。下午1时，追悼大会开始。会堂中央悬挂着韩国钧的遗像，像前摆满松柏、鲜花和醴酒。会堂四壁挂满了挽联。

其中主要有：

贤哲云亡 念江淮危局 藐藐吾怀若有失  
民心未死 忆商山故迹 悠悠君恨不难平

——新四军代军长 陈毅

林下享贤名 兴利导淮 禹稷精神如左右  
陷敌怀壮志 卫国亡身 文张风节信有征

——新四军政治委员 刘少奇

代政治部主任 饶漱石

公为民族捐白首 吾凭抗战吊英灵

——新四军参谋长 赖传珠

富贵不谄 威武不屈 疾风方知劲草  
仰天无愧 俯人无怍 乱世乃识忠臣

——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 黄克诚

向寇奸死拒 为团结疾呼 先生英名永垂青史  
看胜利将临 念艰难正亟 吾侪协力共建新邦

——盐阜区党委

国仇当誓死 敌伪屠场 独拒奸权留正气  
民主亟需贤 江淮才薮 共襄大业慰忠魂

——盐阜区行政公署主任 宋乃德 副主任 贺希明

科举中自由丈夫 能为我黄帝子孙昭气节  
江淮间又一男子 直与吴季威将军争光辉

——阜东县参议长 庞友兰

此外，还有计雨亭、王朗山、顾希文、张延寿等地方士绅及



滨海县政府、阜东参议会等机关送的挽联共200余条副。

5月5日下午1时，追悼韩国钧大会开始。斯时，数声炮响，军号哀鸣，全体肃立，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由陈毅代军长主祭。陈毅先代表苏北父老绅耆及军民各界将鲜花、醴酒致祭于韩公紫石之灵。接着，由阜宁士绅顾希文宣读苏北各界人士追悼韩国钧的《大会祭文》，全文如下：

天地正气，杂赋流形。下为河岳，上为日星。忠烈之气节凛然，今古之群伦矜式。我公耆年，盛德望重乡邦。两主苏政，至今尚著仁声；息影园林，犹未忘怀国事。桑梓同欽，邦家共仰。不幸东邻入寇，小丑跳梁，以封豕长蛇之心，作囊括鲸吞之战，以至中原板荡，神州陆沉。锦绣河山，兽蹄肆毒；金瓯半壁，破碎支离。加以外侮方殷，内扰未靖。摩擦反共，举国骚然。分裂隐忧，苏北尤甚。我公惟大厦之将倾，作中流之砥柱。当以在野之身，呼吁团结；只求有利于国，不辞劳瘁。本同仇敌忾之心，息兄弟阋墙之斗。图挽苏北大局，转危为安；冀弭国内纷争，协力抗战。岂意敌寇凶残，长者难逃浩劫；从此身陷囹圄无异，高龄竟作楚囚。然而劲草屹于烈风，忠贞每彰于乱世。富贵难淫素志，威武不屈寸心。使寇之诡计告穷，而民族之精神乃著矣。方期天祐吉人，尚可共维国是；不意寒筠顿谢，咸悲遽失乡贤。际此风雨飘摇，老成之躯遽逝；寇尚妖氛弥漫，匹夫之责弥多。呜呼！渺渺云天，何处觅后凋之松柏；芸芸后进，谁复作诱掖之良师。惟纪我公大义如山，脉同风斗；对敌寇深仇似海，逐彼扶桑。庶几天日重光，忠灵有寄；河山依旧，浩气长存。享此日麦饭酒盂，藉抒哀思；待他年凯歌盛奠，重祭英魂。零涕致词，伏维尚飨。

祭文诵毕，由阜宁县副参议长、士绅王冀英登台宣读陈毅代军长所写的《记韩紫石先生》一文，文中追述了陈毅与韩国钧自1940年春至1942年初两年中的交往，称颂韩公支持新四军团结抗战的正义事迹，高度评价了韩国钧陷敌不屈

的民族气节，号召后来者为争取抗战胜利奋斗不息。

随后，阜东县副参议长、士绅杨芷江报告了韩国钧的生平。阜东县参议长、前清举人、盐阜区著名士绅庞友兰先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除补充韩国钧“对团结御侮之举奔走不遗余力；于强敌刀锯鼎镬之前正义凛然”等事迹之外，并以韩公刻苦治学，后致有成，寒士多有希望，勉励苏北青年走抗战建国之光明大道。

陈毅将军在众人瞩目中发表了演说。他说，紫石先生在姜堰军民代表会议、曲塘座谈会及海安苏北临时参议会前后，力主团结抗战，冀息磨擦内争，函电屡通，一生耿介。韩先生信任我党我军，赞助民主，毁家纾难，是新型的士绅。陈毅在演说中以“慷慨赴死则易，从容就义则难”来教育后人，说我们苏北广大军民应当积极地与敌伪进行不断的斗争。韩紫老在日寇软禁监视之下不屈而死，这是韩老先生的



紫石墓



胜利，日寇的失败。由此证明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而最后的失败则是日本帝国主义。陈毅长达一小时的演说，与会军民皆悉心聆听。最后，黄克诚代表新四军三师、建阳县农救会代表等分别登台演说，呼吁团结抗战，继承韩氏的遗志。

军、政、民代表演说后，由盐城士绅计雨亭代表韩国钧亲属宣读了韩先生之女韩柳娴（二女云英）答谢陈毅代军长的电文。追悼大会还通过了致韩国钧家属电，全文如下：

海安韩紫石先生家属赐鉴：

韩公硕望，邦国器重，老成凋谢，苏民共痛，毅等苏北军民于月之五日为先生举行追悼大会，用表殊勋，并致哀念。赫赫节义，青史流芳，渺渺群怀，海天莫寄。唯有誓承遗志，击彼强梁，还我河山，以慰英烈。尚祈节哀，善抚遗孤，临电悲惨，余情未宣。

下午5时20分追悼大会结束。韩国钧追悼大会的召开，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对根据地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1943年1月23日，经苏中区党委、苏中行署批准，建立紫石县，即以韩国钧的字（紫石）命名，相当今海安县境为“紫石县”，以表彰韩国钧的抗日功绩。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刘少奇等数度关怀韩国钧后人，足以告慰韩国钧在天之灵。韩逝世40年之际，海安县党政部门重修韩国钧陵墓。1986年，又将韩国钧故居，包括后院一角的“联合抗日座谈会”旧址，修葺一新，以供人们瞻仰。

韩国钧亦已成为一个永久的名字，留存于人民的心中。他的民族气节和清廉的官声，亦已成为我们民族精神遗产的一部分，时间愈久，愈加受到人们的珍视。

2013年春节改定

## 韩国钧大事年表

咸丰七年丁巳（1857）1岁

3月29日，出生。谱名国钧，号紫石，晚年自号止叟。父希彭，母李氏。

同治元年壬戌（1862）6岁

入私塾就学，受业于同邑陆月舫先生，连续读书七年，至1868年底止。

同治三年甲子（1864）8岁

出嗣从叔祖凤馥公。

同治四年乙丑（1865）9岁

8月19日，其父韩希彭去世。

同治七年戊辰（1868）12岁

3月17日，母韩李氏去世。

同治八年己巳（1869）13岁

入刘氏私塾，受业于何伯溟先生，连续读书八年，至1876年底止。

光绪元年乙亥（1875）19岁

1月，初应院试，诗赋取列扬属第八名，正场被黜。

光绪三年（1877）21岁



福建林锡三督学江苏岁试，诗赋取列扬属第一名，入学。

**光绪四年戊寅(1878) 22岁**

1月12日，娶妻王氏。在本邑刘氏塾馆从教。

7月30日，仲兄韩坚甫在曲塘西桥下落水死亡。

**光绪五年己卯(1879) 23岁**

继续在刘氏塾馆从教。8月24日，长女云娟出生。

本年参加科试取列二等，参加江南乡试中举，列第九十六名举人。

**光绪六年庚辰(1880) 24岁**

3月，赴京参加会试，落第。

6月南返后，即入知如皋县事广东刘梅荪先生幕，任教读，连续多年。

**光绪八年壬午(1882) 26岁**

在如皋县幕。11月4日，长男宝庆出生。

**光绪九年癸未(1883) 27岁**

会试又落第。随刘梅荪先生调任赴甘泉。

**光绪十年甲申(1884) 28岁**

随刘梅荪先生调任赴六合。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 29岁**

刘梅荪先生卸六合任，随其往金陵，仍任教读。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 30岁**

刘梅荪先生返广东故里，未随行。遂受聘为六合书院掌教。会试又落第。

10月25日，次男双庆出生。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 31岁**

继续任六合书院掌教，又兼六合知县幕中教读。从同幕中凤阳人胡广渊学习英文，不久，放弃学习。是年秋，黄河郑州处决堤。潜心阅读《禹贡锥指》，开始研究黄河变迁之

迹，自绘黄河变迁沿革图。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32岁**

7月，次男双庆殇。秋，辞六合书院掌教，入昭文县知事长沙徐树钊幕，仍任教读。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33岁**

2月27日，三男宝瑄出生。会试仍落第。应大挑得一等，复挑河工，分发东河。

11月，至开封，入河南学使山东吴树棻先生幕。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34岁**

在吴学使幕。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35岁**

在吴学使幕。三年幕僚，随同吴学使周历豫省南北凡九十六县，所至考察其山川道路、民情风俗以及地方利病。是年，撰《随轺日记》一卷，绘《经行道里图》。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36岁**

由河督奉新许仙屏振诿甄别，改分河南归地方候补。秋，奉委开封府发审局及按察使署督审局谏员差。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37岁**

充河南乡试同考官荐卷。开始研究泰西政治。

3月30日，长兄韩梅生歿。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38岁**

7月13日，长男宝庆殇。

11月2日，四男宝琨出生。

12月25日，奉檄署南阳府镇平县事。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39岁**

11月，卸任镇平县事，调署开封府祥符县事。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40岁**

1月25日，次女云英出生。

9月，调署怀庆府武陟县事。



10月7日，在任武陟县任。

是年冬，在武陟县署为长女云娟成亲。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41岁**

在武陟县翻沙造田，岁增熟田四万余亩。

12月，卸任武陟县事，回开封府待命。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42岁**

4月，奉委河南铸钱局总办兼官钱局帮办，著《铸钱述略》一卷。

12月，河南巡抚刘树堂觐见两宫，举荐韩国钧为循良。奉朱批送部引见。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43岁**

4月，永城旱荒及邻县涡阳匪乱，奉檄署归德府永城县事。

4月14日，莅任县事。查放灾赈，感受时疫，病瘟热甚剧，匝月始愈。本年著《永城土产表》。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44岁**

2月，卸署永城县事。

6月，请咨询卫河由天津入都引见。适以义和团运动，至直隶静海县，中道折回。著《北行日记》一卷。

8月，两宫西逃西安。

11月2日，奉檄署卫辉府浚县。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45岁**

8月，请开浚县本缺归直隶州班候补。旋以道员仍在原省候补。

11月，两宫回銮道出河南，奉委行宫宫门听差。

12月，会同河南臬司清宗室钟筱舫查勘河北各县经行踣路，又奉命解行宫陈设至北京宁寿宫交纳。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46岁**

3月31日，引见，奉旨以道员归河南补用。

4月到开封，充河北矿务局总办、交涉局会办。

10月，以办事出力获奏保，奉旨嘉奖。

是年，著《中国师船表》《中国新学学人姓名表》。

####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47岁

仍任河北矿务局总办。

9月，道清铁路成，奉抚院奏保。

12月，又奏派总办河北蚕桑实业中学堂。于河内县李凹种湖桑两万余株。

是年，著《十九省筹还赔款表》。

####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48岁

是年，与英人议定福公司矿界，豫抚陈夔龙以交涉得体奏保，奉旨嘉奖。

5月24日，在室仲姑去世。

####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49岁

2月，复请辞差赴日本考察农工商矿。

9月30日乘安徽轮东渡日本考察，至12月28日返抵上海，此行三月余，著《九十日之实业界》。奉天赵尔巽将军奏调赴奉天，牵于家事缓行。

####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50岁

4月14日，为三男宝瑄成婚。

7月24日，抵开封。奉委陆军参谋处兼矿政调查局总办。是时，学部奏派二等咨议官，农工商部奏派河南矿务议员。

10月，赴彰德办理秋操。

####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51岁

2月24日，由开封起行赴奉天。赵军督委充交涉局兼开埠局局长，又兼农工商局副局长、农工商部札派奉天商务议员。

5月3日，赵军督调任川督，因请辞职，仍回河南省候补。



6月13日，抵开封，仍充任参谋处总办、交涉局会办，又兼营务处总办。

8月16日，豫抚张人骏升任两广总督。

9月20日，由开封起行，10月16日，抵广东。

####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 52岁

2月以来办理征兵，力筹军事教育，扩充成协。

5月18日，得河南巡抚林绍年商调赴豫电，辞之。

6月23日，因闽浙松制军寿奏保，奉旨送部引见。

8月22日，抵京，中途纾道开封谒林抚军。

9月22日，钦派大臣考验复奏，堪备远大之任。

10月9日，慈禧召见于颐和园仁寿殿，奉旨仍以道员发往广东并交军机处存记。

#### 宣统元年己酉(1909) 53岁

5月11日，奉天锡弼清军督良来电调奉，称明张制军，仍辞，未往。

6月14日，奉委与藩臬两司劝业道会同审讯刘永福、蔡其铭、吴朱氏一案。

7月3日，云南制军合肥李经羲又来电商调，仍辞之。

7月，张制军调两江，奉委署广东劝业道。

9月5日，奉派至香港迎海军大臣洵贝勒，随后陪同视察黄埔水雷局水师学堂。10日，送洵至香港，是日奉旨署奉天交涉司。

10月25日，卸任广东劝业道职。

12月23日，在奉天接交涉司印务。

#### 宣统二年庚戌(1910) 54岁

2月，奉派兼充葫芦岛商埠督办。

7月，与日人大仓喜八郎签订合办本溪湖矿约。9月，奉命简任交涉司，请入觐，未准。

12月，见杨度，又见郑孝胥、汤寿潜论移民开垦事；奉

天代表赴京要求速开国会。是月，东省鼠疫大作，由满洲里传至哈尔滨。俄人欲派兵围烧哈埠，日人又欲派警在奉天城内检查，乃奉锡军督奏派会同民政司办理防疫事宜。本年，编辑《东三省交涉要览》。

### 宣统三年辛亥（1911）55岁

3月，办理中日联合防疫事宜。

4月，办理奉天万国防疫委员会筹备供支事宜。防疫事竣后，锡军督拟为特保，力辞，但仍奉传旨嘉奖，又日赠三等旭日勋章，奏准佩戴。

7月，张季直调查农垦过此，许久香亦来，与汤觉顿谈国家财政问题，又晤张君劭，谈欧西政治。

9月3日，接吉林民政司任。是月，奉赏头品顶戴。

11月，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告独立。以苏人名义电程谓，独创一格，以保全地方，苦心可仰，恐土匪乘机窃发，仍望力为镇压，云云。是时，吉林学界争请独立，以吉林处日俄两强之间，与他省情形不同，不如仍旧以观其变，竭力劝诫，获以无事。

### 民国元年壬子（1912）56岁

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政体改为共和制。

2月12日，清帝宣告退位。14日，孙中山迫于形势辞去临时大总统职。

3月10日，袁世凯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从是月起多次呈请辞职，并先遣送家眷返里。

12月13日，奉政府电令允准开缺，仍令至京候命。

### 民国二年癸丑（1913）57岁

1月16日，卸吉林民政司职。

3月23日，由宁赴苏见程德全都督，请谋本省军政之统一。24日，返宁为特别米捐事，候姜堰、海安两商会代表至



省，乃与省署切商。晤上海沈恩孚、黄炎培，江宁金鼎峙、武进庄蕴宽。

5月，在程德全幕中襄办军事文牒。

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15日，黄兴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讨袁军挟持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婉拒黄兴欲留为助的邀请，旋即应张謇电邀赴南通。22日，赴泰县城开筹防会议。

9月7日，任江苏民政长。

#### 民国三年甲寅（1914）58岁

2月7日，至水西门勘视秦淮河，筹发70 000万元，即日开浚。是月，奉颁二等嘉禾章。

3月27日，开江北运河会议，又筹办淮徐海赈款28万元，决定以工代赈。

5月2日，赴常熟勘视白茆河工程。23日，政府命令改民政长为巡按使，观察为道尹，改教育实业财政各司为厅，于省署另设政务厅长。

6月17日，调任安徽巡按使。

9月5日，卸江苏民政长任。

10月20日，在京“觐见”袁世凯、黎元洪。

11月17日，在安庆接任安徽巡按使。

#### 民国四年乙卯（1915）59岁

1月18日，为四男宝琨成婚。

3月19日，天津严范孙来晤，婺源江谦（易因）来商皖教育事业。30日，黄伯雨、余寿平来晤，宝山袁希涛亦以教育事业来晤。

5月5日，农工商部司长淮安田桂舫来商接收石门山事。美人裴义理来商皖北畜牧事。

6月22日，大总统颁赠折扇缣纱，授职少卿。

8月1日，奉令任湖南巡按使，请辞未获允。9日，卸任安

徽巡按使，乃请假归里。

9月21日，假期届满，请辞湖南巡按使，获准。

#### 民国五年丙辰（1916）60岁

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和“洪宪”年号。

6月6日，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

12月7日，午前浴时为炭气所中晕去，历三十分钟始醒。

#### 民国六年丁巳（1917）61岁

3月间，副总统冯国璋致政府欲委奉天巡按使，总理段祺瑞又承张作霖意欲委黑龙江巡按使任，均以衰老辞之。

22日，江苏省议会推为参议院议员，赴省力辞。

#### 民国七年戊午（1918）62岁

7月，苏人拟邀请入省议会，常熟曾朴来商，力辞。

11月30日，赴扬州商经营安丰场盐垦事。

#### 民国八年己未（1919）63岁

3月20日，赴南通参观盲哑学校，又至掘港口镇考察大豫公司垦务。

4月21日，赴扬州商经营泰源盐垦公司事。

10月28日，至扬州开泰源公司成立会。

是年冬，始刊《海陵丛刻》。

#### 民国九年庚申（1920）64岁

3月27日，赴扬州与张謇开督办运河局成立会，奉简运河局会办。

4月16日，赴安丰以三仓灶民在垦区聚众滋事，邀同东台县胡知事，亲往弹压。

5月8日，赴南通开苏社成立会议。

5月25日，赴扬州开泰源公司常会。

11月8日，又赴泰城开修志局会。

12月13日，由沪到扬开运河局评议会。



### 民国十年辛酉(1921)65岁

3月8日,赴无锡开苏社常会。

5月14日,至扬州开泰源公司会议。

9月,秋雨连绵,淮沂两水同时大涨,运河一线长堤岌岌可危。高、宝两县人士以身家性命所在,要求再开昭关坝。而泰、东、兴、盐、阜诸县人士以利害相反,竭力阻止,彼此相持甚坚。张季直督办邀同到扬晤商,最终坚持不允开坝。并决计疏浚王家港以通入海之路,雨水势丰亦日退。

12月11日,与张謇督办同至王家港行疏浚入海水路开工礼。

12月10日,又至扬州开运河局评议会。

### 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66岁

2月1日,辞运河局会办职务,国务院复电挽留。

4月4日,赴王家港勘视疏浚工程。

4月,政府特任为山东省长,力辞不就。

6月16日,中央改任为江苏省长,电辞不允。苏鲁两省军政要人往复协商,内阁总理颜惠庆电,到京面商,均辞。

7月15日,在各方盛情相邀之下,赴宁就任。

8月3日,开财政会议议定发行新公债700万。6日,赴东南大学欢迎会。18日,赴科学研究社行开幕礼。

9月23日,赴青年会欢迎会。

10月1日,至宝山、太仓阅视海塘工程,便道过上海谒护军使何丰林及英、美、法、意、比、荷、日、丹麦、瑞典、挪威各国领事。又至江湾参观游民主厂及妇孺救济会而归。22日,至东南大学参观棉作展览会。

12月14、15两日,在水利协会开运河局评议会。

### 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67岁

1月21日,开教育实业联合会。

3月3日,至公共演讲厅开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

3月21日，长孙忠训生。

4月28日，赴法政专门学校，行户籍专员开学礼。做演讲，并与张君劭商定设立自治学院。

8月17日，签订江浙和平公约。

9月8日午后四时，荆室王夫人病逝。

10月6日，北京国会大选揭晓，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当选为大总统。各项问题因之而起，苏省应先自决。是夜，偕张君仲仁在军署密商甫定。

10月28日，至东南大学参观植棉展览会。

11月18日，赴演讲厅行平民教育第一次毕业礼。

12月9—11日，请本省士绅开财政会议。

#### 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68岁

1月7日，至扬州运河局开评议会。

4月12日，开教育实业联合会。15日，开公债委员会。

6月3日，至大胜关参观东南大学农场。25日，至东南大学行科学馆立基础礼。

7月2日，至科学社开十周年纪念会。3日，参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开会典礼。

8月10日，至镇江行瓜镇轮渡落成礼。

9月3日，齐、卢战争爆发，以10月13日卢永祥逃亡日本而结束。此战40日中维持调护，以救济战地人民为急务，百计俱穷。因邀美国教会诸君之入红十字会者，分途赴前线救济妇孺，先后共4 000余人，费款4 000元。

10月19日，至河海工程学校行毕业礼，演讲河海工程之重要。

11月25日，针对吴佩孚的“筱电”，发出“皓电”，呼吁各派军阀停止纷争，服从中枢，以济民生。

12月10日，中央免齐督军职务，命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辞未获允。



### 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 69岁

1月26日，安徽督办王捐唐及镇守使王慈深先后来拜，是时，直、奉两军在丹阳、苏州之间激战，溃兵大队至沪。先期密令孙少江、朱叔源两君及前师长宫邦锋在沪收集遣散，以免扰及沪上，获以无事。迨奉军抵沪，江浙订定上海两不驻兵之约。制造局交由商会接收。

3月30日，卸江苏军事督办职。

4月21日，在秀山公园行追悼孙中山先生礼。

5月8日，新省长郑谦到任，卸江苏省长职。

### 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 70岁

1月12日，为《北辕录》作跋。

4月7日，海安平民工厂开幕，出席演说。

4月15日，七十寿辰，各地友人来祝寿，以得寿仪8 000元捐入平民工厂，购地130亩，交工厂为永久基金。

6月6日，四孙女忠俊生。

6月17日，山东李升屯黄河南决，列席运工局会议，以决口不堵苏境可危，请省方拨助20万金筑堤堵塞。嗣堤成山东省即名江苏堤。

9月13日，赴南通吊张啬庵之丧。

###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 71岁

3月，张效坤自南京来书，邀出山，复书谢绝。24日，北伐军已至南京及扬州。

5月24日，白宝山军与第九师冯宋各旅集中海安，不下40 000人，无地可容。与地方士绅供应北退之兵，以保地方安宁。

7月1日，晚在如皋县丁堰镇为县长误拘，2日晚获释。

12月17日，二孙忠浩生。

###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 72岁

息影林泉，以读书为乐。

**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73岁**

以读书自娱，感叹“阅《汉书》，于已知之事读之如逢故人，未知之事则如新识之友，极有兴趣”。

**民国十九年庚午（1930）74岁**

4月8日，赴扬州开泰源公司董监会议。

8月22日，三孙忠谏生。

**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75岁**

6月18日，应张学良、刘君实函请到北平一游。

8月28日，接高邮电告运河大决口讯。

10月初，赴扬、邵伯、高邮、宝应一带视察水情。30日，在扬州参与水灾善后会议。

11月1日，在扬州参与水利协会，推为主席。

12月2日，在省府会议，任善后工程处副主任委员。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1932）76岁**

1月8日，赴苏州商借丁漕事。

2月7日，在扬州晤省建设厅长董鼎三。22日，参加省府召开的救济委员会。24日，列席农民银行监理委员会。

3月9日，偕朱干臣、任馨山等赴昭关坝等决口处视察工程。是月，为运堤复坝工程奔走各地。

7月下旬，与其他运河验收委员验收运河各处工程。

8月25日，晚抵泰城，诣县府商堤工石驳岸款事，无意中倾跌，致伤面部，血流满面。延医生诊视，言伤可无虑，唯虑年老中风。是夜，睡如常。至10月2日痊愈。

11月11日，实业厅长、实业部代表、实业厅视察员、建设厅科员、南通大学农科教员、大生纺织公司技师、如皋农行主任、如皋党部人员等赴各垦区考察，拟仿苏俄集团农场办法，来此晤谈。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1933）77岁**

1月26日，四孙忠谦出生。



2月18日，赴扬召开泰源公司董事会。

6月13日，沈百先建设厅长寄来导淮工程计划书，潜心阅之，其中疑点一一列出，以便讨论。

8月19日，顾祝同主席以河南兰封黄河南决，电邀，至省府会议。

12月2日，民政厅长余井塘电邀赴省商导淮事。

#### 民国二十三年甲戌（1934）78岁

5月30日，省府邀列禁烟委员会。

9月22日，先后参加省府禁烟委员会，农民银行监理委员会。

10月14日，受全国经济委员会聘为全国水利委员会委员。

11月28日，受行政院聘为江苏苛捐杂税监理委员会主席委员。

####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1935）79岁

1月22日，至南京参加全国水利委员会。

2月15日，赴镇江开苛捐杂税监理委员会。

3月9日，在农民银行参加监理会。

7月13日，赴南京参加水利委员会。

12月2日，赴南通为张孝若致奠，便即至扬镇商防黄诸事。

####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80岁

1月，为徐海一带黄水为灾，个人发起劝募赈捐，共收5 000元交省府转发。

7月14日，赴首都开水利委员会。

10月13日，三男宝瑄病逝，年仅47岁。

####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81岁

1月28日，与张维明县长同赴如皋商开浚焦港事。

4月19日，河南浚县士绅王韵笙、韩文轩来商修理浚县

长丰渠事。

7月2日，赴南京开水利会，参观水工试验所、又观建筑水工试验所工程。

9月24日，接救国公债委员会议决案，当时签字交回。捐1000元，即日解出。

####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1938）82岁

1月9日，运工局徐锡丞局长偕沈豹君前来商修复运堤事。

2月28日，四区专员、六区专员、如皋县长、泰县县长等均集中海安，开四、六分区救济委员会。翌日，接开常务委员会。

5月14日，闻家乡盗匪横行，致函张县长谓海安沦陷，各乡镇仍隶版图，未可置诸不理。

8月14日，见省主席韩德勤楚箴，畅述防水计划与救济地方各事宜。

10月3日，韩主席致防汛委员薪3000元，一再力辞不允，不得已乃受1000元，而将此款捐助地方赈济。

11月23日，四男宝琨亡故。

####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年）83岁

1月，新四军挺进纵队攻占扬中。

8月，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陈毅亲赴泰城，会见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二李在新四军东进苏中时中立。

夏，辞去黄灾救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

秋，国民党邀请去重庆，婉拒未往。

#### 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84岁

6月，见韩德勤等欲消灭在郭村的新四军，写信给“二李”，要求他们从抗战利益出发，停止向新四军进攻。

9月中旬，于海安故宅主持召开“停止苏北内战，一致团



结抗日协商会议”。会后，领衔苏北各界士绅、名流，向重庆方面发出三封函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0月中旬，在陈毅邀请各界召开的茶话会上，发表讲话，支持新四军东进抗日。

10月31日，与李明扬等在曲塘主持召开“苏北抗战和平会议”。

11月15日，苏北临时参政会在海安召开，被推选为名誉议长。

本年自订《止叟年谱》

**民国三十年辛巳（1941）85岁**

2月15日，又携家人至海安东乡徐庄避难。

3月16日，日军又占海安。

5月，为自著《永忆录》作序。

秋，国民政府邀请至重庆担任全国经济委员会要职，以年老体衰，行动不便，婉拒。

9月，日伪探知并包围徐庄住所。

9月13日，严词拒绝日伪威逼其出任伪江苏省长要求，日伪无奈，将其长孙带至泰州作人质，仍坚不从命。

**民国三十一年壬午（1942）86岁**

1月23日，因日伪软禁，忧愤成疾，病况日深，晚8时，告谓家人“抗日胜利之日，移家海安，始为余开吊，违此者不孝。”言毕，逝世。

5月，新四军军部和盐阜各界在盐城为其举行隆重追悼会。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韩国钧 / 谢静著. — 苏州 :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3

( 江海文化丛书 / 姜光斗主编 )

ISBN 978-7-5672-0821-6

I. ①韩… II. ①谢… III. ①韩国钧 ( 1857~1942 )  
—传记 IV. ①K83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0313号

书 名 韩国钧  
著 者 谢 静  
责任编辑 施 放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 苏州市十梓街1号 215006 )  
印 刷 南通市崇川广源彩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72千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0821-6  
定 价 22.00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 目 录

引 子 .....	1
-----------	---

### 早年岁月

生于乱世 .....	6
“以记诵为苦” .....	9
学教西寺 .....	12
秀才功名 .....	17
中举前后 .....	21
幕府历练 .....	26

### 知县起家

棘手的开局 .....	32
县任作为 .....	36
跨府称道 .....	46
清化镇的四品官 .....	49
路矿交涉 .....	52



访问日本 .....	59
宦游南北 .....	63
粤省练兵 .....	65
二见慈禧 .....	68
东北大鼠疫 .....	72

## 封疆北洋

转身民国 .....	77
“礼”送张勋 .....	87
兵灾善后 .....	91
赴皖前后 .....	94
励图皖治 .....	102
冷眼观帝制 .....	107
二掌苏政 .....	112
700万新公债风波 .....	117
“消防队员” .....	124

## 林下紫石

生日避客 .....	139
文化工程 .....	142
泰源盐垦 .....	146
鸟出樊笼 .....	153
受困如皋 .....	158
生命的抵押 .....	163

## 抗战楷模

结交陈毅·····	170
名誉议长·····	182
最后的悲壮·····	188
身后哀荣·····	191
韩国钧大事年表·····	199

## “江海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 炎

委员：李明勋 姜光斗 施景铃 沈启鹏  
周建忠 徐仁祥 黄振平 顾 华  
陈 亮 吴声和 陈冬梅 黄鹤群  
尤世玮 王建明 陈鸿庆 沈玉成

主 编：姜光斗

执行副主编：尤世玮 沈玉成

## “江海文化丛书”总序

李 炎

由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编纂的“江海文化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从2007年启动，2010年开始分批出版，兀兀穷年，终有所获。思前想后，感慨良多。

我想，作为公开出版物，这套“丛书”面向的不仅是南通的读者，必然还会有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国外的读者。因此，简要地介绍南通市及江海文化的情况，显得十分必要，这样便于了解南通的市情及其江海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同时，出版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选题原则和编写体例，一定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因此，介绍有关背景情况，将有助于阅读和使用这套“丛书”。

南通市位于江苏省中东部，濒江（长江）临海（黄海），三面环水，形同半岛；背靠苏北腹地，隔江与上海、苏州相望。南通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及人文特点，被列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

南通市所处的这块冲积平原，是由于泥沙的沉积和潮汐的推动而由西北向东南逐步形成的，俗称江海平原，是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境内的海安县沙岗乡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告诉我们，距今5600年左右，就有先民在此生息



又反映了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以及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因而使得江海文化成为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变”是组成江海文化的各种文化“基因”融合后的发展，“不变”是原有文化“基因”的长期共存和特立独行。对这些特征，这些传统，需要全面认识，因势利导，也需要充分研究和择优继承，从而系统科学地架构起这一地域文化的体系。

正因为江海文化依存于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蕴含着自身的历史人文内涵，因而她总会通过一定的“载体”体现出来。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文化遗产”可分为四类：即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历史文化人物、历史文化事件、历史文化遗址、历史文化艺术等，又是这四类中常见的例证。譬如，我们说南通历代人文荟萃、名贤辈出，可以随口道出骆宾王、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郑板桥等历代名人在南通留下的不朽篇章和轶闻逸事；可以随即数出三国名臣吕岱，宋代大儒胡瑗，明代名医陈实功、文学大家冒襄、戏剧泰斗李渔、曲艺祖师柳敬亭，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等南通先贤的生平业绩；进入近代，大家对张謇、范伯子、白雅雨、韩紫石等一大批南通优秀儿女更是耳熟能详；至于说现当代的南通籍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也是不胜枚举。在他们身上，都承载着江海文化的优秀传统和人文精神。同样，对历史文化的其他类型也都是认识南通和江海文化的亮点与切入口。

本着“文化为现实服务，而我们的现实是一个长久的现实，因此不能急功近利”的原则，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将“丛书”的编纂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试图通过对江海文化的深入研究，将其中一部分



能反映江海文化特征，反映其优秀传统及人文精神的内容和成果，系统整理、编纂出版“江海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将为南通市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为将南通建成文化大市和强市夯实基础，同时也为“让南通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南通”做出贡献。

“丛书”的编纂正按照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逐步展开。

纵向——即将不同时代南通江海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遗址（迹）、重大事件、重要团体、重要人物、重要成果经过精选，确定选题，每一种写一方面具体内容，编纂成册；

横向——即从江海文化中提取物质文化或非物质文化的精华，如“地理变迁”、“自然风貌”、“特色物产”、“历代移民”、“民俗风情”、“方言俚语”、“文物名胜”、“民居建筑”、“文学艺术”等，分门别类，进行归纳，每一种写一方面的内容，形成系列。

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的体例结构基本统一，行文风格大体一致，每册字数基本相当，做到图文并茂，兼有史料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先拿出一个框架设想，通过广泛征求意见，确定选题，再通过自我推荐或选题招标，明确作者和写作要求，不刻意强调总体同时完成，而是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经过若干年努力，基本完成“丛书”的编纂出版计划。有条件时，还可不断补充新的选题。在此基础上，最终完成《南通江海文化通史》《南通江海文化学》等系列著作。

通过编纂“丛书”，我有四点较深的体会：

一是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基础。我们从这套“丛书”，看到了每一单项内容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都是具有学术素养的资料收集者和研究者；以学术成果支撑“丛书”的编纂，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二是关键在广大会员的参与。选题的确定，不能光靠研究会领导，发动会员广泛参与、双向互动至关重要。这样不

仅能体现选题的多样性，而且由于作者大多出自会员，他们最清楚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写作能力，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可以提高作品的质量及成书的效率。

三是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这包括出版经费的筹措和出版机构的运作。由于事先我们主动向上级领导汇报，向有关部门宣传，使出版“丛书”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得到认可，基本经费得到保证；与此同时，“丛书”的出版得到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出版社从领导到编辑，高度重视和大力配合；印刷单位全力以赴，不厌其烦。这大大提高了出版的质量，缩短了出版周期。在此，由衷地向他们表示谢意和敬意！

四是有利于提升研究会的水平。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编纂出版“丛书”，虽然有难度，很辛苦，但我们这代人不去做，再过10年、20年，就更没有人去做，就更难做了。我们活在世上，总要做些虽然难但应该做的事，总要为后人留下些有益的精神财富。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我深信研究会定能不辱使命，把“丛书”的编纂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研究会的同仁嘱我在“丛书”出版之际写几句话。有感而发，写了以上想法，作为序言。

2010年9月

（作者系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会长，“江海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